

目 录

专 论

- 3 王海运 / 中俄关系：战略基础与发展趋势

专题文稿

俄罗斯经济转型

- 10 B. 马 乌 / 俄罗斯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风险及前景构想
22 李 新 / 200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35 李中海 / 论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及特点
45 周维第 /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路径及效用分析

欧亚·斯拉夫

- 58 邵书龙 / 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阶级与阶层的视野
83 娜丝佳 / 俄白联盟：进程、问题与前景——白俄罗斯的视角
91 王维然 / 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研究

历史·文化

- 99 向祖文 / 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对布哈林几个经济理论问题的再认识
116 郭小丽 孙静莹 /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结构及其流变

学术生活

- 127 P. Я. 皮里格 / 中国学者视域下的乌克兰史
130 赵 臻 / “双头鹰”将飞向何方？——《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介评
135 于 璐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9 年 4 月 23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09 年第 2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Ван Хайюнь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и тенденция развития (3)

В. Мау

Вызовы, риск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10)

Ли Синь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ее развития, начиная с 2000 года (22)

Ли Чжунхай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мешанной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35)

Чжоу Вэйди

Анализ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и его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45)

Шао Шулу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лассов и слоев (58)

Баёк Анастасия

Союз России и Белоруси: процесс,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елоруси (83)

Ван Вэйжань

Эмпир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гравитационной модели торговли (91)

Сян Цзுவэнь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через рыноч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Нов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некоторых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ов экономики Бухарина (99)

Го Сяоли, Сунь Цзинсюань

Структура и эволюция мессиан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116)

Р. Я. Пириг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глазам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ученого (127)

Чжао Чжэнь

Куда летит двухглавый орел?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по монографии «Эпох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30)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2 期 (双月刊)

Contents

Wang Haiyun

Sino-Russian Relations: Strategic Basi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3)

V. Mau

Challenges, Risks and Prospects of Russia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10)

Li Xin

Changes in Russian Economy Struc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Since 2000 (22)

Li Zhonghai

On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Mixed Market Economy (35)

Zhou Weidi

The Analysis of Transition Path of Russian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nd Its Effectiveness (45)

Shao Shulong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Perspectives from Classes and Social Layers (58)

Bayok Anastasiya

Russia-Belarus Union: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larus (83)

Wang Weiran

Empirical Study of Kazakhstan's Foreign Trade Based on Trade Gravity Model (91)

Xiang Zuwen

Through Market Relations to Socialism —— New Understanding of Bukharin's Several Economic Theoretical Questions (99)

Guo Xiaoli & Sun Jingxuan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Russian Messianism (116)

R. Pirig

Perspective of a Chinese Scholar on the History of Ukraine (127)

Zhao Zhen

Where is Double-Headed Eagle Flying to? Comments on the Monograph "Epoch of Transform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Russian-American-European Relations" (130)

专 论

中俄关系：战略基础与发展趋势*

王海运**

中俄互为最大邻国、主要战略伙伴国。中俄关系在两国战略全局中均具有重大战略价值，深化中俄关系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中俄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同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性因素。面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剧烈波动和深刻调整，中俄必须不断强化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以新的思维和有力的举措，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中俄关系的战略基础

中俄关系具有广泛的战略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利益、保障机制和既有发展三大基础。

（一）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影响国家关系最具关键性的因素。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两国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和支撑的。

两国互为最大邻国，需要相互依托。互为最大邻国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长达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对两国安全环境、发展环境影响重大。俄罗斯是我北部安全环境的“半边天”，是影响我北疆安全的最重大因素。考虑到21世纪我主要经济活动、主要安全威胁可能集中于海洋方向，我地缘战略中的国家定位也应由陆上大国转向海陆大国，因而存在以俄罗斯作为战略纵深的客观需求。同样，俄罗斯为了集中力量应对日益严峻的西部和南部安全威胁，也必须以睦邻友好的中国作为其战略纵深和战略依托。邻居不能选择，远亲不如近邻。睦邻友好合作最符合两国的战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07JJDGJW25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王海运，中国前驻俄罗斯陆海空军少将武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防大学特聘教授。

略利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提出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深意即在于此。

两国拥有共同周边，需要共同经营。两国同处中亚、东北亚地区，在周边地区安全与发展问题上有着诸多共同利益。其中中亚地区，俄视其为必须确保的传统势力范围，对其他大国的进入十分敏感，但是为了拉住中亚国家、抵御美等西方势力的战略挤压，需要借助中国。中国则希望将中亚地区建设成为睦邻友好带、战略稳定带、西部开发的直接外部依托以及重要的经贸与能源合作区，实现与近邻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安全。两国在中亚地区相互都是难以绕开的重大因素。上合组织得以建立与发展，两国在中亚地区存在共同利益与共同需求是其重要基础。两国在东北亚地区也是共同利益多于潜在竞争。两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和东北亚安全机制问题上协作紧密即是证明。考虑到美日同盟与北约实现对接的企图，中俄在共同周边的战略协作对于两国的国家安全意义更为深远。

两国的战略处境和战略需求相近，需要相互支持。两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均面临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及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均遭遇某些大国的战略遏制和战略挤压，互为战略伙伴是符合两国战略利益的历史性选择。面对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大变动、大调整，两个战略利益、战略理念相近的世界大国，两个快速发展中的新兴大国，必须联手协作互动。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建设“强大的俄罗斯”，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极。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强国。快速提升综合国力是今后几十年两国最具根本性的战略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的根本性前提是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为营造这种环境，两国也必须相互支持。

两国的战略理念与历史责任相近，需要共同努力。在世界多极化、文明多元化、民主多样化问题上，在维护国际战略格局平衡与稳定、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问题上，在反对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和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准则问题上，在抵制反恐、“人权”、核能利用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以及其他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上，两国有着广泛的共识与近似的理念。作为世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在全人类面前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等共同历史责任。战略理念和历史责任的相近性，既是战略协作的基础，也是联手合作的动力。

两国基本国情与发展模式相近，需要相互借鉴。中俄均是历史文化悠久、幅员辽阔的世界大国，同时又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新兴大国，两国面对的问题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俄罗斯的“主权民主”和“可控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

着许多相通之处。这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的亲近感，减少发展模式的竞争性，而且有利于相互借鉴，少走弯路。某些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确定国家关系亲疏的标准，并且以此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大搞“民主输出”，矛头直指中俄，正在将两国逼进同一条战壕。两国在坚持发展模式自主选择、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价值观问题上不能不相互支持。

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强，需要相互合作。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但面临日益加剧的人口危机；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俄罗斯军工、航天、航空、材料技术比较发达；中国轻工、电子、通信技术比较先进。中国有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俄罗斯有东部开发战略，可以相互接轨。中俄都是构建欧亚路桥的关键国家，两国在此领域加强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过境优势，增强各自地缘经济地位。俄罗斯要实现经济转型和调整经济结构，实施东部开发战略，亦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在能源领域，俄罗斯要摆脱对欧洲市场的过度依赖，绕不开稳定可靠的中国能源大市场。在军技合作领域，中国也是俄罗斯必须确保的“战略买家”。这种互补优势的充分利用，对两国的经济发展可望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两国都在快速崛起，需要相互支撑。两国都将处在快速崛起的关键期，对对方的崛起是欢迎还是遏制，关系到两国战略协作的基础。中国欢迎俄罗斯和平崛起，与西方大国对俄罗斯崛起的遏制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虽然存在某些疑虑，但是总体看不存在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亲西方势力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也在逐步为理智、积极地看待中国的“中国机遇论”所压倒。相互对对方崛起性质的积极判断，可望为两国的和平崛起提供重要支撑。

上述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展望未来，只要国际战略格局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两国高层不发生战略性误判，支撑两国关系发展的利益基础即有望长时间存在。

（二）保障机制

国家关系不仅要靠战略利益来支撑，而且要靠必要的机制来保障。中俄间各种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对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边界协定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两个文件的签订消除了两国历史上最大的遗留问题，以法律形式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奠定了最为重要的政治基础。“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基本方针的确立，对消除相互疑虑、加强睦邻合作意义深远。《中俄睦邻友好条约 2009—2012 实施纲要》的签署，对今后几年两国各领域合作的深化有望起到重要指引作用。

相互协调机制与避免冲突机制。例如，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政

府各部门间的混委会机制、高层战略磋商机制、深化各领域合作的相关机制，以及在关系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机制、在重大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上相互沟通机制，等等。这些机制为两国扩大共识、协调行动，预防和避免误解与冲突，推动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型国家关系准则。一是平等尊重。今天的两国关系不同于沙俄与满清之间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不同于中苏结盟时期“老大哥”与“小兄弟”的不平等关系，也不同于某些国家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建立在两个主权国家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二是互信协商。在大国关系中，中国与俄罗斯相互疑虑最少，战略性疑虑更少。通过协商、磋商解决问题，是中俄关系不断深化的重要经验。三是互利共赢。互利共赢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和新型国家关系准则的核心理念，也是我运筹国家关系的基本方针，在对俄关系上更是如此。俄罗斯也越来越认同“互利共赢”理念。中俄各领域的合作之所以不断扩展，“互利共赢”理念起到了重大作用。四是坚持“三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是中俄关系长期遵循的基本方针及平稳发展的重要保证。“三不”方针符合 21 世纪的时代潮流，对以“集团对抗”、“绝对安全”、“零和游戏”为特征的冷战思维构成了有力抵制。上述新型国家关系准则的确立，既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提供了根本性保证，也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树立了一面旗帜。

（三）既有发展

1996 年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对 21 世纪中俄关系的基本定位。主要包括两层意涵：在国际战略层面开展广泛协作；在双边关系层面进行务实合作。近年来，这两大合作均取得了积极进展，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在国际战略格局问题上，两国为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而共同努力。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两国联手抵制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霸权主义，一家说了算、为所欲为的单边主义，共同致力于建设一种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一个民主化、多样性、和谐共处的世界。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两国共同反对动辄武力相向及实施制裁的强权政治，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安理会权威和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准则，共同推动以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不论在伊拉克战争、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上，还是在反恐、国际军控、核不扩散问题上，两国都保持着紧密的协作。在国际经济问题上，两国都主张缩小南北差距，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改变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既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又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并且以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振兴。

务实合作日益扩展。政治关系方面，两国高层领导互访不断，安全和战略磋商实现机制化，战略共识不断增多，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关系方面，两国贸易额大幅增长，贸易结构逐步改善。两国签署《中俄石油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实现了油气合作的突破性进展。人文关系方面，两国文化团体、学术机构、政党和工青妇组织、旅游团组往来不断，民间交往日趋活跃，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日趋坚实。两国相互举办“国家年”取得显著成果，“俄语年”系列活动已经启动。军事安全关系方面，两国不仅在军事技术领域互为主要伙伴，而且在人员培训、情报共享等方面相互帮助。两国军队成功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第三次联合反恐演习正在积极筹备之中。自然灾害救助、重大国际活动安保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各领域合作中，两国则共同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

二、中俄关系的发展趋势

从总体趋势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俄战略协作有望更加紧密，务实合作有望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摩擦波折也在所难免。

（一）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俄罗斯深化对中国战略借重的紧迫感增大。俄格冲突导致俄与西方关系总体趋冷。俄罗斯“张扬式”崛起导致美等西方国家对俄战略疑虑增大。俄美间虽然不至于发生新的冷战，但是双方力避对抗的时代成为过去，两国关系进入冲突多发期，互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局面加速形成。为应对美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挑战，确保国家的快速崛起，俄罗斯借助中国的需求明显增大。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上与西方距离拉大，亦需要与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遭受西方打压的中国联手。正是在此背景下，近来俄罗斯深化对华关系的热情持续增高。

俄罗斯深化对华务实合作的动力增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大幅扩展，中俄形成了 300 年历史上首次强强并列的态势。俄罗斯看重、看好中国的和平发展，期望利用中国发展的机遇，搭乘中国经济的快车，加快与东亚经济的接轨。因此，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越来越成为俄罗斯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正是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发展对华合作的姿态日趋积极。

俄罗斯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对中国需求增多。世界金融危机与油价暴跌，不仅使俄罗斯陷入金融困境，而且波及到实体经济，多个大型国有企业发生资金短缺危机。俄罗斯经济形势日趋严峻，危机局面初步形成，急需世界其他经济体施以援手。中国外汇储备庞大，应对危机的能力相对较强。加强对华经济合作成为俄应对

危机、稳定经济的重要选择。在改造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问题上，俄罗斯也迫切需要与中国联手合作。上述情况促使俄罗斯对华合作姿态明显较前主动。中俄能源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军技合作重新启动，与俄罗斯陷入经济困境显然存在着某种关联。

（二）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因素仍然较多

由于大国、邻国相处存在特有的复杂性，加上相互沟通不够及时、相互了解不够深入、具体利益上存在差异，两国关系的发展仍然存在某些障碍。

政治互信依然不足，外交上的非协调问题仍然突出。政治互信不足集中表现为“中国威胁论”与“俄罗斯不可靠论”在两国仍有较大影响。俄罗斯某些人仍在散布“中俄力量对比失衡”、“中国人口扩张”、“中国经济扩张”、“中国领土要求”、“中国挤占俄传统势力范围”等损害两国关系的不实言论。在中国部分民众中，俄罗斯历史上侵占中国大片领土造成的阴影、对俄罗斯强大后重走扩张老路的担忧，短时间内亦难以消除。加上部分俄罗斯人缺少共赢思维、履约能力较差，因此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对其信任度不高。由于文化传统、行为风格不同，两国外交上的不协调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两国相互猜疑较多，都担心对方与美做交易，损害己方利益。最近美国某些人提出“中美国”、“中美共治”概念，在俄引起复杂反应。在上合组织建设问题上，两国的目标也有所不同，行动也不够协调。

两国各领域交往增多，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利益纷争。交往愈频繁，发生磨擦的几率愈高。俄罗斯人缺少自我反省意识，遇到分歧总是习惯于从对方找原因。一旦俄罗斯强大起来，很可能更加苛求于我，双方更加易于发生摩擦。中俄贸易结构失衡，对两国关系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受两国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的制约，这种失衡短时间内难以完全解决。另外，两国在经济与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度不高，利益相互捆绑的纽带较少，亦不利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

俄势力范围思维抬头，有可能导致中俄在中亚发生摩擦。势力范围思维是俄罗斯的传统安全观念。近年来随着俄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增长，恢复对传统势力范围的有效控制成为俄众多精英与民众的强烈诉求。势力范围思维具有很强的控制性与排他性，不符合时代潮流，必然引起被纳入势力范围的中小国家的抵制及被排斥大国的反弹。俄罗斯恢复势力范围的努力，正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引发与地区国家及美、欧愈来愈多的冲突，存在导致中俄在中亚发生摩擦的危险性。

俄极端民族主义升温，中国与俄打交道的难度增大。俄罗斯一向大国主义意识强烈，民族和文化优越感突出。随着国家走向强大，其大国主义可能会有新的发展。俄罗斯国力上升而国际处境艰难，易于产生极端情绪。中俄比邻而居，移民问题、

边境管理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易于引发敏感反应。上述问题均可能刺激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升温，不排除某种情况下集中指向我国的可能性。

尽管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基本上属于前进中的问题、支流性的问题，但是对两国关系的消极影响不容小视，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消除。

综上所述，中俄关系的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前景看好。两国战略利益有望长时间广泛一致，两国相互借重有望进一步增多，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有望进一步夯实，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望持续深化。对中俄关系，我们既要有信心，又要悉心经营。要切实贯彻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五个伙伴关系”对俄工作方针，保证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中俄关系不仅要造福于两国人民，而且要为世界的安全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常喆）

专题文稿·俄罗斯经济转型

俄罗斯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风险及前景构想

B. 马乌*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的前8年，俄罗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国际、国内的挑战与危机，特别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粹主义政策所带来的风险。俄罗斯制订的前景构想的纲领性文件，意在从惯性与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转向创新型的发展道路，但国家干预的色彩依然很浓。作者认为俄罗斯特别需要保证长期稳定。

【关键词】挑战 自然资源 民粹主义 构想 稳定

【中图分类号】F13/1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010-(12)

一、俄罗斯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

2000年—2007年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见下表）。这些成果是制订国家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

表1 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基本宏观经济指标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国内生产总值(十亿卢布)	4,823	7,306	8,944	10,831	13,243	17,048	21,620	26,781	32,988
同上年相比(%)	106.4	110.0	105.1	104.7	107.3	107.2	106.4	107.4	108.1
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1,328	1,768	2,096	2,379	2,975	4,104	5,325	6,897	8,612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				103.1	108.9	108.3	104.0	103.9	106.3
农产品生产(同比%)	104.1	107.7	107.5	101.5	101.3	103.0	102.4	102.8	103.3

* B. 马乌(B. May), 经济学博士, 俄罗斯联邦政府国民经济学院教授。

固定资产投资									
十亿卢布	670.4	1 165.2	1 504.7	1 762	2 186	2 865	3 611	4 580.5	6 419
同比 (%)	105.3	117.4	110.0	102.8	112.5	113.7	110.7	113.7	121.1
累计外资 (十亿美元)							111.8	142.9	220.6
外国投资 (十亿美元)	9.6	11.0	14.3	19.8	29.7	40.5	53.7	55.1	120.9
其中									
直接投资	4.3	4.4	4.0	4.0	6.8	9.4	13.1	13.7	27.8
金融投资	0.031	0.145	0.451	0.472	0.401	0.333	0.453	3.2	4.2
其它	5.3	6.4	9.8	15.3	22.5	30.8	40.1	38.2	88.9
外贸总额									
十亿美元	115.1	149.9	155.6	168.3	212.0	280.6	369.2	468.6	578.3
同比 (%)	86.9	130.2	103.8	108.1	126.0	132.4	131.5	127.0	123.4
出口									
十亿美元	75.6	105.0	101.9	107.3	135.9	183.2	243.8	303.9	355.2
同比 (%)	101.5	139.0	97.0	105.3	126.7	134.8	133.1	124.7	116.9
进口									
十亿美元	39.5	44.9	53.8	61.0	76.1	97.4	125.4	164.7	223.1
同比 (%)	68.1	113.5	119.8	113.4	124.8	128.0	128.8	131.3	135.4
零售贸易总额同比 (%)	94.2	109.0	111.0	109.3	108.8	113.3	112.8	113.0	115.2
消费价格指数(同上年12月相比,%)	136.5	120.2	118.6	115.1	112.0	111.7	110.9	109.0	111.9
工业品生产者价格指数(同上年12月相比,%)	170.7	131.9	108.3	117.7	112.5	128.8	113.4	110.4	125.1
平均失业人口数									
百万人口	9.4	7.6	6.4	5.8	6.2	6	5.6	5.3	4.6
同上年相比(%)	116.0	82.0	83.2	89.2	107.3	96.1	90.2	95.6	88.3
同有经济活力人口相比(%)	13.0	10.5	9.0	8.1	8.6	8.3	7.7	7.3	6.1
工人月平均名义工资(卢布)	1 523	2 223	3 240	4 360	5 499	6 740	8 555	10 634	13 518
工人实际工资 (同比%)	78.0	120.9	119.9	116.2	110.9	110.6	112.6	113.4	116.2
人均月收入(卢布)	1,658.9	2,281.1	3,062.0	3,947.2	5,170.4	6,410.4	8,023.2	9,947.3	12,490.0
国际储备资产(十亿卢布)	12.5	28.0	36.6	47.8	76.9	124.5	182.2	303.0	476.4
俄罗斯贸易体系指数				359.07	567.25	614.11	1,125.6	1,921.92	2,290.51
俄罗斯稳定基金总额									
十亿卢布					106	522.3	1,237.0	2,346.92	3,849.1
十亿美元						18.8	43.0	89.1	156.8

来源：俄联邦统计局，俄联邦财政部，俄联邦中央银行（Росстат, Минфин РФ, ЦБ РФ.）

近年来俄罗斯完成了创建市场经济制度基础和危机过后再生生产的任务，确保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有了设定更高的战略发展目标

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不仅要解决内部问题，同时还要应对反映世界趋势的一系列体制性的、长期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全球性竞争更加激烈。全球性竞争覆盖的范围不仅包括传统商品市场、投资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且还包括国家管理体制、创新体制和人类潜能发展体制。近 10-15 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可能是：

现代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以及中国和印度成为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

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

创新加快，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加强；

依靠提高能源效率和开发新能源，克服发展中的能源瓶颈；

限制影响生态、淡水供应和气候变化的增长；

世界经济结构的变革是当前这一时期的特点，其主要特征是：已有的经济中心与上升之中的区域经济联盟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对于俄罗斯经济来讲，在俄罗斯经济竞争力不断提高和创新不断加强的条件下，这样的转变为俄罗斯对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扩大，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要提高俄罗斯的经济竞争力，同时也需要俄罗斯具有创新和吸引投资的能力来应对这样的转变。

第二个挑战——即将到来的技术改革新浪潮。技术改革新浪潮将明显地提高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能保证很多传统的增长因素。最近 10 年发达国家逐步形成了经济体制的新技术基础（包括使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的最新成果）。俄罗斯具有科研潜能和高科技生产能力，这为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创造了条件。但是在最新一代技术研发上的落后，降低了俄罗斯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并使得俄罗斯被世界经济的发展边缘化。现在除了个别领域以外，俄罗斯在国际高科技产品市场上严重缺乏竞争力。在世界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上，俄罗斯的份额仅为 0.2%(60-80 亿美元)。以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以及在国际市场上高科技商品和服务的迅猛发展，既为俄罗斯技术突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增加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俄罗斯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应该每年增长 15%-20%，到 2020 年，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不低于 800 亿-1000 亿美元（大概占国际市场份额的 1%）。

第三个挑战——在国际上，作为经济发展基本因素的人力资本的作用不断增加。现代创新经济竞争力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人才的素质及其社会化和合作化的水平。俄罗斯不可能通过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节约，来维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俄罗斯而言，应对这一挑战，必须扭转那些阻碍人的

潜能发展的消极趋势。

第四个挑战，不仅是由全球因素引发的，也是由俄罗斯内部原因造成的——即建立在快速增加能源和原料出口基础上的俄罗斯发展模式，面临着无以为继的困境。随着国际市场能源需求的降低以及替代能源的发展，俄罗斯原料出口型模式的危机将会明显加剧。据一些国际机构预测，到 2030 年，在世界能源需求结构中，石油的比重将下降到 33%，天然气比重将增加到 23%，替代性能源的来源也将有所增加，预计包括液化天然气在内的新能源载体市场将迅速增加。

问题的严峻性在于，俄罗斯要在人口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实现后工业时代的突破的发展任务，这在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俄罗斯人口数量下降依然是主导趋势。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到 2020 年，俄罗斯人口数量将从 2007 年的 1 亿 4190 万降到 1 亿 3800 万。与此同时，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从 8980 万减少到 7750 万），到 2030 年，俄罗斯总人口将缩减至 1 亿 3300 万。

二、俄罗斯所面临的资源与政策风险

（一）丰富的自然资源——风险增加的来源

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视角来评价自然资源的作用，是一个比较难于回答的问题。最近有一种广为流传观点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由高油价决定的。如果油价降低，则经济增长也将缩减——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从经济增长变为经济衰退。事实上，自然资源在确保经济高速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无疑，原料领域（尤其是能源）如同在苏联后期的经济中一样，今天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中也起着相当巨大的作用。我们需要认识到对能源的巨大依赖不仅仅是经济的脆弱之处，同时也是政治的脆弱之处。苏联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当时急剧下跌的石油价格有关的；而在上世纪 70 年代，苏联经济增长则与高油价紧密相连。当然，也不能把当时的情况与现在进行直接的类比。

丰富的自然资源收益（尤其是高油价）在促进某些领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基于结构调整的长期增长制造了障碍。

下面可以列出一些由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而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著名的“荷兰病”：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加速本国货币汇率上涨，从而降低其他经济部门的竞争力。俄罗斯财政部门所采取的控制卢布汇率的措施，又加速了通货膨胀。

第二，原料领域的高额利润，降低了对其他领域的投资动力，因此制约了结构转型，不利于经济多元化的发展，结构改革也因此放缓。

第三，出现了预算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之间的冲突。“廉价货币”（Дешевые деньги）可以减轻预算负担和增加预算调整的能力，但与此同时，相当大部分的经营 者不再关注内需领域内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第四，政府受到经济平民主义和腐败的影响。由于大量财政资源的存在，使得院外游说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人不仅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政府代表（负责解决具体领域问题）。政府逐渐难于应付这种压力，所以预算支出开始不受控制地增加，加大了未来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

第五，一些研究表明，燃料能源资源越是丰富的国家，其人力资本（首先是教育）发展的水平相对较低^①。这可以解释为：在不需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就有大量的资金流入，这样社会对于人力资本的兴趣就会降低。总体而言，原料领域对劳动者的能力要求很低，所以这些领域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就会降低对教育服务的需求，而从长期看，这会造成相当危险的后果。

可能的石油价格下降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是单一的。较低的石油价格，以及经济增长对外来资源依赖的下降，可能有利于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为此需要有适当的经济政策在下列两个方面都能够适应。第一，在高价格市场行情的阶段，保证预算不过分增加对“廉价货币”的依赖；第二，在行情变坏的阶段，可以通过货币机关的调节行为对此作出正确的反应。

采取适当政策的前提是降低对高油价的结构性依赖。原则上讲，如果石油价格在将来也能保持同一个水平的话，这种依赖并不可怕。主要的危险在于，如果经济结构（需求和供给，进口和消费结构）在高度依赖出口的状态下形成的话，当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结构危机，并很有可能伴随着政治危机。

16-17 世纪的西班牙是因丰富的自然资源收益流入而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结构受损最早的案例之一。在 16 世纪初，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和良好的预算，建立了帝国并觊觎超级大国的地位。然而，从美洲殖民地流入的黄金和白银，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使得国家预算陷入了长期的亏空，最终导致帝国的瓦解。在以后的四百年时间里，西班牙都没有能够从 16 世纪的危机中解脱出来。^②

这些问题，在我们国家不久前的历史上重复出现。苏联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投资政策有关。当时石油价格急剧上升，使得经济政治形势有所好

① Гильфасон Т. Природа, энерги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ВШЭ., 2001. Т. 5. № 4. С. 473-474.

② 详细的分析，参见：Мау В.А. Уроки Исп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ли Ловушки ресурсного изобилия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Ежегодник. 2005. М.: РОССПЭН, 2005.

转。与此同时，在 60-70 年代之交为提高苏联经济效率和应对新挑战（后来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挑战）所制订的经济政策被搁置。同时，苏联经济出现了结构转型：从 60 年代前对国际市场行情的低度依赖，转为国内事务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明显增强。不到 10 年，苏联经济，尤其是消费品市场（包括食品），陷入了对进口的依赖，苏联国内开始实行“石油（和燃气）换食品”的计划。这样的决策失误延缓了亟需的经济和结构改革，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瓦解。

墨西哥是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个例子。墨西哥政府借助于高油价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于是决定寻找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简单方法。^①通过发展国营企业，墨西哥快速走上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保证经济独立的道路。实施了各种投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从 3-4%（1975-1977 年）提高到 8-9%（1978-1981 年），而投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16%。然而，依然有预算赤字，因为政府预计到未来的收入，进行了大量的借款。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石油价格开始下跌，情况变得严峻起来：国内生产总值开始下降，比索贬值超过 40%，外债从 1979 年的 400 亿美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970 亿美元。资金外流明显加快，黄金储备降至 18 亿美元。墨西哥的波蒂略总统在上台之初，国内外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然而在其六年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对他的评价变成“浪费国家石油收入、奇怪的外债以及预算支出超额”。波蒂略下台后被迫移居国外。当他在 2004 年逝世时，墨西哥政府甚至都没有为他举行国葬。

最后，伊朗也是需要提及的国家。伊朗的君主制度起初受益于石油价格的上涨，但此后却垮台了。伊朗君主制度的垮台发生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高涨的时刻，而不是油价下跌的时候。这里不稳定的关键因素是巴列维君主制政府所推行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缺乏经济和社会基础，其结果是社会矛盾加剧，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爆发了“伊斯兰革命”。

20 世纪 70 年代政府对于他们的失误辩解说，当时没有应对石油价格下跌的经验。石油开采国的领导们也可能曾天真地认为：未来的石油价格仅仅只有上升多少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对科学家（不过，是极少数）的警告不满地责问：难道我们能给汽车加水吗？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这种辩解了，重大的经济政策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俄罗斯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既可能上涨，也可能下降，其动态是无法预测的。

当然，以上所列举的因素和情况不是绝对的。资源丰富，同时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也有，当然这些国家更多的是依靠经济政策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本身。在资源丰富的时候，政治发展水平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相当少见）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的国家，一旦拥有丰富资源，也会对整个国家造成损害。

① 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当时骄傲地指出，“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管理财富的增长”。

即便在这些现代民主制度完善，社会政治体系高度发达，国家能源政策的研究和制订程序透明，腐败率接近于零，经济是多元化并且高效的 国家，也会在某个时段受到丰富资源的掣肘。英国和挪威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北海发现石油之后，两国突然间拥有了丰富的石油。这两个国家能够相对成功地应对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源，没有出现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即便如此，政府政策也经受了严重的平民主义考验。从中期来看，挪威近 20 年的经验表明，其经济政策的质量在各种院外游说的压力之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降。^①

现在俄罗斯碰到了相当高的风险（与对外经济行情相关）：俄罗斯采取的那些对国际市场行情严重依赖的决定，以及几乎单一产品的出口模式，都是相当危险的。此外，对“廉价货币”的信心，可能导致预算扩张，大量的资金会刺激新的利益集团向国家要钱。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在社会领域、军费开支等几个方面，实际上还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所以即使是在燃料动力综合体的产品价格水平很高的时候，俄罗斯仍然可能陷入预算赤字的陷阱。

（二）平民主义的风险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平民主义经济政策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大。经济领域内的平民主义，其本质是采取简单的、容易的决定，刺激经济增长，提高政权的支持率。

刺激经济增长的许多平民主义药方是众所周知的，如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加强国家对价格、商品和资本流动的控制。近 100 年来，数十个国家试图采取类似的方法实现突破发展，但都或早或晚遭受严重的挫败。阿根廷就是典型的例子。阿根廷在 20 世纪初就进入了世界十大最发达国家行列，但在近几十年里其世界排名急剧下滑。苏联的经验也是一个明证。虽然它覆盖了较长的时间段，也包括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其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最终还是不能骗过经济规律。

对于平民主义经济政策的扩展规律，已经在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进行了实证研究。平民主义政策的规律在多恩布什和爱德华兹的经典著作《拉丁美洲平民主义宏观经济学》中有着详细的分析。^②他们描述了平民主义计划实施的一般过程：第一阶段，政府加快经济发展，把出口获得的资源转移到能增加“民族自豪感”的领域（通常是机械制造），同时通过提高工资刺激需求；经济和福利开始提高，政府的支持率随之上升。第二阶段，宏观经济出现失衡（贸易和支付平衡恶化、外汇储备缩减、外债增加、预算困难增加），但在这一阶段，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这些“小事”

① 参见：Hoj J., Wise M.,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Norway*, OECD Economic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 389, Paris: OECD, 2004.

② Dornbusch R., Edwards S. (eds),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很少有人担心。第三阶段，在国家控制的领域里，贸易赤字增加，价格快速上升，抑制价格上升又导致了贸易赤字的恶化，接下来是本国货币不可避免的贬值，并引发了通货膨胀，税收减少，预算崩溃，人民福利水平下降。第四阶段，政府倒台，而新的（通常是军事性的）政府，按右翼自由主义的药方，采取极端措施稳定社会经济局势。

不能认为上述情况不适合于当代的俄罗斯。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两年间，在加快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方面，俄罗斯在政治上出现了平民主义的观念，这是典型的左翼的做法，其纲领措施十分类似于 20 世纪 30-50 年代拉丁美洲政府和左翼平民主义政党的做法。平民主义方案的基本特点是（也适用于当代的俄罗斯）：

—— 所有权和收入的重新分配（“确保公平”）

—— 恢复累进税

—— 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传统意义上的），即把“民族自豪感”领域作为优先，并通过预算和税收政策的倾斜加以支持；

—— 提取出口导向领域的额外收入，用于“优先”发展方向；

—— 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放弃联邦预算盈余，转为赤字预算，把资金用于扩大内需。甚至提出动用中央银行储备以发展经济的建议。

—— 部分恢复国家调控价格。

尝试实施这样的做法，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以及俄罗斯国家机关腐败的进一步恶化。

平民主义不仅有左翼的（建立在旧式的国家指导一切的思想之上），还存在右翼平民主义的危险（虽然今天少得多），即对经济发展的复杂问题加以简单地应对。右翼平民主义，指望着在大幅降低经济的预算负担（扩大“经济自由”）之后，出现经济增长的浪潮。

但是，在实际政策的层面，这种“单一尺度”看待问题的方法，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危险。在这种视角下，经济增长和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静止的，并没有对实际的各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因果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这种观点认为，低经济负担的国家发展速度较快，以及经济发展和经济自由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但由此完全不能得出结论：扩大经济自由将直接、必然带来经济增长。有很多理由（和很多 20 世纪历史的例子）可以确认，经济发展为经济自由度的上升创造了条件。或者更准确地说，增长与自由是并行的，相互促进向前发展。存在着这样彼此影响的机制是因为，增长能促进个人发展，个人的发展开始要求政治和经济自由，因此会对政府的平民主义做法起到抵制和矫正，有助于实施稳健的经济路线，为经济增长奠定健康的基础。

此外，即便是那些处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国家，在低预算负担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意味着降低预算负担就一定能出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局面。波兰、捷克或者匈牙利，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相比，其 GDP 中的国家份额的缩减比俄罗斯慢得多，但他们经济增长的恢复速度要比俄罗斯快得多。另外，预算负担的下降，通常发生在经济稳定增长条件下，而不是在经济深度萎缩的时候。

对复杂问题寻求简单答案，这是平民主义的典型特点。平民主义无论什么形式永远是危险。不过在今天的俄罗斯，更危险的是左翼平民主义与干预主义，他们自以为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优先与需求拥有绝对正确的认识。

二、俄罗斯未来经济增长的模式和构想

当前关于恰当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焦点，集中在国家作用这一问题上。这不仅符合传统的俄罗斯（和苏联）对于国家在解决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中的作用的认知，同时这一问题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实际上，解决赶超发展的任务，国家的行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但问题是，很多对俄罗斯国家作用的公开评论，都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谈，尽管从结论上看都是很正确的，但缺少特别之处。^①

在俄罗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把经济增长与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相结合的 4 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左派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模式。根据该模式，国家是主要的经济主体，投资过程只能由国家负责。这种模式主张把财政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在国家手中，并由国家根据其优先发展方向进行资源再次分配。在这一模式中，贸易保护主义也是重要的内容，用来保护国内生产免受强大的外国公司竞争。这一模式建议实施积极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政策”。

第二种办法，主张加强大型企业（金融工业集团，或商业集团）的投资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样的形式能够确保资源的集中（财力和智力资源），还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得益于金融、生产和研发机构的联合）。

第三种办法，提出大幅缩减预算负担，使其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平均指标相符（把预算负担从占 GDP 的 36%-38%降低到 20%-22%）。

第四种办法，主张国家采取积极政策，为国内外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鼓励企业的经营，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为此需要建立适当的制度，包括相关的立法和有效的执法体系。

^① 参见，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эпоху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М.: ИМЭМО РАН, 2001.应当指出，这部作品集的作者们在其中明确地阐述了关于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经济角色的争论的局限性的问题。

不难发现，就本质而言，前两个办法可以看作是国家干预型的，后两个办法是自由主义的主张。虽然这几种观点的拥护者现在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但这些主张内在是紧密相连的。干预主义和自由制度模式之间的辩论逐步激烈。但到普京政府晚期，恰恰是这两种模式共同主导着的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另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不断上升。

表 2 俄罗斯 2011-2020 年社会经济发展构想

参 数	2011-2015	2016-2020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		
1	103.2	103.2
2	105.7	105.0
3	106.3	106.6
工业生产年均增长 (%)		
1	102.3	102.3
2	104.7	104.2
3	105.2	105.0
投资年均增长 (%)		
1	102.8	104.3
2	109.2	107.4
3	110.2	110.1
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		
1	104.3	103.9
2	106.2	105.0
3	107.2	106.9
实际工资年均增长 (%)		
1	104.4	103.9
2	107.5	106.0
3	108.2	108.2
零售商品额年均增长 (%)		
1	104.2	103.9
2	105.9	104.7
3	106.6	106.4
出口年均增长 (%)		
1	101.3	101.8
2	103.3	103.5
3	103.5	104.5
进口年均增长 (%)		
1	101.7	103.5
2	106.2	104.9
3	106.9	106.7

1-惯性构想；2 - 原料出口构想；3 - 创新构想。

来源：俄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在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中，俄罗斯政府制定了自己保证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同时也进行了深入的机构改革，以减轻俄罗斯出口和生产中对原料的依赖。在《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中，俄罗斯把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名（按 GDP

规模)作为当前 12 年的目标,为此制定了三个长期发展构想:惯性构想,原料出口构想和创新构想。三个构想的基本数据见上表。

*惯性构想。*保持原料能源领域的优势,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燃料动力综合体的开采和出口增长速度将会逐渐降低,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不超过 3.5%。在此构想中,实施超出燃料动力综合体框架的大型投资项目的可能性很小,但有可能导致社会和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人力资本质量下降,加工产品竞争力下降,并导致进口替代效应。

*原料出口构想。*建议积极发挥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竞争优势,建设能够增加俄罗斯传统出口领域生产潜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年平均增长可连续达到 5.5%。能源和交通领域会被重点发展,同时由于这些领域本身的特点,国家在组织和调整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将加强。此构想的实施也意味着,燃料综合体的产品与原料对世界价格行情的依赖将增强。

*创新构想。*利用在原料燃料方面的竞争优势,使俄罗斯经济实现多样化和更新。在这个构想中,人力资源素质的巨大飞跃和利用,对高技术产品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可达到每年 6—6.5%。就其本质而言,这是属于后工业崛起的构想,根据该构想,俄罗斯有能力在全球化的世界劳动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一构想提出实行结构调整策略,从而使创新领域的比重从现在的占 GDP 的 10%增加到 20%,而石油天然气领域的份额则由现在的占 GDP 的 20%降低到 10—12%。

这三种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分别以尼日利亚、墨西哥和澳大利亚来说明。尼日利亚丰富的能源资源导致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停滞和退化,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在现存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墨西哥充分利用了毗邻北美市场的优势和丰厚的石油收入,保证了经济的显著增长,同时实现了经济适度的多元化与人力资本的初步发展。澳大利亚则展示了成功的经验,作为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实现了经济的多元化。在将自然资源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获得大量收入的同时,澳大利亚把这些资金用在了国内生产的多样化和现代后工业经济的形成。^①

上述三种构想不应该被看作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俄罗斯经济向前发展的不同阶段。最理想的发展方案是:惯性构想向能源出口转变,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澳大利亚国家的经验),再培养社会经济发展向创新机制的方向转变。换言之,第一和第二种构想只是解决俄罗斯发展这一战略任务之路上的过渡阶段而已。但如果不能够完成由一种阶段向另外一种阶段的转变的话,这三种构想也可能成为非此即彼的

^① 详见: Мау В.,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ильные и слабые стороны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2006. № 2; Брич А. Путь России к процветанию в пост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м мире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03. № 5.

事实。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一种增长模式向另外一种增长模式转变的条件是什么？原则上有两种机制：资金与制度。国家发展模式的改变，可以通过对特定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国家（或与国家有关的）投资来实现；以及通过进行深刻的制度改革——为经营者创造良好的条件，刺激各领域的快速发展和保证人力资本的发展——来实现。

在俄罗斯选择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我们遇到了现实的抉择问题。俄罗斯的战略是建立在国家干预的思想基础上的，主张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为此，国家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和财政基础。隶属于国家的集团，或者是实际上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的集团，是主要的玩家。国家财政开始在资助大型经济项目（不仅是基础设施项目）中扮演积极角色。对于那些被国家认为是最好的领域，建立了专门为这些领域创造特殊条件的“发展制度”（институты развития）。在国家的主导下建立了一个包括所有制、破产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内容的制度体系。

这种模式在某一阶段，如巨大的财政资源流入国家预算的情况下，确实能够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和私人投资相比，国家投资效率低下。

对于俄罗斯而言，在其社会经济政策的中期前景优先发展方向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慎重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建立良好经营与投资环境的最重要条件，这种政策应具有的特点是：远见性，对外部变化的适应性，以及透明性。2008年的危机表明，俄罗斯所取得的稳定是相当脆弱的，而推行不会引发体制动摇的重大政策是相当重要的。

（林晶 刘岩 译，肖辉忠 校）

【Abstract】 During the first 8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Russi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also faced unpreceden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and crises, especially risks from policies of rich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pulist policies. The Russia's programmatic document of the idea of development intends to shift from past resource-dependent development model toward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but there is still a very strong state inter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Russia particularly needs to ensure a long-term stability.

【Key Words】 Challenge, Natural Resources, Populist, Proposal, Stability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ызовы, природные ресурсы, популист,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责任编辑 肖辉忠）

200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李 新*

【内容提要】俄罗斯 2020 年发展战略实质是要彻底调整经济结构，转向创新发展模式。本文对俄罗斯现有经济结构变化的消极趋势和积极趋势进行了分析，对 2020 年发展战略的目标、手段和措施进行了客观评述。

【关键词】俄罗斯 发展战略 经济结构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3/17.512.4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022-(13)

俄罗斯经济创造了惊人的奇迹。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 8 年来，俄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 1.5 倍，失业和贫困水平降低了一半，经济稳步发展。2000—2007 年间，俄 GDP 总量增加了 72%。2007 年 GDP 增长率达到近 7 年来的最高水平——8.1%。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6975 亿美元，仅次于美、中、日、德、法，居世界第六位，人均 11861 美元，迅速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8 年来，商品进出口总额增加了 4 倍，吸引外资增加了 6 倍，而在此之前资本外逃每年达 100—250 亿美元不等。2007 年俄罗斯资本净流入达到创纪录的 823 亿美元，证券市场市值是 1999 年的 22 倍。国家外债已经减少到 GDP 的 3%，这是世界上最低的指标。截至 2008 年 7 月 1 日，俄罗斯国家外汇储备达到 5683 亿美元，2008 年年初，稳定基金也达到了 1600 亿美元。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自主整体上得到了保证。最近两年俄罗斯正在兴起真正的投资和消费高潮。开始了大规模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机械制造和住房建设计划，飞机和船舶制造业正在进行结构改革，汽车和铁路生产吸收了大规模的投资。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然而，其经济结构的调整任重而道远。

* 李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室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俄罗斯经济结构变化的消极趋势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国际市场日益高涨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俄罗斯副总理、财政部长库德林说，俄罗斯依靠石油 8 年共赚取了近 5000 亿美元收益^①。2007 年俄罗斯原油和石油制品出口实物量比 1995 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分别达到 2.6 亿吨和 1.1 亿吨。

1、“荷兰病”威胁俄罗斯经济

2005 年 2 月，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发表报告称，俄罗斯已经患上了“荷兰病”，石油出口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卢布坚挺，威胁工业的竞争力。从长期来看，“荷兰病”会造成资源从加工部门向采掘部门转移，导致增加值减少。经济长期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会削弱加工业发展的动力和高新技术的发明和创造。2008 年上半年俄罗斯能源部门对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48%，而生产最终产品即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的贡献只有 23%。能源部门在工业中的比例达到了 35.6%。商品出口当中原料占 89%，其中能源占 64%。2008 年 1 月库德林指出，近 7 年来卢布对一揽子货币有效汇率升值了 85%，是世界升值速度最快的货币^②。本国货币的升值导致了进口的增加。2008 年 1—5 月商品进口增加了 48.5%，进口满足了居民新增消费的 70%，占有商品资源的 43%，严重威胁本国工业。近 7 年来，俄罗斯进口商品年均增加 26%，超过所有的大国如印度和中国（23%）、美国和日本（7%）。进口商品在国内消费中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30% 上升到 2007 年的 53%。同时，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2000 年以来 CPI 年均上涨 13.7%，而 PPI 则更是高达 18.5%。

2、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经济的原料和能源化趋势不断加强。

2007 年与 1991 年相比，所有经济部门中增长幅度最大的除了电力、电子和光学仪器设备生产外就是能源开采。最薄弱的是纺织工业，年均增长率只有 3.9%，是 1991 年的 20% 多，运输工具和设备生产平均增加 4.2%，与机器设备生产增幅一样只有 1991 年的 60%。从各经济部门的盈利率来看，最高的当属能源开采，但机器设备以及运输工具和设备的销售盈利率平均只有 8% 和不足 7%，纺织业不足 5%。俄罗斯产品竞争力极其低下，只能出口原料产品和粗加工产品。这一趋势到 2000 年代得到进一步强化。包括能源在内的矿产品出口从 1995 年的 333 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2280 亿美元，增加近 6 倍。在出口商品结构中，从 1995 年的 42.5% 增加到 2007 年的 64.7%。本来所占比重就不大的机械产品出口 2007 年与 1995 年相比几乎减少

^① 参见：<http://www.investor.ua/news/141-11648.html>

^② 参见：<http://www.rian.ru/economy/20080130/97992059.html>。

了一半，不足出口额的6%。

表1 俄罗斯能源开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1992	200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矿产开采产值环比指数	88.2	106	107	108.7	106.8	101.4	102.5	101.9
产品销售盈利率，%	19.2	32.5	35.6	30.6	31.5
开采煤炭，亿吨	3.37	2.58	2.56	2.77	2.82	2.99	3.1	3.15
开采石油(含凝析油，亿吨)	3.99	3.24	3.8	4.21	4.59	4.7	4.81	4.91
开采天然气(10亿立方米)	641	584	595	620	633	641	656	651

资料来源：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2008: Стат.сб./Росстат. - М., 2008. - стр. 210.

2、第三产业比重下降，金融服务业严重滞后。

2000年以来，俄罗斯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了43%，所占比重从56.4%上升到60.9%。2002—2006年间，第三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增加了1.2倍，低于第二产业的1.8倍，同时所占比重也从59.6%下降到55.8%。在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中，第三产业相应地从49.7%下降到2005年的46.9%。第三产业内部，比重最大的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汽车、摩托和个人日用品、物品的维修服务，一直保持在32—33%，其次分别是运输和通信以及房地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保持在19%和16%左右。但是金融业发展缓慢，2006年其在服务业产出中的比重不足6%。宾馆和饭店服务的比重更是不足2%。

3、投资结构失衡，融资渠道单一。

尽管近年来俄罗斯出现了投资热潮，但投资结构不均衡。投资的主要领域分布在交通和通讯部门、房地产业、加工业和能源开采，对国民经济装备工业投资严重不足。2000—2007年期间机器设备生产投资比重平均只有0.86%，运输工具和设备生产也只有1.2%。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农业投资比重依然偏低，为4.2%，不过具有稳步增加的趋势。外商投资中，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平均只有25.6%，而且具有下降的趋势。各种贷款比例过大，平均高达71%（见表2）。截至2007年底，累积吸收外资2206亿美元，其中88%投向了加工业、贸易和各种维修领域、能源开采和冶金行业。直接投资总额1030.6亿美元的87%投向了加工业、能源开采和冶金行业。贸易和维修部门吸收的外资主要是各种贷款，累计高达495.2亿美元，是累计外资总额的近1/4，累计贷款总额的44.7%。

表 2 俄罗斯吸收外商投资的种类

	1995	200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外资总额 (亿美元)	29.83	109.6	197.8	297	405.1	536.5	551.1	1209.4
直接投资, %	67.7	40.4	20.2	22.8	23.3	24.4	24.8	23
证券投资, %	1.3	1.3	2.4	1.4	0.8	0.8	5.8	3.5
其他投资, %	31	58.3	77.4	75.8	75.9	74.8	69.4	73.6
其中:								
商业贷款, %	6.3	14.1	11.3	10	9.5	11.2	16.8	
其他贷款, %	16.5	43.2	65.4	64.7	65.2	62.9	51.6	
其他, %	8.2	1	0.7	1.1	1.2	0.7	1	

资料来源: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7: Стат.сб./Росстат. - М., 2007. - стр. 723.

2007 年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 企业自有资金占 45%。说明企业经营状况逐步好转, 但同时也说明企业经营的开放度不高。在企业外部融资当中, 2000 年以来平均有 23.8% 的资金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企业间贷款进行的, 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的比例很低。证券市场不发达, 企业主要通过自有资金和少量的贷款进行投资, 从而制约了投资规模的扩张。

4、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制约消费增长。

俄罗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资性劳动报酬, 所占比例从 2000 年的 62.8% 提高到 2007 年的 70.4%, 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较低。同时, 俄罗斯居民货币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衡。占居民总人口 20% 的低收入阶层所拥有的货币收入从 1995 年的 6.1% 减少到 2007 年的 5.1%, 而 20% 高收入阶层所拥有的货币收入从 1992 年的 38.3% 增加到 2007 年的 47.8%, 也就是说 20% 的高收入阶层占据了近 50% 的货币收入。收入差距从 1992 年的 8 倍增加到 2007 年的 16.8 倍。相应地, 基尼系数从 1992 年的 0.29 上升到 2007 年的 0.42。一般来说, 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 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 但受到收入总量的限制。所以, 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制约了国内消费的进一步提升, 对经济增长不利。

5、地区间差距拉大, 区域发展不均衡。

2007 年, 占国土面积 3.8% 的中央联邦区集中了 26.2% 的人口、35.2% 的地区总产值、30.4% 的加工业产值、企业盈利的 49% 和 24.2% 的投资。最大的远东联邦区占国土面积 36%, 而人口只有不足 4.6%, 生产的地区总产值只有 4.4%, 只获得了 6.3% 的投资, 甚至不足莫斯科市的 60%。中央区人均月货币收入 16812.8 卢布, 莫斯科更是高达 34539 卢布, 而南部联邦区只有 8724.7 卢布, 是莫斯科市的 25%。中央区、伏尔加河流域和南部联邦区集中了近 70% 的农业产值。2006 年中央区吸收了

301 亿美元外商投资，占全国的 54.6%，仅莫斯科市就集中了 43.5% 的外资，而南部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的这一指标分别只有 12.6 亿和 19.1 亿美元，分别仅占 2.3% 和 3.4%。

6、研发投入不足，科技进步停滞不前。

由于科研经费不足，俄罗斯科学院的某些重点实验室被迫关闭，科技人才大量流失。俄罗斯从事科学研究和设计的机构数量从 1992 年的 4555 家减少到 2006 年的 3622 家，科研机构从 2000 年的 2686 家减少到 2006 年的 2049 家，设计局从 1992 年 865 家减少的 2004 年的 194 家。1992 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有 153.3 万人，到 2006 年减少了近 1 半，只有 80.7 万人，其中研究人员只有 38.9 万人，其他均为低级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据联合国专家估计，俄罗斯因科技人员外流每年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 30 亿美元。科技领域的危机直接影响到经济的技术结构，高技术综合体部门严重萎缩。

二、俄罗斯 2020 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扭转俄罗斯经济结构的政治决定

在整个苏联时期就存在这种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决，社会主义具有无比优越性的意识形态，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苏联在 1960 年代以前依靠牺牲农业和轻工业，1970 年代又主要依靠大量的能源出口，集中一切力量发展重工业，发展军事工业。1980 年代初世界能源价格的急剧下跌，标志着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的彻底失败。1990 年代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大转型导致了空前的衰退和严重动乱，民不聊生。进入 2000 年代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攀升和普京拨乱反正政策的实施，使俄罗斯在短短八年之内重新跃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八年来，普京的核心政策就是让居民休养生息，实施教育、医疗、住房和农业四大国家工程。如今，国家积累了大笔的资金，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社会、政治、经济已经逐步走上正轨，彻底扭转严重依赖原料和能源的畸形经济结构就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

1、战略目标

2008 年 2 月 8 日，普京在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俄罗斯 2020 年发展战略》的报告，^①确立了国家的创新发展战略，其根本是人的问题。围绕这个基本目标，普京规划了俄罗斯未来 12 年的教育和科研、医疗卫生和住房建设三大民生问题的解决方向，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要使中产阶级在整个居民结构中的比例不低于 60%，甚

^① Путин В. В., О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до 2020 года.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08.02.2008. <http://www.regnum.ru/news/954426.html>.

至 70%。普京提交给国务委员会的 2020 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是把俄罗斯从惰性的能源和原料发展道路转向创新发展道路的政治决定。这一战略包含了以科技进步及其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社会发展目标为基础的广泛的内容，希望最终将俄罗斯经济转向创新发展的道路，推向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快速和稳定增长的轨道。

2、战略措施

普京强调实现创新发展就是要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今后 12 年内各主要经济部门这一指标至少要提高 3 倍。主要政策措施是：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大力发展基础经济部门，包括自然资源的深加工，发挥能源、交通和农业的潜力；对各经济部门的现有生产实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实行崭新的企业管理，更新所有的机器、设备和生产工艺；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部门，如航天、造船、能源领域的高新技术，发展信息、医疗和其他新技术；加快道路、车站、港口、机场、电站和通讯系统的建设；大力发展金融业，使其达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水平，形成世界金融中心；努力建设良好的市场和竞争环境，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为此他要求集中力量解决好三个关键问题：为人们创造平等的机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形成创新行为和积极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机制。^①

3、实施机制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普京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把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实际成果作为评价整个国家机器的主要标准。消除对经济过多的行政压力，积极吸收私人资本到国有部门，加快发展落后地区，培育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心。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加快实现“强国富民”。进一步加强以企业“强强联合”为特征的战略行业重组，组建国家绝对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以提高俄民族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支配权，将国家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切实落实四大“国家项目”。2008 年 5 月 8 日，普京在国家杜马发表的总理就职演说中将这一长期战略进一步具体化：^②（1）发展金融市场，建设世界金融中心，支持民族资本的“对外扩张”；（2）建立为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新技术等服务的税收体制；（3）进一步扩大经营自由，消除经济的行政和垄断障碍；（4）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调整经济结构，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农业、包括造船和航空在内的高技术领域；（5）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力度；（6）改善国家管理体系，转变政府职能。

4.战略特点

^① 同上。

^② Путин В. В.,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 мая 2008 г. <http://www.gzt.ru/business/2008/05/08/193351.html>.

首先是恢复了国家的作用。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第一次把战略发展问题提到了国家层面。没有国家的应有努力，战略也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其次，与以往的战略幼稚地强调万能的自我调节机制不同，这一战略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经济的复杂情况。普京在强调 GDP 翻番任务的同时，也指出了惰性的能源发展模式是死路一条。他确定了国家政策的方向，那就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教育、科学、医疗卫生水平，创建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本国优势，实现经济现代化，发展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能力，重建和扩大生产、社会和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为使国家转向创新发展道路，提出的任务是逐步提高创新和投资积极性，使积累水平达到 GDP 的 30%，在教育、医疗和科学研究方面的预算拨款水平与发达国家标准接轨。

5. 依靠大量投资转变发展方式实为粗放式发展模式

遵循普京把俄罗斯经济从原料出口型发展转向创新型发展的指导思想，俄罗斯政府在 2008 年 8 月提交的《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提出了三种发展方案：（1）惰性发展方案、（2）以继续对能源和原料部门增加投资为基础的原料能源型发展方案和（3）创新发展方案。^①从表 3 可以发现不同方案对 2020 年前时期宏观经济预测指标有着明显的区别。创新型和原料能源型方案都能够保证 GDP 翻一番，况且创新型发展方案的 GDP 还要高出 21%。

在 C. 格拉季耶夫看来，转向创新型发展道路，要求根本转变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结构，其主要源泉应当是科技进步。^②根据战略构想，实现技术创新的工业企业的比例应当达到 40—50%，工业产出中创新产品的份额要达到 25—35%，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部门占 GDP 的比重应当不低于 17—20%（2006 年为 10.5%）。经济部门结构要实现大幅度转变。按照创新方案，高新技术部门在增加值中的比重要提高一倍，即从 10% 提高到 20%。与此相反的是，石油天然气部门的比重要从 20% 降低到 12%，原料部门从 8.4% 降低到 6.8%。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应当每年增加 15—20%，到 2020 年要达到不低于 800—1000 亿美元，从占世界市场的 0.2% 提高到 1%。月平均工资应当提高到 2000 美元（2006 年为 391 美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三个方案都要求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前提。根据创新方案，GDP 能耗和电耗分别减少 39% 和 27%，而劳动生产率提高 138%，这与普京要求的目标还差很远。政府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Проект МЭРТ РФ, 2008(8); Основные параметры прогноз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2030 гг.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Концепци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ект МЭРТ РФ, 2008(8).

② Глазьев С.Ю. Стратегия и Концепци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до 2020 год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2008-03-06. http://www.apn.ru/publications/print19384.htm#_ftn2

的战略构想计划增加近 3 倍的投资，投资的增加大大超过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加 GDP 的指标。由此可以认为，战略构想试图主要地依靠粗放地增大固定资本，以扩大增加生产的基础。

表 3 不同发展方案主要预测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增长速度，%）

	方案	2006	年均增长速度			2020 年比 2007 年增长
			2008—2012	2013—2017	2018—2020	
GDP	3	6.7	6.1	6.6	6.4	123
	2		6.0	5.5	4.7	102
	1		4.5	3.3	3.1	61
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	3	10.2	8,3	7,2	6,7	156
	2		8,1	5,7	4,7	123
	1		6,8	4,3	3,7	91
零售贸易额	3	13,9	8,7	6,5	6,3	150
	2		8,6	5,3	4,5	124
	1		6,7	4,4	3,7	91
投资	3	13,7	11	10,7	9,6	270
	2		10,9	8,8	6,6	211
	1		5,6	4,2	4,1	83
出口，亿美元	3	3039	3480	4390	5640	60
	2		3470	4330	5380	51
	1		3310	3770	4370	21
进口，亿美元	3	1647	3400	5030	6690	195
	2		3420	4840	6030	163
	1		3160	3760	4460	92
通货膨胀	3	9	5,6	4,5	3,3	85
	2		6,2	4,8	3,4	90
	1		7,5	6,1	4,0	111
能源消耗	3	-2,8	-3,6	-3,9	-3,7	-39
	2		-3,4	-2,8	-2,2	-32
	1		-2,8	-1,7	-1,6	-24
劳动生产率	3	6,2	6,3	7,5	7,1	138
	2		6,2	6,5	5,8	119
	1		4,8	4,3	3,9	75

资料来源：Концепц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Проект МЭРТ РФ, 2007.

三、200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结构变动的积极趋势 为实现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许多学者担忧 2020 年发展战略能否得到实现。事实上，进入 2000 年代以来，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已经表现出了向好改善的积极趋势。

1、工业特别是加工业发展迅速，比重上升，能源部门增长率下降。

进入 2000 年代以来，俄罗斯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14%，创造的增加值增加了 1.8 倍，其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从 2002 年的 33.7% 上升到 2006 年的 39.4%（见表 4）。第一产业在总产出结构中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6.6% 下降到 2006 年的 4.4%，第二产业则从 43.7% 上升到 48.2%，这种变化趋势表明了俄罗斯正在经历所谓“再工业化”。这也可以从以下数据得到证实。2000 年到 2007 年，在 GDP 年均增长 7.1% 的情况下，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 8.1%，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快于 GDP 的增长速度，然而总积累增长率却达到了 21.3%，按照 2020 年发展构想的创新方案，积累率还将达到 30%。工业生产平均增长 6.6%，而农业生产年均只增长了 3.3%。

表 4 俄罗斯三次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变动趋势

	2002 年		2006 年	
	亿卢布	%	亿卢布	%
增加值总额	95812.94	100	228678.06	100
第一产业	6450.71	6.7	11167.99	4.9
第二产业	32236.70	33.7	89989.92	39.4
第三产业	57125.53	59.6	127520.17	55.8

资料来源：根据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чета России в 1998-2005 годах. 2006: Стат.сб./Росстат. - М., 2006. - стр. 47;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чета России в 1999-2006 годах.. 2007: Стат.сб./Росстат. - М., 2007. - стр. 90.整理。

第二产业内部，加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增长最快的是电力、电子和光学仪器设备的生产，2000 年以来，年均增长超过 16%，个别年份甚至猛增了 43% 和 35%，但发展不稳定。其次是机器设备生产年均增长 8.1%，2003、2004 和 2007 年甚至分别增长了 19%、21% 和 19.1%。加工工业年均增长 6.8%，某些年份达到 10%。能源开采平均增长率只有 5.3%，且从 2003 年最高的增长率 10% 逐年下降，2007 年只增长了不足 2%。能源出口也基本上到达顶峰（见图 2）。

俄罗斯投资高潮的到来导致对投资品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这表现在进口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的进口从 2000 年的 106 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1020 亿美元，增加近 10 倍，在进口商品结构中的比例也从 31.4% 上升到 51%。上述积极的变化趋势表明，能源和原材料部门的增长速度和对 GDP 的贡献率在下降，

以加工部门为主的最终产品部门增长速度和贡献率在稳步上升。在加工工业部门中，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率在增大，传统产业的贡献率在下降。图 1 显示，1997—2003 年国际油价变动与 GDP 变动是同步的，而 2003 年以后国际油价的大幅上升对 GDP 的拉动并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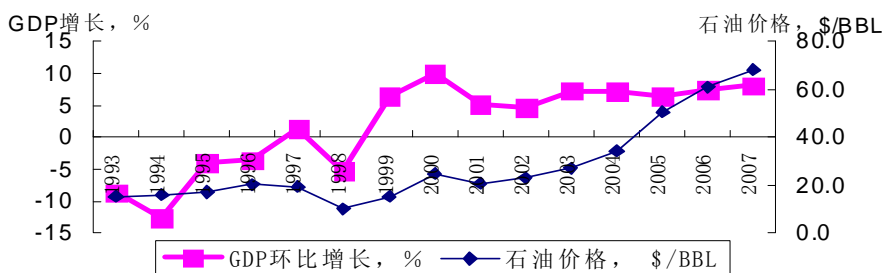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石油价格与俄罗斯GDP变动

资料来源：Основные параметры прогноз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2030 гг.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Концепци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ект МЭРТ РФ, 200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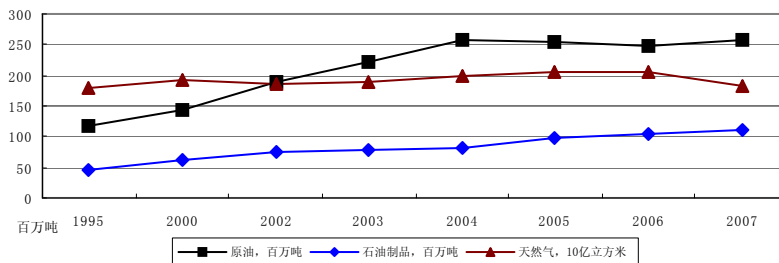


图2 俄罗斯能源出口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2008: Стат.сб./Росстат. - М., 2008. - стр. 485。

2、投资需求大幅度上升，加工业和服务部门投资比重增大。

进入 200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复苏，俄罗斯投资年均增长约 14%，其中 2007 年投资总额增加了 21.1%，是 1995 年的近 2 倍。设备更新系数从 2000 年的 1.8 % 提高到了 2007 年的 3.9%。从投资的部门结构来看，2000—2007 年期间投资比重最大的是交通和通讯部门，平均为 22.1%。其次分别为房地产业 16.8%、加工业 15.9 %、能源开采 14.7%（见表 5）。

1990 年代由于俄罗斯社会的动荡，几乎很少有外商投资。1995 年吸收的外资总额只有 29.8 亿美元。2000 年以来，外商投资总额每年以 100 亿美元的速度递增。2007

年俄罗斯吸收外国投资总额达 1209.4 亿美元，猛增了 658 亿美元，超过了前一年累积吸收外资总额的一半。从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来看，截至 2007 年底，累计吸收外资 2206 亿美元，其中 30% 投向了加工业，能源开采和冶金分别占 17% 和 14.8%。累积直接投资总额的 39.2% 投向了加工业。2007 年吸收的 1209.4 亿美元外资当中，投向加工业 319.5 亿美元，占 26.4%。而能源部门吸收的外资只占 13.1%。

表 5 俄罗斯主要经济部门投资情况(占投资总额百分比)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固定资本投资总额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农林和狩猎	3.7	3	4	4.6	4.1	4.1	3.9	4.8	5.1
矿产开采	14.2	18.1	19	16.9	16	15.4	13.9	14.6	15.2
其中能源开采	13	16.7	17.5	15.5	14.5	14	12.4	13.3	13.8
加工生产	14.8	16.3	15.9	15.9	15.6	16.4	16.4	15.6	15.4
化工生产	1.4	1.4	1.5	1.4	1.4	1.3	1.6	1.7	1.6
机器设备生产	0.7	0.8	0.8	0.7	0.7	1	0.9	1	1
运输工具和设备生产	1.6	1.4	1.3	1.4	1.3	1.2	0.9	1	1.1
建筑业	4.5	6.4	5.2	5.4	4.9	3.5	3.6	3.7	3.5
批发零售贸易；汽车、摩托 和个人日用品和物品维修	2	2.7	2.9	3.6	3.5	3.5	3.6	3.5	3.4
交通与通讯	12.6	21.2	22.2	18.5	22.3	22.7	24.5	23.6	21.9
其中通讯	1.4	2.7	3	3.4	4.8	5.4	5.4	4.5	4.4
房地产	25.3	15.2	14.7	18.1	17.7	17.3	16.8	17	17.3

资料来源：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2008: Стат.сб./Росстат. - М., 2008. - стр. 420.

3、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结构趋向合理。

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俄罗斯居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2000 年以来人均可支配货币收入年均增加 12%。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人数从 1992 年的 33.5% 和 2000 年的 29% 减少到 2007 年的 13.4%。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引发了俄罗斯国内消费风暴。2007 年居民家庭最终消费比 2000 年增加了近 4 倍，年均增加 8.8%。2007 年为居民服务的零售贸易额超过了 10 万亿卢布，是 2000 年的 4.6 倍。根据抽样调查资料，在居民消费结构中，2007 年购买食品的支出比例占 28.4%，比 1995 年减少了近一半，恩格尔系数下降，消费支出弹性大的非必需品将处于主导地位。非食品支出比例则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达到 41.7%。购买房产的支出也从 2000 年的 1.2% 增加到了 2007 年的 3.3%。消费能力日趋提高。

4、国有经济对国家经济的导向作用增强。

2001 年 12 月俄罗斯颁布了新的《国有资产和市政资产私有化法》，纠正了过去私有化的一些问题，加强了对私有化的管理和监督。自 2004 年以来，俄罗斯国民经

济各主要行业陆续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迹象。^①国有和地方政府所有的企业数量从2001年开始逐年增加，到2006年增加到41.4万个。2000—2007年，俄罗斯投资总额中政府预算投资平均占20%，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加。在投资总额中国企业所占比重平均高达24%，国有企业零售贸易额增加了近1倍，国有建筑企业完成的工作量增加了近1.7倍。2007年国有固定资产总额比2001年增加了1倍，达到10.9万亿卢布。国有企业吸纳了32%的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2165.6万人。俄罗斯政府在能源、军工、飞机制造、重型机械、核能、矿产开采、汽车制造、海洋运输、航空运输、银行、造船等几乎每个重要战略领域都建立起了大型国有控股公司，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2000年以来俄罗斯投资总额中政府预算投资平均占20%，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加。从2007年联邦预算支出来看，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措施的支出高达83537亿卢布，占GDP总额的25.3%。

5、研发投入大量增加，科技成果突出。

2006年用于研发的投入达到2888亿卢布，是2000年3.8倍，占GDP的比重为1.07%，其中国家投入占27%，占政府预算支出的比例为2.27%，这一指标比2000年提高了34%。俄罗斯专利申请数量和批准数量分别从2000年的35609项和23316项增加到2007年的54337项和36805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额从2004年的1228.5亿卢布增加到2006年的1884.9亿卢布，占生产投入的比重保持在1.4%—1.5%。其中2006年化学工业、电力设备、电子和光学仪器和设备的技术创新投入高达4.4%—4.5%。

四、2020年前俄罗斯实现创新发展的制约因素

1、能源的路径依赖

从前述俄罗斯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看，俄罗斯经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并没有削弱，而且依赖性更强。即使是2020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构想三种方案的预测也依然是建立在对未来国际石油价格不同估计的基础上的，况且俄罗斯已将能源作为其重返世界大国行列的重要杠杆。

2、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新的对外政策构想会恶化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外部环境

2008年7月俄罗斯公布了新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②7月21日俄罗

① 赵秋艳：“浅析当前俄罗斯经济中的‘新国有化’趋势”，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年第7期；曲文轶：“试析俄罗斯经济政策调整的新动向：强化国家对自然垄断的所有权控制”，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Д РФ, 2008. <http://www.kremlin.ru/text/docs/2008/07/204108.shtml>

斯《Коммерсантъ-власть》发表文章称，“俄罗斯终于站起来了，现在要进入下一阶段，那就是要让整个世界跪在它的脚下”。^①这种含义的词句在新版对外政策构想中重复出现，提出结束单极世界并使俄罗斯成为国际政治另一极的目标。表示要有效利用一切资源包括能源作为俄罗斯重返世界舞台的有力杠杆。梅德维杰夫决心要建立国际新秩序，普京要求民族资本“对外扩张”。俄罗斯这种咄咄逼人的企图改造整个世界的野心，以及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及其背后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敌对关系越来越紧张，西方对俄罗斯的遏制必然会进一步加强，甚至重新回归冷战，重走军备竞赛的老路。同时，其他国家与俄罗斯发展关系时也不得不提升戒心。显然，没有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俄罗斯 2020 年发展战略是难以实现的。

3、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经济产生强烈冲击

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俄罗斯的实体经济，^②首当其冲的是俄罗斯各大银行。2008 年 9 月 16 日俄各大银行和另外一些大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内丧失了近 1/3 的市值。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俄油气行业面临减产的压力。9 月 24 日，天然气工业公司、卢克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ТНК—BP 石油公司请求俄政府提供贷款。俄罗斯 70% 的石油产量和 91% 的天然气产量来自这 4 家公司，因此它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举足轻重。此外，俄罗斯的冶金业和汽车制造业也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冶金企业已经宣布减产，汽车制造商降低了商用小轿车和载重汽车的产量。金融危机还造成了物价全面上涨：零售网络受到打击，许多批发商面临破产；另一方面，生产、运输、仓储等环节成本的增加也会抬高物价。同时，2008 年 8—10 月，资本外逃已近 1000 亿美元。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Russia's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2020 is to completely adjus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shift to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odel.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both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trends of current economy structural changes in Russia, and comments objectively on the goal, means and measures of Russia's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2020.

【Key Words】 Russia,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conomy Structure, Innovation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инновации

(责任编辑 常喆)

① М. Зыгарь, В. Соловьев, Послание послам или Россия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встала с колен. «Власть», № 28(781) от 21.07.2008 г.

② 参见李新：“俄发展战略受冲击”，《解放日报》，2008 年 11 月 18 日，第 4 版。

论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及特点

李中海*

【内容提要】鉴于学术界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不同观点,本文首先分析了俄罗斯从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取向到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过程,然后分析了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作出评价。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以强国富民为目标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是俄罗斯经济取得新发展的正确途径,进一步兴利除弊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经济多样发展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俄罗斯 混合市场经济模式

【中图分类号】F13/17.512.4**【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035-(10)

关于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许多不同看法,其原因至少有三:其一,探究一国经济发展模式应以对该国经济的长波段研究为基础,俄罗斯独立至今仅15年,虽然普京执政期间宣称“大规模制度变革已经结束”,但各种经济成份的构成形式和调节经济运行的机制尚未定型,经济发展模式仍存在不确定性,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必然见仁见智。其二,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撇开经济活动的次要因素,对一国经济成份构成形式、经济运行机制及调节方式、现实经济活动框架和原则及经济增长方式所作的抽象,是对国民经济基本运行规则、增长类型以及主要经济政策在理论上的一种设计和构造。如果仅从单一角度,凭借个别数据或特点,就对一国经济发展模式作出判断,很可能失之偏颇。其三,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至今,形成了诸多理论和流派,虽然对基本概念存在普遍认同,但在概念运用及对概念基本涵义的理解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仅就经济发展模式而言,根据不同标准和不同的划分方法,就存在许多类型。比如按经济制度可分为资本主义模式和社

* 李中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会主义模式；按地域可分为美国模式、拉美模式、北欧模式、东亚模式等；“新制度学派”还将资本主义模式分为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政府导向的资本主义和谈判或协商资本主义。^①针对俄罗斯经济模式的判断存在同样情况，经济学界根据俄经济的不同侧面及特点，提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如“帮派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边缘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态长期化的经济模式”等等^②。

“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③判断一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将其置于时空维度中，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国家历史演进的角度，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其经济中的共性和特性，从而对其经济发展模式作出判断。纵观俄罗斯经济发展史，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经济与西方相比存在相对特殊性^④。十月革命后苏联经济走上封闭运行的轨道，与西方相比具有绝对特殊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选择了与西方趋同的经济制度，但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及经济基础与西方市场经济存在很大差异。普京上台尤其是2003年以来，摒弃了叶利钦时代机械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做法，以建立强大的经济为根本出发点，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对经济战略、经济政策进行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调整，虽然俄罗斯经济仍未走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全面发展的道路，但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

一、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及特点

（一）从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取向到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

1. 从叶利钦时代到普京时代的转变。如果将普京时代与叶利钦时代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明显差别。叶利钦时代经济转轨和改革的主题是“休克疗法”、私有化、自由化，普京时代经济政策的主题成为“建设强大的经济”、提高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多样化、发展创新型经济等。其根本区别在于，经济政策取向和目标发生了明显变化。叶利钦时代经济改革的目标与手段混淆，力图通过激进的制度变革，建立起以全面私有化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在系统性的经济危机条件下，经济持续滑坡，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陷入左支右绌状态，社会经济一片混乱，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交替加深。所谓“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改

① 邱询旻：“美国、德国、日本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与择优借鉴”，《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3期。

② Либман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в России, <http://www.carnegie.ru>, июль 2007г. с.102-103.

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④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0-101页。

革的标签和目标取向。直到 2000 年普京上台，俄罗斯经济自由度的世界排名还在 100 名以外^①。进入普京时代，经济战略和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最根本的是目标取向发生了明显变化，建设强大的经济是核心和根本目标，具体政策则兼收并蓄，因此可以说，普京经济战略是目标导向型的发展战略。

2. 从普京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的转变。普京上台之初，俄罗斯千疮百孔，经济凋敝，社会混乱，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领土完整面临威胁。在这一时期，普京经济政策的重点在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力图通过修补漏洞、整顿秩序，使局面趋于稳定。突出的是制订了民法典、税法典、劳动法典、土地法典等带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基础性法律。同时，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强调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规范企业行为，着手实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完善养老金改革等。这一时期，欧盟和美国先后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从普京第一任期即将结束时起，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俄罗斯经济政策发生逆转，突出表现在国家不仅强化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加强了对企业的微观控制，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突出，并最终形成了混合型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管理体制。

(二) 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特征

第一，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并存。经过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的私有化进程，俄罗斯大部分国有企业已实现了私有化。据世界银行统计，俄罗斯国有公司 2004 年的销售额占比仅为 25%，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 63%^②。在普京进入第二任期后，俄罗斯经济中的国有成分不断扩大，一些企业被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兼并，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或企业加强了控制，有学者将这一进程称为“国有化”或“再国有化”。2006 年以来，俄罗斯还组建了国家纳米技术公司等若干大型的政府公司。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可能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对此，普京在 2007 年 12 月接见俄工商会代表时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会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允许政府公司进行行业垄断，组建政府公司的目的在于，国家对那些私营企业没有投资意愿的领域进行扶持，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是我们的道路”^③。应该看到，非国有经济在俄罗斯仍占据半壁江山，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仍将保持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第二，市场调节与国家控制相结合。上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其中包括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价

① Илларионов А. Как заработать 100 триллионов долларов// Эксперт, 2000№8, С.28.

② World Bank, 2004, “From Transition to Development. A Country Economic Memorandum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101.

③ Путин В. Госкапитализма не будет, <http://www.opes.ru>, 11 декабря 2007.

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以法律和市场为手段的宏观调控机制等。但在价格调控方面，当时虽然对大部分产品放开了价格，但国家仍对自然垄断行业的产品与服务、住房公用事业、电力等行业实行价格管制。普京执政以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进一步扩大，干预程度进一步加深，实际上形成了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第三，“非法治化”与市场经济原则尖锐对立。所有权不可侵犯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要义。市场经济应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由国家和法律对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提供保障。在一个法律权威难以确立或法制不健全的社会，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和违约行为会大大增加，从而导致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的增加。俄罗斯社会非法治化问题极为突出，政府行政的随意性大，官员腐败现象严重，滥用权力问题普遍^①。企业对其产权保护状况及契约执行缺乏信心。此外，国家对个别企业进行“选择性国有化”，也损害了企业对政府的信任。同时，俄罗斯社会“信任半径小”是其固有问题^②。这不仅表现为企业对国家能否对其提供法律保护缺乏信心，也表现为企业之间对合作伙伴能否履行契约也存有疑虑，甚至人与人之间也普遍存在信任度不足的问题。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仍存在野蛮落后的一面。

第四，各种形式的垄断与自由竞争同时存在。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垄断有利有弊。俄罗斯经济中的垄断分为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三个部分。其中自然垄断是由产业特殊性所决定的，这是因为油气管道、电网等基础设施存在不可分割性。行业垄断则是由苏联时期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模式沿袭而来的，如天然气工业公司借手中握有管道运输的管理权，在天然气开采领域形成了实际垄断。行政垄断包括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机关利用权力限制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导致某些领域市场准入门槛过高。普京上台后，搁置了天然气工业公司的改革方案，维持了该公司的行业垄断地位，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同样处于“冷冻状态”。这一时期虽然针对行政垄断问题，修改了《某些经济活动的行政许可管理法》，但行政审批仍普遍存在。同时，俄政府修改和完善了《反垄断法》，提出了保护竞争环境、对违犯反垄断法的行为加重处罚力度，但是国有大企业对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有超强的影响力，其垄断行为未必会受到惩处。

第五，经济自由化程度低，集中程度高。尽管俄罗斯经济政策经常被冠以“自由主义”的标签，但无论在叶利钦执政时期还是普京执政时期，其经济自由化程度始终在世界排名中处于末端。国际经济自由度研究组织依据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占

① Либман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в России, <http://www.carnegie.ru>, июль 2007г. с.102-103.

② Олейник А.Н. Издержк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еформ в Росси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Москва, ГУ ВШЭ, 2001г. с. 139-140.

比重、经济结构、市场机制覆盖范围、货币政策和物价状况、外汇管理制度、私有产权保护状况、对外贸易自由度、资本市场自由度等 7 大项 23 小项，对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定期进行评估，俄罗斯 2000 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世界第 110 位^①。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俄罗斯经济自由度 2006 年世界排名为第 122 位。由此可见，俄罗斯经济仍是管制程度很高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资源集中在大企业。据俄“专家”评级机构的评估，俄 2005 年资产超过 100 亿美元的大公司有 13 家，其资产总额总计为 5260 亿美元，占当年 GDP 总量的 65%。

第六，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强调社会与经济平衡发展，部分恢复带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经济政策。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政策重新向社会领域倾斜。普京总统在 2003 年国情咨文中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与社会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过一番论述，核心思想是，在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目标相冲突时，应以经济增长为优先考虑，“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但在经济增长与社会政策相冲突时，社会需要则高于经济增长目标^②。更为突出的是，2005 年普京提出四大民生工程，加大了对教育、医疗、住房和农业的投入，以解决上述领域中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其中对各级预算的拨款额度、使用方向及预期效果均有详细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些举措既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对一些落后行业的发展以及拉动内需均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是带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色彩的经济政策。

二、对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评价

俄罗斯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经济危机的转型国家，同时面临着克服经济危机、改革经济体制与加快经济发展等多重任务，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也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经济发展道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改革进程等宏观层面的问题，也有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外贸管理体制等中观层面的问题，还有企业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生产要素等微观层面的问题。普京执政八年间，虽然经济连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在俄政府内部及学术界，针对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经济改革进展、经济结构的原材料化以及经济中存在的短期与长期风险等问题，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对普京经济政策的批评也时隐时现，虽然有些观点是出于具有这样或那样色彩的固化思维，但也客观地反映出俄罗斯经济中

① Илларионов А. Как заработать 100 триллионов долларов// Эксперт,2000№8.

②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осла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edinros.ru/news.html?id=122046>, 16 мая 2003 года.

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有些问题还可能突出地显现出来。

第一，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未得到解决。国家、市场与企业三者关系是构成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首要问题。如何安排、协调和优化三者关系是经济制度和经济调控机制的核心。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强化市场作用的过程。叶利钦执政时期，尤其是经济转轨初期，市场作用被神化，力图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经济转轨，克服危机，实现经济增长。普京执政前期沿袭了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政策，将国家职能定位为确保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创造条件，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表现为保护经营自由，少一点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多一些经营的自由”。^①进入普京执政中期，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经济政策明显转向，突出表现为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突出，国家不仅强化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加强了对企业的微观控制。普京经济政策的转向，导致一批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政府官员转向其对立面。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强化对企业的控制，干扰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尤科斯”事件发生后，资本市场出现震荡，股票市场一度低迷^②；企业投资积极性受到压抑，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降。“尤科斯事件”后，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作用进一步增强，突出表现在国有经济成份明显扩大，国有油气公司兼并了一些私营公司；国家对一些行业中的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构建大型企业集团。在经济调节机制方面，经济改革进展缓慢，各种形式的垄断有增无减，这种局面对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起了抑制作用。俄罗斯一些自由派学家对此均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原总统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指出，俄罗斯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之广、国家垄断程度之深，“为世界各国所仅见”，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国家垄断的维持，限制了市场竞争，也限制了外资流入^③。此外，俄罗斯社会非法化问题极为突出，政府行政的随意性大，官员腐败现象严重，滥用权力问题普遍^④。企业对其产权保护状况及契约执行缺乏信心。在“普京—梅德韦杰夫”体制下，针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仍将继续争论下去。

第二，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问题依然存在。普京执政初期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修改和完善了一些法律法规，并在多种场合强调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在进入第二任期后，普京的经济政策趋于保守，中止了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也陷于停顿。

①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осла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edinros.ru/news.html?id=122047>, 18 апреля 2002 года.

②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ФСФР, Годовой отчет ФСФР России за 2006 год, <http://www.ffmc.ru>.

③ Йенс Харгман, Илларионов А.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олжно меньше вмешиваться, <http://www.inosmi.ru/translation/223734.html>, 18 ноября 2005.

④ Либман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в России, <http://www.carnegie.ru>, июль 2007г. с. 102-103.

在 2008 年总统大选前，以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所长格林贝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份报告，认为普京执政时期的经济改革在总体上是失败的。如果对各领域改革进展进行分类的话，比较成功的领域是税制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预算制度改革、土地市场的形成、劳动关系的改革；比较不成功的领域是经济调控、地区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农业、自然垄断行业、金融管理制度的形成、产业政策；完全不成功的领域是行政改革、住房保障、所有权保护、自由竞争环境的建设、私有化、居民社会福利货币化改革^①。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彼得拉科夫认为，普京执政时期，私人所有制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没有为中小企业参与自由竞争提供法律和经济支持，而大企业在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后，效率也明显下降。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社会政策中心主任冈特马赫尔认为，如果俄罗斯未来一个时期不进行综合性的深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就会再次滑入某种形式的危机中^②。

第三，俄罗斯经济增长对国际油价的依赖性没有降低，经济结构的原材料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国际经济组织和俄罗斯国内经济学界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均对油价与 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作过估算。其中，世界银行在 2004 年发布的《从转型期经济到发展型经济报告》中指出，俄罗斯 GDP 增长率与国际油价的弹性比为 0.07，即国际油价每增长 1 个百分点，俄 GDP 增长 0.07 个百分点。国际油价每桶每增长 1 美元，俄联邦预算收入将增长 GDP 的 0.35%，联邦统一预算收入增长 GDP 的 0.45%^③。俄罗斯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对此的结论是，石油价格增长对 GDP 的贡献度为 1.5 个百分点（2003 年）^④。俄罗斯发展中心对建立稳定基金后 GDP 与石油价格的关联度进行过评估，他们认为，2005 年至 2006 年俄 GDP 增速放缓，是由于石油出口收入的 1/3 以上退出流通，进入了稳定基金。稳定基金对金融形势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按目前稳定基金征缴标准（27 美元/桶），石油价格每超过这一标准 10 美元，GDP 增长率提高 0.2 至 0.3 个百分点。如石油价格继续上涨，稳定基金规模还将继续增加，但对 GDP 增长影响不大。换言之，即使石油价格下降到一定水平（如不低于 35 美元/桶），对 GDP 的影响同样是有限的^⑤。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官员认为，2005 年以后，能源出口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动力已经下降。2003 年至 2005 年，俄石油工业增长速度年均均为 10%。从 2006 年起，油气资源出口增速下

① Овян А. Теор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и ВВП, <http://www.novayagazeta.ru/data/2008/15/11.html>, 02.03.2008.

② 同上。

③ OECD, “How to sustain growth in a resource based economy? The main concep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russian case.”, <http://www.oecd.org>, Feb., 09, 2006.

④ Милов В. Проблемы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http://www.energypolicy.ru/ner.php>, апрель 2005 г.

⑤ Центр развития., Обз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за 2006 год., <http://www.dcenter.ru>.

降，回落到 3% 的增长速度。石油出口增幅下降使 GDP 增幅减少 1.5-3 个百分点。如果石油价格继续上涨，石油工业对 GDP 的贡献率仅能提高 0.3-0.4 个百分点^①。

第四，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取得进展。经济结构畸形是苏联及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的固有问题，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失衡和地区经济差距两个方面。俄罗斯产业结构失衡既体现在三次产业的构成及比例关系失衡，也体现在工业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最为突出的是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居民消费品生产行业不发育，导致居民消费品供应长期短缺；在制造业中一直没有形成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产业。产业结构的失衡导致国民收入失衡、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失衡和对外贸易结构失衡。地区经济差距的突出表现是地区经济两极分化严重，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和大城市经济快速恢复发展的情况下，一些边远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仍在持续恶化。

第五，固定资产老化严重，依靠现有工业基础难以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俄在计划经济时期建成的工业化基础严重老化和锈蚀，仅靠增加要素投入进行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俄工业基础老化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工业固定资产严重老化，各部门设备老化率分别为：化工和石化 80%，机械制造业 70%，轻工业 70%，建材业 69%，黑色金属冶金业 67%，电力工业 66%，有色金属冶金业 65%，燃料工业 63%，森工纸浆业 55%，食品工业 45%^②。二是设备使用年限超长，磨损严重。工业设备的平均使用年限达到 21.2 年，2004-2006 年工业固定资产的平均更新率仅为 1.8%^③。三是技术老化。苏联时期的工业化是建立在传统电气化水平之上的工业化，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危机，使俄错过了对原有工业基础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时机。对旧设备、旧技术继续增加投资，进行局部修补，必然导致投资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和产业竞争力无法从根本上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无从实现。2006 年与 1998 年相比，机械制造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43.6%，但技术水平没有明显提高，高科技装备所占比例极低，数控机床设备所占比例不超过 5%^④。在这种情况下，不对设备进行彻底更新，难以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

第六，制约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仍大量存在。虽然近年来俄罗斯政府一再提出应加快创新型经济发展，但仍存在很多制约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因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俄罗斯科技研发的规模较小，研发结构不符合创新型经济发展的

① Греф Г. Тезисы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а Совете по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у, <http://www.economy.gov.ru>, 6.09.2006 г.

② 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第 424 页。

③ Гайдар 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2006 г: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http://www.iet.ru>, сс.324-325.

④ Гайдар 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2006 г: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http://www.iet.ru>, сс.330-332.

需要，也无法满足企业对先进技术日益增长的需求；俄罗斯一些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差，没有形成现实生产力；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建立科技园区、经济信息化重视不够，一些传统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担心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对其造成冲击；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专利申请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的利润率低，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此外，政府对发展创新型经济的作用有限，名目繁多的发展战略、政府纲要并未得到全面落实^①。俄罗斯创新型经济发展道路仍很漫长。普京主政以来，俄罗斯政府在发展创新型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从目前情况看，尚未取得明显成效。据俄专家评估，目前俄罗斯只有 10%的工业企业有创新积极性^②，只有 5%的企业属于创新型企业，只有 5%的产品属于创新型产品^③。俄罗斯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仅为 0.35%-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④。

第七，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不仅限制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也制约了各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危机，俄罗斯无力对电网、供暖等基础设施进行改建和升级，导致基础设施日益陈旧老化，事故频发。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秋明州等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都曾出现过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在边远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冬季取暖难以保障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在交通运输方面，由于对道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法律缺失及受资金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公路交通建设长期停滞，各地区的机场、铁路同样存在老化问题，交通不畅已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八，俄罗斯经济发展仍面临着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其中外部环境风险包括国际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如俄罗斯与欧美主要国家及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演变，对经济全球化机遇与挑战的认识及应对策略，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程度及在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力，对国际劳动分工的态度与对策，俄罗斯主要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及价格走势，非传统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能否提高，对外开放度及对吸引外资的态度及对策等。内部风险包括能否保持政局持续稳定与政策的延续性和可预见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程度、方式及影响，官僚主义与腐败问题能否得到控制和解决，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能否得以保持，人口持续下降的危机能否缓解，影子经济的影响及解决办法，经济民族主义、有组织犯罪、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能否

① Корчагин Ю.А. Проблем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сектора экономики РФ и регионов, <http://lerc.012345.ru/informatics/0002/0001>.

② Дежина 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здан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в России. <http://www.opec.ru>, 08 октября 2004 г.

③ Корчагин Ю.А. Проблем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сектора экономики РФ и регионов, <http://lerc.012345.ru/informatics/0002/0001>.

④ Дежина 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здан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в России, <http://www.opec.ru>, 08 октября 2004 г.

得到有效遏制等。从政策层面看，宏观经济政策、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结构政策、产业发展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创新型经济发展政策等是否与经济状况相适应，各项政策是否具备灵活调整的制度条件等。

三、结 论

2008年俄罗斯顺利实现了最高领导权力的更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梅普组合”体制。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普京政府提出了“到2020年使俄罗斯经济进入世界前五强”的战略目标，梅德韦杰夫除一再重复其在竞选期间提到的四个关键词：制度、投资、基础设施、创新，并在其首次国情咨文中增加了“知识”这一关键词以外，并未提出带有其个人色彩的经济政策。这显示出普京所主导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将延续下去。

经济发展模式本身不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重要的是要消除制约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体制障碍，理顺经济管理制度，培育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过去8年经济增长的实践证明，俄罗斯必须选择适合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强国富民为目标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是俄罗斯经济取得新发展的正确途径，进一步兴利除弊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经济多样发展的重要前提。

【Abstract】 Considering different view points on models of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cademic society, the author first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ussian policy orientation in building a liberal market economy to choosing a mixed market economy model, and then analyzes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mixed market economy model.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evaluates the Russian mixed market economy model. Finally the author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mixed market economy aiming at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is a right way for Russian economy to get new developments; to promote the beneficial and abolish the harmful is an important basis to maintain economic growth and achieve divers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ssia, Mixed Market Economy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смешанная рыноч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责任编辑 姜睿)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路径及效用分析*

周维第**

【内容提要】俄罗斯国防工业体从前苏联时期的斯大林模式向市场导向的转型，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军转民实践，充满了曲折和困难，短期内削弱了其经济实力。但俄罗斯也逐渐明确了国防工业体进一步转型的方向，为推动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路径，并深入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 国防工业体转型 经济效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43/47.512.64**【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045-(13)

众所周知，人类进入太空和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成就，而前苏联是最先掌握了这两项技术的国家之一。但由于推行斯大林式教条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政策，导致了前苏联经济的高度军事化，经济结构畸形，效率低下，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其经济的健康有效运行。错误地选择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盲目地追求世界高水准，重数量、轻质量，忽视经济效率和提高部门之间技术推广的速度和效率等，使得传统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国家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均落后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对峙中，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得前苏联的财政不堪重负。为扭转这种态势，自前苏联时期开始至今，俄政府进行过多次的努力和尝试，希望通过转型扭转经济结构的畸形状况，实现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的转型。俄罗斯军工体转型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此学界非常重视对军工体

* 此文的写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7JA790026)和中国博士后基金(20070410402)的资助。

** 周维第，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理论经济学在站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转型的研究，希望以此来进一步丰富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认识，并探讨推动俄罗斯产业经济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创新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因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俄罗斯军工体转型展开探讨，以便客观分析和展示俄罗斯军工体转型的绩效。

一、问题的提出

1. 选题的意义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始了市场导向的改革。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前苏联）也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俄学术界在俄罗斯经济转型领域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俄罗斯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学院派（以Абалкин А.И.为代表）和自由改革派（以Ясин И.Г.为代表）之争。我国学界的陆南泉、冯绍雷、冯舜华、程伟、郭连成、许新、田春生、景维民、李新、庄起善、唐朱昌、冯玉军、胡健（因篇幅不能逐一列出）等学者，在俄罗斯经济转型方面也进行了非常系统深入的研究，且著述颇丰，为转型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但学界在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方面，特别是在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从宏观层面看，俄罗斯经济转型表现为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中观层面看，表现为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升级，尤其是优先发展信息技术产业；而从微观层面看，则表现为企业的兼并重组和技术创新。因此，俄罗斯市场导向的改革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是通过转型推动经济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从相关文献获悉，至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原苏联用于军事工业体发展的年度预算资金达 GDP 的 13%，军事工业体的产出在 GDP 中的占比高达 30% 以上，而且 60%—

① 冯绍雷、相蓝欣：《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冯舜华：《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程伟：《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评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郭连成：《俄罗斯经济转轨与转轨时期经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许新：《重塑超级大国：俄罗斯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田春生：《东欧中亚国家演变后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 年；景维民：《转型经济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李新：《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与中国》，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庄起善：《过渡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年；唐朱昌：《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年；胡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年。

80%的工业企业属于军工企业或与军工工业相关的企业^①。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现国防工业体（注：以1997年为界限，之前称军事工业体，之后称国防工业体^②）的转型。而且，国防工业体是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和来源。

可见，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是俄罗斯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深刻理论意义在于，有利于更进一步认识俄罗斯经济转型，丰富和发展转型经济学。同时，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也对其产业结构调整 and 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经济意义非常深远。

2. 文献回顾

俄罗斯学界对其国防工业体转型进行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如Курнышева И., Петров К., Фарамазян Р., Борисов В., Кузык Б., Морозова В. Д., Чертов Б., Быстрова И. В., Астахов А. А., Рассадин В. Н., Хазбиев А., Селищева Т. А.等学者，分别从军事理论、政策体系、财政金融、经济结构、自身状况、世界政治经济背景等多个不同的角度对其国防工业体的转型路径以及其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③

除了以上学者之外，俄罗斯学界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例如Бжилянская Л., Залещанский Б., Маслюков Ю. Д. и Глубоков Е. С., Белоусов Д. Р. и Шухгальтер М. Л., Горностаев Г. А., Дерябина М., Королев В., Соколов А. В., 等，则认为国防

① Селищева Т. 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трук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Пб.: СПбГИЭУ. 2005. СС. 248, 251.

② Селищева Т. 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трук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Пб.: СПбГИЭУ. 2005. СС. 248, 251.

③ Курнышева И., Петров К. Итоги дер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экономики//Экономист, 1998. №9; Фарамазян Р., Борисов В.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и контуры будущего//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9; Кузык Б. Н.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 прорыв в XXI век, М.: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 1999; Морозова В. Д.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 в рыно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СПб.: СПбГУЭФ. 2000; Чертов Б. Дорога в космос//Экономист, 2001. №4; Быстрова И. В.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 опыт 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те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атериалы II Чайновских чтений), Москва, 2002 г.; Астахов А. А. Финансовый механизм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оборо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М.: МЦФЭР. 2002; Рассадин В. Н.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М: МАКС Пресс, 2002; Хазбиев А. Через четыре года начинается самая масштабная реформа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за всю историю России//Эксперт, 2002, №1-2; Хазбиев 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оборона армии не нужна//Эксперт, 2004. №9; Селищева Т. 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трук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 Перербург: СПбГИЭУ, 2005; Селищева Т. А. Структур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а пути к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 С. Перербург: СПбГУЭФ, 2006.

工业体不仅是俄罗斯曾经强大的象征，而且也是人民创造性思维以及管理专家组织能力的最好体现，^①特别是，它是俄罗斯摆脱经济危机的中流砥柱和经济创新的重要载体^①，国防工业体也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经济发展的源泉^②。由此可以看出，国防工业体在过去的苏联时期和俄罗斯的现在以及将来经济发展和经济创新中的作用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我国学界较早开始对俄罗斯军工体开展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冯玉军，黄区行、陈波和杨润华、林晓光，王新俊和彭国清等，他们从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现状、转型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近期的文献中，初祥、杨艳军，党建国等的研究更多亦偏重于负面影响的分析，而对其积极效应的探讨尚嫌不足。^③而且，目前我国学界对国防工业体转型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全面客观分析方面也较欠缺。因此，笔者以为，对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探讨非常必要。

二、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路径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俄罗斯军工体转型具体表现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上，军工体转型表现为经济体制的转型；微观上则表现为企业生产军工产品的一种独立的经济活动。企业的生产活动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利润最大化的一般原则，而且企业的均衡产量也根据这一原则来确定。通过分析企业的经营活动使得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军工体的具体部门和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如何凭借其自身力量来摆脱困境。从事国防工业生产活动的企业的最优化战略，不仅取决于其所在部门拥有的具体条件，而且也受其参与国防工业体活动的特征和形式的影响。通过下图 1、图 2、图 3 和图 4 对

① Бжилянская Л. Конверсия оборон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в ракурсе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4. №4; Залещанский Б. Оборонны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как освои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е рынки//Росс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8. №2; Маслюков Ю.Д., Глубоков Е.С.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и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ССР. 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мощь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Военный пар". 1999.

① Кузык Б.Г., Яковец Ю.В., Россия –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прорыв. М.: Экономика,С.185.

② Ерасова Е.а. ,Экспорт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Экономика.,Сер. 5.

③ 冯玉军：《俄罗斯的军事改革》，《国际资料信息》1997 年第 11 期；黄区行、陈波和杨润华：《俄罗斯国防工业军转民的现状与前景》，《全球科技经济瞭望》1999 年第 4 期；林晓光：《俄罗斯的军事改革》，《西伯利亚研究》2000 年第 5 期；王新俊、彭国清：《俄罗斯国防工业十年改革回顾与展望》，《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6 期；初祥：《转轨时期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西伯利亚研究》2004 年第 6 期；杨艳军：《俄罗斯军品出口对国防工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国防科技》2007 年第 3 期；党建国：《冷战后俄罗斯国防科技体制转型探析》，《国际展望》2007 年第 7 期。

其演变进行简单描述，可以看出俄罗斯国防工业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状况。

图 1 反映的是在全球军备竞赛异常激烈背景下，也就是在冷战时期，国防工业企业面临着空前危机的状况。此时的军工体完全处于寡头垄断，或者甚至处于完全垄断竞争之中。从图示中可看出，由于垄断的影响，需求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此时企业的需求曲线的倾斜度相对较小。而需求曲线的斜率大小取决于寡头垄断或者垄断竞争市场的状况。大多数军工企业承包商在具体的武器和军工技术，以及其他包括炮弹、轻型武器和炸药等在内的其他武器市场上，一般更接近拥有垄断竞争市场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国防预算非常之大，政府的武器采购巨大，军工企业生产缺乏积极性，这样使得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LAC 相对比较高。同时，军工产品的产量和销售额也相当多。这时，国防工业体的利润即使在单位产出利润不大的情况下也因产量和销售额相对较大而变得较大，如图 1 中所示的 EFHG 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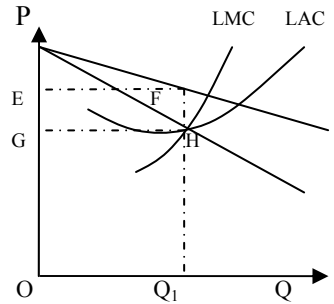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反映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军备竞赛日趋减弱，市场对军工产品的内、外需求均大幅缩减的状况。一方面，国家对本国军工产品的采购减少，另一方面，国际上来自其他国家对本国军工产品的购买量亦随之下降。这样，依赖中小军工企业的承包商以及那些对军工产品不很专业的承包商相应减少，这样导致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变得较完全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状况下更陡，也就是说对军工产品的需求量下降。整个市场出现了近似寡头竞争的状况，军工体内企业的平均成本急剧上升，产量大幅缩减，正如图 1 和 2 中显示的那样 $Q_2 < Q_1$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军工体的生产相对其专业化来讲不具备很强的多样化。如果军工企业生产的产品既不具备自身的技术优势，又无创新能力来降低产品成本，如果军工企业不能找到通向国际市场的突破口以扩大其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那么军工体将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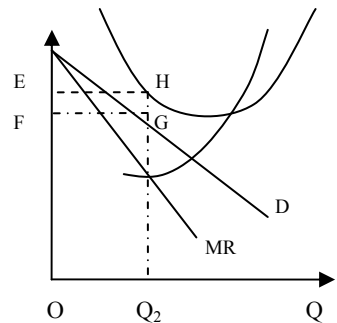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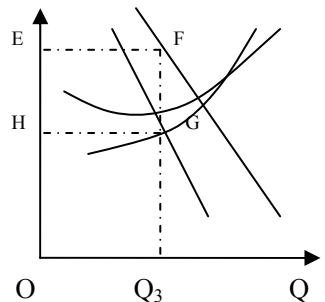


图 3

图 3 反映的是在国际市场需求缩减的背景下，

军工体中的企业能够降低长期平均成本，扩大其在世界市场上份额的情形。在这种状况下，需求曲线是向右上移动，而且相对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状况下要偏陡些。由于成本的下降将会使企业提高单位产品的利润，并扩大产品生产和销售。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政府或企业扩大对军工体企业的投入，提升其科研水平或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使得企业生产的产品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

图4中描述了完全竞争的军工体厂商的长期的均衡状况，也就是说此时的边际收益与长期边际成本以及长期平均成本相等，生产厂商着力开发和拓展出口市场。在武器市场相对萎缩的背景下，军工体企业如无自身的技术优势，又不能加大对企业的设备更新的投入和增加自主创新的能力，并以此来降低产品的长期平均成本，要想赢得国际市场需求份额是不可能的。因此，军工体企业可通过自身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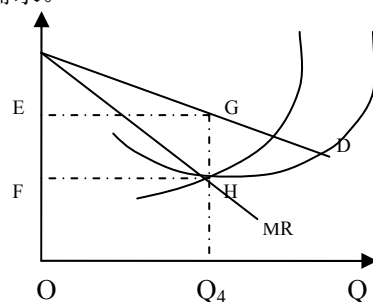


图4

品的多元化、扩大对现有企业设备更新以及企业基础技术研究的投入等方式，来降低长期平均成本，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从而扩大生产和销售，以期达到增加企业经济活动利润的目的。

三、军工向民用转型的最优路径选择

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从生产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军事工业体内军工和民用产品的选择长期处于不完全和低效率地使用已有资源和条件的状况之中。在这种状况下，军事工业体主要依靠大量消耗对资源的使用（粗放式的增长）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当然并不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生产工艺和组织创新等。为了更好地说明军工体的演变过程中军工向民用（包括军民两用）产品转变的路径，我们进行以下的模型假设并加以简要分析。

1. 模型假设

在任何国家对某一领域包括资本、人才、知识等的投入都是有限的，国防工业体也不例外。因此，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如果资源一定，国防工业体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应该是如何实现军工和民用产品生产的效用最大化。

为分析军民产品的最佳路径，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军工和民用产品（包括军民两用产品）的生产效用函数如下：

$$M_i = f(X, Y) = X^\alpha Y^\beta \quad \text{①}$$

这里 M_i —— 生产效应, X —— 军工产品生产量, Y —— 民用产品生产量, α —— 军工产品的产出弹性, β —— 民用产品的产生弹性。

我们假设, 为保障国家安全, 投入到国防工业体的资源总量为 C , 资源的单位价格为 P_c , 单位军工产品的价格为 P_x , 单位民用产品的价格为 P_y ,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

$$M_i = P_c C = P_x X + P_y Y \quad (2)$$

为求解函数②, 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拉格朗日函数:

$$\Lambda = X^\alpha Y^\beta + \lambda (P_c C - P_x X - P_y Y) \quad (\lambda \neq 0) \quad (3)$$

当函数③中所有偏导数都等于零时, 这个最优化问题有解: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X} = \alpha X^{\alpha-1} Y^\beta - \lambda P_x = 0$$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Y} = \beta X^\alpha Y^{\beta-1} - \lambda P_y = 0 \quad (4)$$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lambda} = P_c C - P_x X - P_y Y = 0$$

求解组合函数④, 可以得到军工和民用产品最优化产量:

$$\frac{\frac{\partial M_i}{\partial X}}{\frac{\partial M_i}{\partial Y}} = \frac{\partial Y}{\partial X} = \frac{P_x}{P_y} \quad (5)$$

$$X^* = \alpha P_c C / (\alpha + \beta) P_x \quad (6)$$

$$Y^* = \beta P_c C / (\alpha + \beta) P_y \quad (7)$$

2. 模型分析

从公式⑥和⑦中可知, 这条最优路径的选择主要取决于 $\alpha/\alpha+\beta$, $\beta/\alpha+\beta$, P_x 和 P_y 的取值。在 P_x 和 P_y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如 α 增长速度快于 β 的增长速度, 那么 X^* 的值将会相应增加, 而 Y^* 的值将会相应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增加军工产品量, 而相应减少民用产品量; 相反, 如 α 的增长速度低于 β 的增长速度, 那么则应相应增加民用产品量。在 α 和 β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如 $P_x < P_y$, 表明军工产品的单位产品价格小于民用产品的单位产品价格, 那么应相应增加军工产品量; 如 $P_x > P_y$, 则应减少军工产品量; 如 $P_x = P_y$, 则可在两者中进行任意选择。

3. 军民产品的最优路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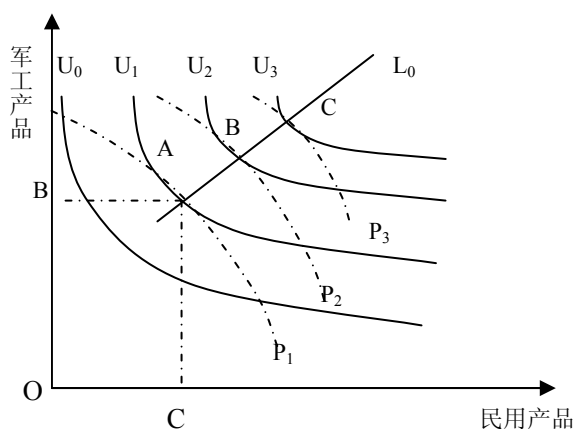


图5 军工和民用产品产量的最优选择

从理论上分析，军工和民用产品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将会在以下的状况下（如图5所示）达到均衡。从图5中可知，军工和民用产品生产可能性边界决定了社会资源使用的可能性，但最终军工和民用产品生产的最优结合点则主要是由存在于军工和民用这两种类型产品的效用偏好来决定的。假设凭借某种方式国家能够成功地发现社会的效用偏好，并将其描绘成各种曲线图，生产可能性曲线 $P_1, P_2, P_3 \dots$ 与无差异曲线 $U_1, U_2, U_3 \dots$ 相切于 $A, B, C \dots$ 点，那么曲线 $P_1, P_2, P_3 \dots$ 就是军工和民用产品生产的最优化选择模式，而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 $A, B, C \dots$ 点也就是两种产品的最优生产量点，连接 $A, B, C \dots$ 的曲线 L_0 就是军工与民用产品的最优产量选择的组合线。

但应该指出的是，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效用曲线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国际武器市场的需求将会发生同向变化，各国将会根据自身的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影响自身国家的军工和民用产品的生产量。当国际政治形势趋紧时，即使民用产品的效用相对大于军工产品，这时的军工产品的生产将会相对具有刚性。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军工产品的生产偏离均衡组合线，向纵轴倾斜。

四、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效用的实证分析

冷战前，俄罗斯国防工业体处于国家作为寡头的高度垄断时期，这一时期的状况就如图1所示。而冷战后国防工业体的转型路径通过图2，图3和图4中得到了较好的描述，而且后冷战时期的国防工业体转型又可细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由于受到“休克疗法”政策的影响，在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经历了比其他领域更深刻的危机,它走过了1992年—1994年的“前期无序的转型阶段”、1995年—1997年的“从无序逐渐走向有序发展的阶段”、1998年—2000年的“理性的重组阶段”和2001年至今的“国防工业体转型的新策略”和逐渐提高其整体实力的时期^①。前期,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采取了相对激进的、且缺乏科学根据的方式和方法,对俄罗斯整个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整体技术实力,导致了俄罗斯在世界武器和军工技术市场份额的散失,而且降低了国防工业体对其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尽管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但国防工业体的转型对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持续发展不乏积极的推动作用。

1. 保存了最关键的技术和生产潜能,推动了俄罗斯在该领域国际合作的开展。

尽管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中存在诸多困难,但仍为稳定国家的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俄军工体系的转型保存了最大的高尖精技术部门,造就了一批新技术生产联合体和产业,这为俄罗斯未来高新技术的发展夯实了坚实的基础。不少外国公司积极寻求与这些部门合作,从建立合资公司到联合生产。俄罗斯有500多个企业通过合作的形式与前苏联的十多个加盟共和国的1236个企业建立了合资或合作关系。同时,俄罗斯还加强了与美国、德国、法国及东亚地区多个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合作,共同从事飞机及零部件以及市际电话交换站等的生产^②。俄罗斯希望找回其昔日武器出口大国的地位,开始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军,特别是亚太市场是俄罗斯军工产品和技术的主要出口方向,而且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向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军工产品。俄罗斯向中国的武器及军事技术出口额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32%,其次是印度占17%,对中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出口也仅占总出口量的30%,欧洲国家占13%,东南亚国家的份额最少,仅为8%^③。通过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出口赚取的大量外汇,为其经济的复苏和财政状况的好转补充了所需资金。

近几年的实践也证实,俄罗斯已着手开拓其在东南亚国家的市场。2003年俄国防部长对东南亚部分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就军事出口问题与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俄罗斯与印度的军事技术合作在不断提升,两国在开发第五代战机方面开展了合作。这也是俄罗斯军事工业走向世界,并参与国际军事合作的重大举措。此外,俄罗斯已开始向非洲市场拓展其影响和势力。

2. 国防工业体内部的结构得到优化。通过对国防工业体进行市场导向的整合,

① Королев В. ОПК России: вопросы 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Вопросы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управления. 1999. С.4.

② Кузык К. Выс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М.: ИНЭС. 2000. С.357.

③ Курнышева И., Петров К. Итоги д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экономики//Экономист. 1998. С.9.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的结构进一步优化、效率不断提高、竞争力逐渐增强。经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转型，其国防工业体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体系得到了一定的优化整合，并形成了相对集中的集团公司。国防工业体转型推动了国防工业体内部军民产品结构的优化，并对俄罗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组合发挥了较强的积极作用。

目前，俄罗斯国防工业体中军民产品生产的比结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下表所示）：

表 1 1989—2015 年军民产品在俄罗斯国防工业产出总量中的比重

产品总量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军工产品	60.0	51.5	42.5	53.2	46.5	46.4	47.9	50.2
民用产品	40.0	48.5	57.5	46.8	53.5	53.6	52.1	49.8
产品总量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5	2015 ^a
军工产品	42.8	46.1	54.3	55.5	52.8	58.1	55	40
民用产品	57.2	53.9	45.7	44.5	47.2	41.9	45	60

资料来源：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Великий Новгород: НГУ. 2008. С.166.

出口结构方面，尽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仍是其出口的主要且关键性的力量，但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在整个出口总量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而且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又主要依靠国防工业体的技术实力和技术基础。

但应当指出的是，未来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正如普京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指出的那样，目前俄罗斯国防工业体仍缺乏极具影响力的结构转型，而且设备老化严重，如在造船、弹药生产、专门化学和元素基础等领域的战略性发展和改革尚有待进一步深入^①。

3. 推动了军工产品及军工技术的出口

通过对国防工业体的兼并与重组，俄罗斯政府增强了政府财政投入的目的性，加大了对高新技术领域的投入，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从下表可知，至 2007 年，俄罗斯国防工业体的产品出口量已是 1992 年的 2.5 倍多。这充分说明了通过整合重组后的国防工业体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也充分说明了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自身潜能的存在和不断发挥。国防工业体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和支撑作用也在不断提升。

^① http://www.rian.ru/defence_safety/20060620/49780566/html.

表 2 1992—2007 年俄罗斯的军工出口情况（单位：10 亿美元）

年 份	1992	1994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出口额	2.7	1.718	3.52	2.6	2.605	3.393	3.681
年 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出口额	3.705	4.81	5.4	5.8	6.126	6.5	7.5

资料来源：根据 *Аэронавтика и космос*. 2007. №52. С.9; *Коммерсант*. 2007.25 декабря. С.1; *Ведомости*. 2008. 23 января. А01 等资料整合。

4. 对国防工业体的财政支出增加，军事领域新技术研发提升。在国防工业体的整合过程中，俄政府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务是保存和实现现有武器的现代化，同时加强新武器的研发工作。为实施该计划，俄政府在 2002 年至 2006 年的 5 年里，将国防工业财政支出的 40% 主要投向军事领域新技术的研发方面，而在原有的体系下，政府的预算难以为继。据资料显示，2002 年俄国防领域的所有债务已全部偿还，政府对国防的订购增长了 117.1%^①。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俄罗斯不断增加国防工业领域的财政支出。2002 年政府对国防工业体的整个预算为 800 亿卢布，2003 年增加至 1130 亿卢布，2004 年在 2003 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30%，达到 1480 亿卢布，2005 年更加增至 1869 亿卢布。2005 年用于国防工业体的政府预算中有 628 亿，即占整个预算的 33.6% 的资金用于其中的科学研究和设计试验工作^②。2006 年国家财政用于国防工业体的支出较 2005 年再增加 30% 以上，并且主要用于武器研发和装备的更新和现代化。

为增强俄罗斯武器在国际武器市场上的竞争力，俄已经开始了集中财力物力进行第五代战机的研发工作。据报道，2006 年 7 月初现代化的战略轰炸机 *Ту-160* 将装备俄罗斯空军，从而使俄空军的远程核打击力量大增^③。同时，俄罗斯第五代战机的研究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将装备在第五代战机上的性能先进的中高频发动机正处于试验飞行阶段，2010 年前将在第五代战机上装备这种中高频战机发动机^④。同时，俄罗斯政府拟恢复民族技术中濒于崩溃的电子元件工业。据俄罗斯新闻社 2006 年 9 月 26 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说，俄罗斯将从 2007 年起实施专门发展电子工业的项目。俄罗斯将发展最先进的超导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国防工业体中的 C-300 和 C-400 项目以及海基战略核力量上。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在有关支持国防工业体发展的会议上指出，尽管世界正处在经济危机中，2009 年政府仍将继续支持国防工业体

① *Финансовая Газета*. 2003.02 декабря.

② <http://www.tekton.ru/themes/basic/materials-document.asp?folder=1576&matID=1872>.

③ http://www.rian.ru/defense_safety/weapons/20060615/49523997.html.

④ http://www.rian.ru/defense_safety/weapons/20060615/49521336.htm.

的技术创新^①。同时，普京强调，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整套措施以保证对国防工业体计划项目的政府贷款和补贴，并对正在完成国家国防采购任务的企业提供贷款和财政担保^②。

未来，俄罗斯在世界武器出口市场上仍将具有相当的竞争力。目前，世界战机市场主要由美国的F-15、F-16 战机，法国的幻影“拉法利”和俄罗斯的Cy-27 及其改进型 Cy-30 所占据。据分析，尽管俄罗斯在国际战机市场上的份额较美国逊色，但从新技术的研究成本来看，俄罗斯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的优势。例如，美国生产批量为 500-1000 架的F-15 战机的售价为每架 5000 万美元，而俄罗斯具有与美国同样技术性能的战机的售价只有 3500 万到 4500 万美元^③。

五、结 论

通过对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及其军转民最优化模式所进行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对其国防工业体的投入、国防工业体的产出模式及其利润模式也在发生不同的变化。

2. 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俄罗斯国防工业体的转型路径将依据利润最大化原理进行，而且转型过程的军民产品比例与其效用的大小高度相关。军工与民用产品产量的最优路径选择受到两种产品的产出弹性及每种产品单位价格取值的影响。

3.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过程中因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其自身的特殊性，现实中的转型路径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理论模型。

4. 实证分析显示，俄罗斯国防工业体的转型路径充满了困难和曲折，但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明确了发展的方向，而且其积极效应在不断显现。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推动了俄罗斯产业结构的优化，为俄罗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经济创新乃至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夯实了基础。

【Abstract】 Russian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has experienced a long and difficult process through the transition from Stalinist model during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period to the market-oriented model. In particular, the practice of transfer of military industry to

① http://www.rian.ru/defense_safety/20090115/159316161.html.

② http://www.rian.ru/crisis_news/20090115/159321520.html.

③ Хазбиев А. Через четыре года начинается самая масштабная реформа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за всю историю России//Эксперт, 2002. №1-2.

civilian in the 1990s i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which weakened Russian economic strength in a short term. However, Russia has gradually determined the further orientation of its defense industry,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s of it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economy.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analyzing the restructuring path of Russian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oretically and discuss thoroughly its tremendou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ssia, Transition Path of Russian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Economy Effectiveness Analysis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 анали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责任编辑 姜睿)

欧亚·斯拉夫

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 阶级与阶层的视野

邵书龙*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苏联东欧社会变迁的实证分析，从社会结构分层的视角探索苏东社会转型的原因及过程。首先，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导致的城乡社会结构的改变，是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这是它与东亚、拉美等国或地区的社会转型具有深层关联性的一面。而农民迁移到城市的结构性流动所产生的复杂流动机制和分层机制，对苏东社会转型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冲击。苏东社会的中间阶层，其价值观、社会功能和政治态度对激进的制度转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次，先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由农民向城市工人的阶级分层发生变化，然后才是表层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在市场化背景下，苏东社会的阶层分层因利益多元化而发生分化。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明显地分为这两个阶段。

【关键词】社会结构 社会转型 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C915.5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058-(25)

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作为 20 世纪后期和 21 世纪初期国际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程，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人们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和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进程。在西方学者看来，不管是拉美军事威权体制还是东亚官僚威权体制抑或苏东的党国体制，其转型都是向民主体制的转变，说得直接一点，其实就是按照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模式来转型。所以，研究重

* 邵书龙，上海大学社会学 2006 级博士生。

点主要放在转型的具体路径和策略方法上。相比于国外学界，国内学界对苏东转型在认识上有一个过程。剧变之初，政策界、学界主要从如何防止演变及总结教训等着眼。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加，研究者逐渐对苏东社会转型进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做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探讨其发生和演变的深层机理，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的国际政治、共运学科向综合学科和多维视野过渡。冯绍雷教授认为，原苏东、南欧、拉美、东亚等国的转型，一方面其制度与社会变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相互联系的外在客观性；另一方面，各国的转型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表现为面貌各异的各国精英自主选择的多样性的转型结果。^①对苏东社会转型进程的研究而言，社会学应该是重要的工具之一。但迄今为止，苏东社会转型的社会学分析尚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本文将尝试从社会结构分层的角度来阐述苏东社会转型的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从而在宏观的结构层次上再现苏东社会转型与东亚、拉美等转型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外在客观性，并在具体的策略选择和多样的路径依赖上把社会转型的独特之路展现出来。

一、苏东社会转型的原因、观点及方法

关于对苏东剧变的认识，西方的主流解释大致有二：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计划经济效率不高，唯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才是可行的；^②二是一旦进行自由化改革，就给了人们打破旧体制的机会。下层群众通过选举、游行、罢工等，和平瓦解了现行体制，下层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共产党精英在把资本主义引入苏联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由于苏联体制不可避免的崩溃，党一国精英别无选择，只能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④此论与主流观点大相径庭，却颇得到俄罗斯学者的认同。西方学者对苏东垮台的解释多少带有西方模式的色彩以及西方民主化转型的理论预设。国内学界更是见仁见智。诸如“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上层自决说”、“经济没搞好说”、“斯大林模式说”、“错误路线说”、“抛弃说”等，共有十几种之多。^⑤其中“和平演变”说比较有市场。经济

① 冯绍雷：“原苏东、南欧、拉美、东亚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

② Malia Martin, *The Soviet Tragedy: 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p. 496.

③ Rasma Karklins, “Explain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Europe-Asia studies*, 1994/4, 1: 29-45.

④ [美]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曹荣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第37页。

⑤ 刘昉献：“对十年来中外学者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分析”，《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学界的主要争论集中于“渐进转型”和“激进转型”方面。有意见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由于坚持了渐进转型，而苏联东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实行了激进式改革。而激进式改革又与私有化的改革路线相联系，渐进式改革则与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①随后也有人反对这种联系。秦晖对这个观点曾给予批评，指出中国式的“界定式私有化”改革并不比苏东的做法更“渐进”。^②杨小凯在“经济转型和宪政转型”这篇文章中提出：经济转型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不能以中国的所谓“渐进”转型的业绩去论证俄罗斯“激进”转型的失败，对两个国家转型成效的认定要考虑多重因素。^③目前有关转型国家的制度建设正逐渐成为新的关注视角。其他还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苏联政治转型的，不再详述。^④

与比较政治学、转型经济学和历史学等传统领域的学术成果相比，社会学在探寻苏东社会变迁和转型方面，尚存在较大的学术空白。运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理论对苏东社会结构变迁所做的研究，虽然问题意识和研究角度有所不同，却为后来的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苏东社会转型打开了空间，但也存在较大不足，主要是对分层结构和分层机制在社会运行的实践过程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理论上交待得不甚清楚。^⑤社会分层（包括下面提到的社会流动）理论有多种研究取向和范式。当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人们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社会常用的一些分层标准，对社会结构一般地采用财富、声望、权力、职业等多元分层方法，而较少采用社会结构的阶级分析方法。苏联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一直有重视阶级分析的传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学研究，始终把阶级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两阶一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即是该理论的核心观点。^⑥当然坚持社会分层的多元分析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学术传统，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学也开始借鉴这一

① 持此观点者甚多，参考关海庭：“论当代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② 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③ 转引自冒天启：“转型经济研究中的理论难点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④ 杨光斌：“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⑤ 这些研究主要有：赵定东：“中国与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比较研究与‘中国经验’分析”等，《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赵的多数文章，把社会结构转型等同于分析社会利益关系协同机制，有时又把社会转型看作是文化的结构变迁。庄晓惠，侯钧生：“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社会》，2008年第2期，主要谈转型之后的俄罗斯静态的社会分层状况，对苏联向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的分层结构没有涉及。陈映芳：“前苏联阶级结构的社会学分析”，《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1期，以地位等级来划分社会分层。并进而推论这种分层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胡健：“市民社会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3期，认为市民社会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具有破坏力量并引发了社会冲突。其中有些研究没有搞清楚苏联社会的分层性质以及与西方的社会分层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兹不详论。

⑥ 贾春增：《当代苏联社会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年，第163页。

思想和方法。如在达维丘克主编的《应用社会学词典》(1984)和艾托夫的《苏联城市社会结构》都有这方面的体现。^①在考察苏东社会的基本分层结构时,不能忽视苏联社会与西方欧美社会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上的历史实践过程和社会变迁过程的重大差异,并应对这种差异给以理论的阐释。如果简单地把多元阶层分析当作一切社会转型过程全部和当然的理论预设,简单套用到苏东社会分层的划分上,而在理论上和线索上又讲不明白的话,则无法区分现代化国家的社会转型同拉美、东亚、苏东等地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变迁过程中的差别。试看下面二例,上层:高级官僚和大学毕业精英,占3.8%;中上层:中级技术和专业人员,占6.6%;中下层:熟练工人及职员,占15.7%;下上层:中级职员、半熟练工人(含集体农庄工人),占27.5%;下下层:下级职员,集体农庄农民,占46.4%。^②西方甚至有学者更是把苏联的社会阶层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国企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及职员、半熟练工人、中级职员及集体农庄熟练工人、不熟练工人、下级职员、集体农庄农民等十四个阶层,每一个阶层都有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③这种做法,其背后隐含着一个理论动机,即寻找该社会的中产阶级。按照西方现代社会分层理论,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力量。但是,在拉美、东亚、苏东社会,中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性格特征呈现出异常复杂且多变的面貌。对此,中外学者也多有实证分析。实际上,苏东社会正是跌倒在它的中间阶层手中。当前俄罗斯的学者已经开始反省和批评上述学术趋向,并提出了“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政治化”等概念,^④对中产阶级的膜拜现象提出了批评。还有一种研究取向,是将社会阶层分析与利益关系结合起来,以求解苏联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格局的变动关系。^⑤这种方法,在理论假设的前半段,即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体制对苏联的阶层结构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点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理论假设的后半段,即阶层结构变动而产生的新社会阶层,由于利益机制不平衡而导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垮台,则是站不住脚的。尽管社会结构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是产生深层次社会变迁的基础性原因,但是生产方式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如何影响社会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逻辑就可以说明的。再者,社会阶层只是一个笼统的社会划分单位,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单位,一两个新阶层的兴起是否能承担打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

① 贾春增:《当代苏联社会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

② 陈映芳:“前苏联阶级结构的社会学分析”,《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1期。

③ Olga Kryshchanovskaya & Stephen White, “From Soviet Nomenklatura to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5, 1996, pp. 711—733.

④ 参见俄科学院院士尤瓦·阿鲁秋尼扬:“苏联解体后的俄社会结构”,[俄]《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9期。

⑤ 黄立菲:《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

的重任？即使能够，该假设能否适用于其它国家的制度变革？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说明。因此，新阶层由于利益关系反过来决定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可否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去使用，尚存疑问。该方法的理论实质在于，欲把阶层结构变动与阶级结构变动不加区分地用于解释社会的转型问题。这将面临一个理论障碍，即阶级与阶层的划分标准可以是统一的，而这明显违背了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原理。

仇立平先生对韦伯的阶级分层思想的研究，可以说直接从理论上解决了苏东社会研究中如何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社会变迁的不同性质，来具体判断该社会结构究竟是以阶级分层为标准还是以阶层分层为标准这个问题，对进一步认识和解决苏东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分层状况有很强的理论启示意义。^①根据仇立平先生的研究，韦伯一方面强调市场体系下的多元分层，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拒绝阶级在分层中的作用。韦伯强调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的动态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②。而且阶级分层和等级分层不会同时出现，阶级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动，而阶层的社会分层反映了表层的社会结构变迁。从阶级分层到阶层分层正是苏东社会进行重大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历史线索。

一般来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社会转型期，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技术和经济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社会分层主要表现为阶级的分层。欧美社会结构研究中，大多运用静态的、描述性的阶层分层的指标和方法，该方法更适用于发达国家中比较稳定的社会运行条件和变迁环境。在苏东社会处于急剧变动状态下直接套用阶层分析方法，并不一定能反映出其社会变迁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如果一谈社会结构，一谈具体的社会分层，就按照收入从高到低，按照职业从白领到蓝领，或按照权力从管理地位到被管理地位，划分为几个甚至十几个层次的话，这样的研究方法试之于任何社会皆有效，却不能说明问题。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建国之初，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农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的80%以上，农民占到总人口的85%以上，都存在一个如何使农民转化为城市工人的历史重任。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工人这两大社会集团，就不宜按阶层分层方法来划分。这不仅仅是因为存在一个地域分界的问题，而且还因为其基本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如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以及工业化追赶战略，与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市场条件下的西方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社会，一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势必会引发

① 仇立平：“阶级分层：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另一种解读”，《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社会阶层理论：马克思和韦伯”，《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②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0页。Mar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p. 193-194. 转引自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从政治参与到制度化进程，从经济发展模式到资源配置方式，从生产组织形式到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还有比这个变化更能反映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吗？如果生硬地套用阶层分层方法来划分苏联东欧剧变时期的社会结构状况，最后往往会走到按地位等级或职业、收入等进行分层的路上去。苏联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等级间的分化不是更严重了，特权也并不比任何国家更严重。如苏联大企业经理的报酬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是150倍。戈尔巴乔夫只有一套四居室，明斯克党委第一书记只有一套二居室，死后别墅和房子也要收回。整个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资本主义小得多。苏共为消灭三大差别，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增加工人工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快于技术人员和职员，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与脑力劳动者几乎接近。知识分子反而成了苏联转型前怨气最大的阶层，其工资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工人工资增长幅度，处于各阶层的最低一级。斯大林时期工人与职员和技术人员的收入比为1:2.15，到1985年，已缩小到了1:1.1。工资级差十分位数（10%最高与10%最低比值）从斯大林时期的8:1降低到80年代的3:1。^①西方学者像帕金、吉登斯等人，已经注意到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分层机制时，必须对不同时期（工业化初期及中期）的分层结构和流动机制进行区分，即是对过分重视权力分层方法的一个弥补。^②因为目前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的两种主要方法，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还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都是对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总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理论和范式去描述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和后发现代化、城市化国家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情况。如果运用韦伯的阶层分层方法去分析计划体制时期的苏东社会结构，很容易忽视这个时期苏东最大的社会关系结构，即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转型。忽略了这一点，也会影响到对解体后俄罗斯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的认识。笔者认为，先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由农村农民向城市工人的阶级分层结构发生转化，然后才是表层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城市市民社会本身由于利益多元化而发生的阶层分化。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很明显地分为这两个阶段。^③

① 3. T. 戈连科娃：《俄国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分层》（第二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94页。

② 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③ 仇立平教授认为，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阶级分层与阶层分层经常会发生反复的变动，并认为这也是韦伯的一个观点。韦伯确实也表达过这么一个意思。但笔者认为，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一个社会不会经常地发生技术与经济的显著变革，从苏联东欧的情况看，应该是总体上从阶级结构到阶层结构的变迁这一个过程，而不是反复出现。所以笔者认为针对完成城市化后（80年代末以后）向市民社会转型的俄罗斯社会，倒是韦伯的社会分层更适用一些，在这个阶段上可能仇教授更主张使用阶级分层。如是，则这是我与他不不同的地方，但笔者并未征询过他对此问题的观点。

运用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理论去描述该社会的分层状况，不仅要看当时社会变迁的性质与社会分化的阶段与形态，还要分析阶级分化的性质与程度。苏联 70 多年的历史，农民从占社会总人口的 82%降低到 1985 年的 12%，成为一个城市社会，事实上是苏联社会最大的结构变迁，这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型。东欧诸国自二战后伴随着农民大量迁入城市，也有一个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且由于东欧基础比较好，农民原本就少，有些国家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即已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所以如果简单地用城市居民的分层结构的变化，用西方经常描述社会分层的职业、收入、学历、财富等指标来解释苏东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结构转型，则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因为它忽视了最重要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工农阶级结构的转变。城乡结构的重大转型孕育了苏联社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是苏联东欧社会于 80 年代末相继发生剧变的社会实践逻辑。

二、高度城市化的深层结构转型与阶级分层

上世纪 80 年代的苏东社会的确到了一个发生转折的关口。以往人们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了苏东国家体制的集权性和经济停滞上，却忽略了苏东在社会结构层面发生的深刻变动。1985 年戈氏上台，经济增长率已不足 2%，经济、政治全面停滞。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决定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86 年 2 月苏共二十七次制定了“加速战略”，提出利用科技成果加速经济发展。据苏联社会学界的调查，在支持改革的主流派中，以年轻干部居多，基层管理人员中，越年轻就越热情地支持改变现状。^①事实上，苏联民主派的社会基础主要产生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实际上代表城市新兴市民集团的利益。以往人们总是以政治态度来划分民主派、保守派、激进派等，却很少从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角度去分析这些派别产生的社会基础。1987 年初苏联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和下滑，“年初工业生产比 1986 年 12 月下降 6%，出现了 1987 年计划可能像纸牌搭成的房子般垮掉的危险，‘加速战略’实施并不顺利”。^②苏共不得不抛弃计划经济的一套办法，觅求转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但是由于积重难返，面临了很大的阻力。“阻碍机制”（припятствие механизма）阻碍了

① Райг И.Х. Отношение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их кадров к перестройке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 Агропрома // Социолог.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88. №2. 转引自：黄立葑：《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350 页。

②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ига 1.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овости», 1995 г., СС. 349-350. 转引自：黄立葑：《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329-330 页。

社会经济的发展。^①放权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削减了从中央到地方经济管理部门干部的权力，而且对以前的计划管理机构 and 人员也进行了裁减和调整。中央计划部门以及地方企业对改革的消极和保守态度非常突出，改革推不动。无奈之下，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氏代表苏共中央做出了进行政治分权改革的决定。中心内容是通过竞争性差额选举，向各阶层群众开放政治领域，将支持改革的下层精英吸收到国家政权机关，以加强经济改革的推动力量。^②规定“凡担任苏维埃执行机构职务的执委会委员和执委会各部、局领导不能同时成为同级苏维埃代表，同时向上级机关推广这一原则”^③。这意味着对苏联的党政体制开刀，把权力从党向苏维埃转移。此举打破了苏共的党政合一体制和集权体制，分化了既得利益阶层的权力基础，使得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一些拥护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乘势参加竞选，党政分开和差额选举使底层社会精英有了向上层流动的渠道。政治分权改革得到了广大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热切拥护，许多公民投入到竞选当中。小小的破冰，不经意地打开了苏联剧变的闸门。在苏联第一次人代会上，激进派直接提出了废止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并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专心于苏维埃工作。最后苏共被迫放弃了一党垄断政权，确立了实行多党制和经济所有制多元化的方针。此时的东欧已经剧变，政权从共产党手中和平转移，苏联社会情绪进一步激进化，人民要求进行彻底的变革。戈尔巴乔夫为加强对国家的管理，又转行总统制。苏联进入了急剧的制度变革时期，接下来所发生的政治波动已不是任何一方能够完全控制的了。苏联社会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旧体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在农村社会基础上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高度集权管理模式。自从60年代苏联转化为城市社会之后，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熟练技术的青年市民阶层于七、八十年代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与上一代依靠政治忠诚和农村集体化背景的干部阶层相比，在行为和诉求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管理方式以及运行机制全都改变了。工业生产、城市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公司、银行、市场、社区、NGO等。80年代，苏联城市社会一下子出现了十万多个社团、协会和自治组织，这是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兴起的表现。国家的管理体制只有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在旧体制里再也寻不出什么出路来了。笔者认为，从阶级分层的角度来看高度城市化过程中深层社会结构的转型，才能找到

① 关于“阻碍机制”概念，请参考陆南泉：“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1期。

② 黄立蒞：《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91页。

③ 黄立蒞：《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44页。

苏东社会转型的终极变量，苏联的高度城市化导致的社会变迁，结果和过程都是惊人的。

1919年苏俄建政之始，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8%，卫国战争前夕的1939年，城市人口比重已增至32%。整个30年代，移居城市的农民达2700万人，为当时城市人口的一倍。西蒙·库兹涅兹写道：“从1928年到1940年的12年里，苏联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的数量，在其它国家需要30年到50年。”^①1939—1959年的二十年间，约有2400万人口移居城市，这期间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口占到80.8%。^②1960年，苏联城市人口比重达到49%，跨过了城市化关口，进入了城市化社会。据苏联1959、1979年二次全国人口调查，由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口在六、七十年代仍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58.2%。^③1959—1970年，每年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约有150万，而到了70年代，每年达到约190万人。其间苏联人口从1.63亿增长至2.738亿，增长了0.6倍，而城市人口增长了5倍，从0.291亿增长至1.775亿。^④集体农民所占比例由1959年的31.4%下降为1986年的12.1%，占就业人口的9.5%，仅剩1240万人。^⑤农村外流人口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1964—1970年，全苏农村20—24岁的青年男女分别减少了38%和43.5%，25—39岁的青年男女分别减少了28.4%和28.8%。^⑥至1987年，苏联的城市人口比重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快速增加了近50个百分点，速度惊人。美国同样幅度的城市化水平由19.8%提高到64%用了90年(1860—1950)，英国同样幅度的城市化水平由21%提高到60%用了120年(1800—1920)。^⑦

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苏联战后平均每年新建城市25座，个别年份能达到35—40座，全国大城市数量增长了124个。到80年代，苏联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272座，相比日本同样人数的169座和美国同样人数的155座，高踞世界之首。^⑧1985年，苏联高速度、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已接近66%，其中俄罗斯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3%，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接近，已经完成了由农民、农业社会向城市市民社会的转变。列文(Moshe Lewin)写道：“被西方观察家称之为苏

① Simon Kuznets, “A Comparative Appraisal”, in Abram Bergson and Simon Kuznets (eds): *Economic Trends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45.

② 纪晓岚：“苏联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评价”，《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纪晓岚：“苏联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评价”，《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

④ 纪晓岚：“苏联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评价”，《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

⑤ 陆南泉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⑥ 石人炳：“前苏联过度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及对我国的启示”，《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⑦ 石人炳：“前苏联过度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及对我国的启示”，《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⑧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35.

联历史中的停滞年代，其实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时期，可惜和往常一样，苏联城市化现象竟未能引起分析家们的注意，只有少数几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学者所写的一些著作和文章是例外。”^①

表1 苏联城市数量（个）

人 口	1959	1980
10—25 万	88 个	163 个
25—50 万	34 个	65 个
100 万以上	3 个	23 个

资料来源：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35.

表二 历次人口普查中城市人口的增长（百万）

年 份	1927—1938	1939—1958	1959—1969	1970—1978
城市人口总增长	29.8	39.6	36.0	27.6
自然增长	5.3	8.0	14.6	12.0
农村向城市迁移	24.5	31.6	21.4	15.6

资料来源：“Urbanization in the USS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6, No.2

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快速城市化的国家或地区来讲，苏联农民在迁移过程中的收入、住房、教育和医疗福利等也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拉美国家的农民大多是自主迁移，国家并不为移民提供住房和基本服务，更不负责就业，拉美的大城市到处是贫民窟和非正式就业者。巴西圣保罗市城东的贫民居住区住有 120 万人，没有一个医生，也没有一家诊所。^②苏联则为迁移农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农民不仅可以得到一份正式工作，而且国家提供免费培训、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为其子女免费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移居 4 年者，约有 55.2% 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移居 10 年者，约 81.3% 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③房租大约只有工资水平的 2—3% 左右。苏联农民就在这种高水平的福利过程中，快速而平稳地完成了由农民到城市工人的转变。苏联东欧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且高度城市化的历史实践过程。

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的构成形态，本文在这此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阶级（层）到市民阶级（层）的结构变动应该是考察苏东社会结构变迁的第一位的指标。

^①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32.

^②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过程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525 页。

^③ [英]默文·马修斯：《苏俄的阶级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220—221 页。

这种社会阶级结构力量的变动，足以导致社会系统的重大调整和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而不仅仅是身份、职业和地域的变化。人们在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组织机制等方面的根本变化，属于韦伯所言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时期。这一变革有着深刻的经济转轨和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机理，就是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来体现的，社会结构是连接它们二者之间的中介。社会学甚至把社会结构的转换看作是从深层次上影响产业结构调整 and 资源配置、决定经济体制变迁的巨大潜在力量。政治社会学也认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对政治格局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当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变迁达到一个临界点，新的社会阶层置换了旧的社会阶层，社会力量的构成和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该社会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终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动，社会转型也就由此启动。这个转型首先就是从农业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从数据来看，凡是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产值中所占份额下降到 30% 以下，城市化水平达到 50—70% 左右，不管先前是市场体制还是计划体制，也不管它的权力结构类型是威权体制、军事官僚体制还是苏东的党国体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结构的深层次转型。为避免从静态角度描述社会变迁现象，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注重和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自上世纪 60 年代 A. 英克尔斯探索以数量指标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来，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结构转型时更倾向于对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变动时序和具体的变动轨迹进行数量的考察，以找寻社会结构转型的“临界点”。^①李培林先生曾给出一个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外在客观性的基本判断：人均 GNP 3000 美元水平，农业产值占 GNP 的 15% 以下，第三产业比重在 45% 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50% 以上，非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 70% 以上。^②美国哈佛大学钱纳里教授也曾对结构转变与工业化过程的关系作出过开创性研究。记住下面这个数据似乎是必要的：1985 年，苏联的城市化率达到 66%，这是一个平均值，其中俄罗斯的城市化率达到 73%，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达到 71%，达到或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亚几个以农业为主的前苏联国家城市化率较低，像乌兹别克斯坦为 42%，吉尔吉斯斯坦为 40%，塔吉克斯坦为 34%。^③接下来我们将会提到一个发现：城市化水平是否达到或超过 66% 这个敏感点非常重要。一些强管理体制和集中型权力结构的国家及地区，像苏联、东欧及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还

① 李培林：“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研究”，《哲学动态》，1995 年第 2 期。

② 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8 页。

③ 郭吴新：“苏联城市发展及其问题”，《当代东西方学术思潮讲坛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98 页。

有拉美的墨西哥、智利等，它们的社会转型在外在客观性上有一个极其相似之处：即发生社会转型的转折点几乎都处于城市化水平为 66%这个有着强相关关系的统计数值上（即三分之二的人口为城市人口，似乎可以称之为 2/3 临界点）。在东亚，韩国从 1950—1980 年，农业劳动力从 74.1%下降到 34.7%，城市化水平由 1950 年的 18.4 上升为 1985 年的 65.4%，^①随后马上启动了高度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战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地区。城市人口比重从 1947 年的 20.6%，上升到 1982 年的 61.3%。^②1987—1988 年，台当局放松政治限制，高度城市化的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开始启动。在拉美，1950—1960 年，拉美农村人口增长部分的 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 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 58%。城市化平均水平由 1950 年的 41.6%提高到 1980 年的 65.6%这个极易引发变革的阈值后，拉美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也如约而至。先是墨西哥进入了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时期，接着是智利紧随其后，随后阿根廷也开始启动城市化社会转型。^③在东欧，保加利亚 1980 年的农业产值由 1939 年的 76%降到 14%，罗马尼亚 1980 年的工业产值由 1938 年的 30%升至 58.6%，南斯拉夫农业产值由 67%降至 20%以下^④。1980 年中期，南斯拉夫城市人口由战后的 30%上升到 70%，波兰城市人口达到 60%，匈牙利农业人口仅剩 20%（但城市人口约为 55%，匈有不少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只有阿尔巴尼亚仍是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仍占全部人口比重的三分之二以上。除此之外，东欧已全部实现工业化和高度城市化。1988 年，匈牙利理论界开始探讨向多党制过渡问题，并出现了许多“反对派小集团和活动”。同年，波兰两派召开圆桌会议，并于翌年 1 月申明了政治多元化、工会多元化的立场，确定在波兰实现多党制。1989 年 2 月匈牙利工人党中央发表公报，宣布将逐步实行多党制。1993—1995 年间，原东欧共产党或前工人党又上台执政，也没有改变政治多元化的格局，说明议会和平竞选方式已成为中东欧国家人民政治生活的习惯。1989 年，苏联开始差额直选国会议员。后又改行总统制，开放党禁。1990 年，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建立多党制议会共和政体。这些都发生在苏联剧变之前，此时苏联还没有发生輿情所评价的放弃共产党领导转向资本主义的剧变。断言苏东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可能是莽撞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声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被学界

① 韩俊：《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年，第 110 页。

② 韩俊：《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年，第 97 页，104 页。

③ 吕军：“论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拉美研究》，1999 年第 5 期。苏振兴：《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年，第 88 页。苏振兴，《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127 页。

④ 李仲生：“苏联东欧各国的人口经济发展”，《人口经济》，2006 年第 4 期，增刊。

政界所广泛非议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转向，现在看，许多问题需要分开剖析，这里面既有上层精英集团为阶层私利，利用特权有意向资本主义引导的问题，也有一个在高度城市化的社会转型中，公民社会自觉放弃传统体制，探寻符合后工业社会多元利益阶层政治诉求的合理形式而被动“拿来”的问题。苏东剧变其实发生了两个转型，人们被游行、街头革命的景象所吸引，看到了苏东政治经济体制向“类资本主义”的体制的激进转向，却忽视了另一场静悄悄的深层次结构转型。

另外一个非常相似的外在客观性是，凡在“2/3 临界点”启动社会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不管是社会主义体制还是资本主义体制，尽管其民主化的样态形形色色，基本都是平稳过渡到民主化的道路上，民主转型也没有发生回潮。而那些在城市化水平低于这个数值就启动了社会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不管是社会主义体制还是资本主义体制，政局和经济都陷入了动荡和反复之中。东亚和拉美的国家或地区，凡没有达到这个“临界点”就开始民主化转型的，无一不引起权威体制的回潮或旧体制的复归。苏东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像阿尔巴尼亚、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由于在城市化水平处于 30—40%左右时就跟随苏东进行民主化转型，结果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巨大挫折，致使政局动荡。继承苏联的俄罗斯，尽管几经波折，但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人民也没有走极端，1998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俄国人民日益中派化，左右两翼的影响在下降。^①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它的高度城市化的水平超过了“2/3 临界点”，社会结构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其社会结构的性质有了实质性的变动。更能反证此假设的一个例子是南非。由于长期实行种族歧视，其内部社会的断裂程度很高，各阶层之间几十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是亨廷顿所列举的第三波 30 个民主化转型国家中暴力指数最高的国家，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巴拿马和尼加拉瓜并列。南非唯一与他们不同的是，它已达到高度城市化水平。上世纪 80 年代末，南非城市人口平均占到总人口的 83.7%，^②1994 年的农业产值占全部总产值的 5% 以下，人均收入水平 1995 年为 2771 美元，与匈牙利、墨西哥相当。结果南非在社会转型中平稳过渡，波澜不惊。如果城市化社会转型的“2/3 临界点”这一规律成立的话，那么，按照西方的眼光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印度，当其城市化水平达到高度城市化社会转型的临界点时，也许还会发生一次影响政治经济体制的重大社会结构转型。

城市化水平在达到高度成熟化之前，社会一直在平静地运行。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和起伏波澜的经济转轨很容易进入人们的视线，但苏东的社会剧变不是用政治

① 金雁：《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4 年，第 219 页。

② 《南非官方年鉴》，1992 年，第 24 页。另注：南非官方没有将四个邦的黑人统计在内，如果计算全部人口的平均水平，南非在 90 年代初的平均城市化水平应该在 70% 左右。

变革或经济转轨就能解释的。实际上，这是一场由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导致的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高度城市化引发了全面的社会转型。仅仅从政治学、经济学或公共学科等角度，简单地比较精英策略、集团博弈、私有化方案等，是不能解释这一转型的机制和内容的。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化社会转型的机制：首先，农民占多数的城乡社会是一个稳定态的单一的二元社会结构，随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力度加大，群体产生了分化，长期固定于某一社会阶层、某一社会地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阶级（层），开始进入多元化的、充满竞争和流动的城市工人阶级（层）群体中，这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分层的、多元的体系。它有不同的关系结构和利益结构，其组织也不再是农村社区或宗族一类，而代之以现代社会的学校、公司、NGO等形式。它们以协商、交谈和交易等表达利益的方式来解决群体的利益诉求，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是不具备民主政治的调节机制的。其次，农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也迥异于城市社区。谨慎、保守、因循更符合农村社区的文化观念，而在城市化过程中价值观将出现裂变。第三，由于农民在社会结构比例中的减少，市民比例增大，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转变，文化和教育程度也呈明显的提高，公民社会的雏形开始出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进一步导致政治运作逻辑的变化，“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政治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因此，妥协和克制都得到提倡”。^①城市化未完成，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更遑论政治经济的体制变革。即使如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二战后也是由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直到90年代，日本达到高度城市化之后，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大众民主社会才逐渐形成，开启了政治参与和民主的多元化，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高度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在内容方面也要比单纯的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复杂和丰富得多，比如全民选举、经济多元化、市场化、全民私有化等，有许多是属于高度城市化转型的产物。事实上，苏东高度城市化转型早在1985年就开始了。差额选举、全民选举也不是搞资本主义，其解体后的政治架构既不是转向威权体制，也没有完全转向西方的代议制。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中，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而设计的民主之路。苏东在传统体制后期，一开始是引进市场化，辅之以计划管理。全民私有化的规模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多采用国家或劳动集体控股的股份制、租赁、集体承包、合作制等形式，私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确在上升，但对私有化的范围还是进行了限定，涉及国防安全、国计民生等国民经济的战略要害部门，并没有实行私有化。这类国有企业约占国有总资产的30%左右，有的国家如匈

^①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页。

牙利占 37%。俄罗斯金融寡头的形成与同国外产业进行竞争的背景有关，乃国家引导所致，与是否实行资本主义联系并不密切。另外，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还包含着非国营化，或称作民营化的内容。同时，私有化又区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其实现的方式也不同，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大私有化，不少国家采用国家或集体控股的股份制形式。在俄罗斯，转轨后仍有 70%左右的原国有企业，要么依然是国有企业，要么是国家或劳动集体控股的股份公司。保加利亚的私有化进展缓慢。罗马尼亚政府对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十分慎重。捷克和斯洛伐克私人农场的产量仅占农业总产量的 5%。白俄罗斯国有资产小私有化阶段直到 1994 年才开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制度一直比较完好地保存着。乌克兰处于小私有化阶段，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并未解散。另外，中亚五国也没有搞全面私有化，土地一直属于国家所有。

三、社会流动机制与中间阶层的社会构成

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实际蕴含着三重社会流动机制，一是从农民到城市工人的职业流动，二是社会地位上的分层流动，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则是代际流动。农民的向上流动为第二代提高社会地位、登上更高的社会阶层奠定了基石。当急速变革的社会关系结构趋于稳定之后，代内流动渐渐让位于代际流动，并成为影响苏东社会分层的主要形式。城市移民第二代的社会流动一下子跨越了几个边缘阶层，属于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垂直流动和长距离流动。这种结构性流动的空间迁移形式导致社会分层模式和流动机制的新变化，其内涵和意义要比单纯的职业变动或身份变动更加深刻。西方学界也曾注意过这个现象，比如吉登斯、戈德索普等人就认为，社会主义由于取消了私有制和采取了更为平等的社会政策，产生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向上流动性，以及较大规模的阶级阶层间的流动，体力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跨越“缓冲带”进入管理—专业阶层。^①亨廷顿的新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其中心思想就是外来移民的后代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国家特性。^②西方社会学界用以分析社会分层模式的纵向流动框架，并不能全面地把握苏东体制背景下结构性流动的分层机制，应该将城乡流动下代际更替对结构化分层的作用考虑进来。正是这个指标对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和路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苏东社会转型中复杂而独特的路径选择与此有密切关系。其复杂关系机制可以通过

① 李路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理论与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2 年第 2 期。

②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年。

分析苏东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及其功能体现出来。在苏东寻找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去衡量，即“按照收入、职业声望和财富等标准来划分中间阶层的话，这样的定义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收入、声望的享有状况不过是阶层地位的结果，对中间阶层的界定只能将其置于现代社会的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①因此笔者认为，在产业调整与技术升级和向消费社会转化这个意义上来界定苏东的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可能更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苏东社会中间阶层或中间阶级的概念，来看苏联社会的基本阶级构成状况：

表 3 苏联居民的阶级构成（百分比）

	1928	1939	1959	1970	1975	1979	1980
工人和职员	17.6	50.2	68.3	79.5	82.9	85.1	87.9
工人	12.4	32.5	48.2	56.8	60.9	60.0	61.7
职员	5.2	17.7	20.1	22.7	22.0	25.1	26.2
集体农民	2.9	47.2	31.4	20.5	17.1	14.9	12.1
个体手工业	74.9	2.6	0.3	0.0	0.0	0.0	0.0

注：1928年尚有4.6%的地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以下著作综合整理：1、贾春增：《当代苏联社会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年，第178页；2、辽宁社科院社会学所：《阶级、阶层及社会流动》，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年，第155页。

从政治态度、价值观以及消费能力来讲，苏联的中间阶层主要集中于职员这个职业群体。从上表可以看出，苏联的阶级结构中，城市的职员阶层比例在70年代增长幅度加快。70年代中期之前，工人基本上保持着1939年到1959年的平均增长幅度，大约每10年递增8%左右，而从7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增长几乎停滞。但职员的增长速度后20年几乎是前20年的2倍，从2%增长到4%左右。1975年，在全部11,750万人口中，工人和职员占到10,200多万，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集体农庄农民仅有1,500余万。^②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的劳动力开始了世代间的更替。1956年，全苏工业专家的57.2%、厂长的68.4%、以及总工程师和技术厂长的32.9%是从实践中提拔的。^③这批人大多数是从农村移居城市的第一代移民，通过苏联的工业培训体制进入到管理阶层。这一比重60年代后显著下降，到70年代末基本仅剩残余现象了。在80年代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中，大多是在城市中生活和成长起来的移民的第二代，这是个多阶层的混合体，以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办公室人员为主。它是苏联的白领阶层，几十年快速的发展，使得这个阶层在作用和功能上对

① 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级的定位”，《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② 贾春增：《当代苏联社会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年，第179页。

③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55.

苏联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这正是苏东社会转型中具有重要特点的一面。

首先，苏联中间阶层的主要来源是移民的第二代。这个骤然兴起、快速发展、群体性格高度不定型的一代，最后竟然空手埋葬了苏联。其产生和发展轨迹与拉美、东亚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明显不同，他们是实现了短时期内跨阶层向上流动的一个结构性群体，社会学称之为突发性长距离社会流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还是要到苏联的体制结构中去寻找答案。我们惯常运用的西方社会分层方法和社会流动机制分析框架，背后隐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即上一代人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财富以及身份，大部分是可以流传给下一代的，这是一种分层格局基本保持不变情况下的代际流动。苏东的党国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前苏联一切有价值的财产以及能代表身份和地位的符号都属于国家，上层精英不能把这种好处传给后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阶层生成机制。吉登斯曾专门论述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代际流动的不同特点，“二者在地位优势的代际传递方面有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因财产私有而带来的权力和许多优越性是可以传递给下一代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却行不通，即使有些领导享有集体财产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但这种优势是不能传递给下一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地位只能通过教育优势的继承来运作实现”。^①苏联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平等化措施，阻断了高等教育与白领出身之间的联系，采取了有利于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政策，使他们有结构性的机会进入中间阶层和精英阶层。这一系列措施改变了苏联社会的流动机制和中间阶层的产生方式。农村移民的第二代成为拥有特别“赋权”的、能够在集权体制下进行长距离结构性流动的庞大群体。从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看，这个群体是苏联真正的中间阶层。有学者把苏东的中间阶层定位在了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专业技术阶层身上。认为他们在苏联时期生活安逸，社会地位很高，拥有特权。^②这与事实并不相符。整个勃列日涅夫期间，苏联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其它阶层相比，在收入上都是不断降低的。这些人包括教师、医务人员、一般工程人员、大多数的设计师和工艺师。^③其政治地位也不如工人和农民，“每接受三个工人入党，才能接受一个工程师入党”。^④苏联著名学者罗伊·麦德韦杰夫评价道：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 Hutchinson, 1973, pp.241-242.

② 庄晓蕙、侯均生：“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社会》，2008年第7期。

③ 麦德韦杰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林英译，北京：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年，第277页。

④ 利加乔夫：“苏联：必然倾覆的大厦”，钱乃成编译，《当代世界》，2001年第8期。

“对知识分子和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说，70年代不啻为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①知识分子—技术阶层在苏联后期备受经济和精神两方面的压抑，这也是苏联末期失去知识界支持的一个重要背景。1988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公开性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成为一股社会潮流，苏联社会首先起而倡乱的就是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似乎出现了一个怪圈，政府在地位和收入上压制中间阶层的主体——知识分子，但又制订有利于工人阶级子女的高等教育政策，使得更多的工人子女进入了知识分子阶层（这恰恰反映出苏联的旧体制与新兴的多元利益群体矛盾的一面）。在70年代的两次人口普查中，工人出身进入大学的“系数”由0.71升高到0.74，职员和专家家庭出身的从2.19下降到2.10，农民家庭出身的则从0.36上升到0.46。而在苏联高度城市化和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数。^②另有一则数据，工人子女成为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人数在70年代末是五、六十年代的1.5倍，而知识分子子女成为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人数没有什么变化。^③在大学生中，出身于体力劳动者家庭的比例在一般农林院校中几乎占了75%^④。在匈牙利，1962—1964年，首都以外的各城市的领导人员中，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的领导者占到64%。^⑤据1978年的调查，45%的专业技术工人不是出身于专业技术工人家庭，而是来自农业家庭，这使得专业技术工人的比例逐渐上升，由1949年的30.4%，上升为1960年的32.8%，1980年达到42.6%。在波兰，据1968年的调查材料，技术性专家的44.7%来自工人，34.1%来自农民，非技术性专家总数的38.5%由工人出身的人组成，28.8%出身于农民，职员中的42.5%是工人出身，21.7%是农民出身。^⑥

表4 苏联大一学生的社会成分（百分比）

	1970—71	1971—72	1972—73	1973—74	1975—76	1979—80
工人	37.7	39.8	42.4	44.4	45.5	47.3
农民	9.0	9.9	8.8	6.5	7.5	6.5
职员	53.3	50.3	48.8	49.1	47.1	46.2

资料来源：Л. Я. 鲁比：《苏联大学生》，莫斯科，1981年，第56页。

① 麦德韦杰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林英译，北京：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年，第279页。

②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所：《苏联社会学》，1989年，第413-414页。

③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所：《苏联社会学》，1989年，第499-500页。

④ 苏联社科院社会学所编：《苏联社会的现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趋势》，杨振福译，转引自辽宁社科院社会学所：《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⑤ 贾春增：《南斯拉夫和东欧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

⑥ 贾春增：《南斯拉夫和东欧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1页。

苏联的移民家庭在社会阶层的归属上与东南亚移民中的多阶层家庭（multi-classes family）非常相似，东欧移民家庭则更类似于韩国的农民—工人家庭，其大家庭通常包含多个阶层。祖辈是农民，父母是移居到城市的蓝领工人或一般服务业人员，子女则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完成了身分的转换，他们大多成为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苏联知识分子从 1939 年的 16.7% 上升到 1979 年的 29.5%。增长接近一倍，主要不是靠自我的“再生产”，而是从工人的阶层流动中来充实的。70 年代初期，苏联知识分子人数就超过了农民人数，仅次于工人占第二位。1981—1985 年，苏联工人增加了 290 万，其中产业工人 80 万，而教育和专业工作者增加了 500 万。1981—1985 年与 1976—1980 年相比，工人人数年增长率降低了 50%。^①苏联的职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移民第二代更多地进入到白领职业阶层，这个骤然出现的城市新一代移民，已经不是五六十年代从农村刚刚进城的农民，他们出生于城市，成长于城市，在城市中接受比他们父母高得多教育，他们的社会追求和阶层性格与其父辈悬若天壤。“对于 1950 年前生活于饥寒交迫中的人们来说，给每个家庭的住所配上厨房、卫生间、客厅、食品柜、冰箱、电视机，无疑是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现在他们（指第二代）需要更多的消费品，产品质量也变得愈益重要。50 年代对那些刚脱下农装，从未受过教育的人们来说，苏联的集权体制，一个人说了算还能过得去。到了 70 年代，苏联人民的大多数成了教育良好、生活水平中等的城市居民，那种集权的体制，与苏联人民的现实要求相去甚远，他们现在要求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②这些新的变化反映着时代脉搏的跳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简直就是一场城市改革。其崛起和主张与其说违背了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背景的斯大林体制和正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如说代表了新兴的以城市社会为基础的管理、知识、技术阶层的利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支持力量来自城市，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和鼓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其次，我们来看苏东中间阶层的社會功能及政治取向。关于中产阶级的性格及政治态度，已有国内外学者作了相当丰富的发掘和实证研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的阶级性格和政治态度作了经典性的分析和描述：“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社会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③在《第三波》中，亨廷顿又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产阶级有无革命性，还要看农村的农民是否激进。在一个农民比较激进的国家，中产阶级

① 辽宁社科院社会学所：《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 年，第 158 页。

② 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曹荣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64 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 年，第 264 页。

往往保守。当民主对中产阶级不构成潜在威胁时，这个集团就开始自信它们有能力通过选举来促进它们的利益。在第三波的民主运动中，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① 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认为：在一个发展和动荡的社会中，统治者如果限制了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从较低的阶层向上晋升，伴随城市经济扩张而出现的迅速向上流动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② 李友梅教授通过对社会中间层社会功能和作用的分析，从具体实例上阐释了如何根据具体国家特定历史阶段和文化环境下中产阶级的价值趋向和社会情绪，准确地评估其社会功能与政治倾向。^③ 苏联的中间阶层在作用与功能上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作为社会的白领阶层，他们与任何城市社会生长起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青年一样，在消费能力、生活时尚和政治诉求上具有相类似的方面。同时，我们也必须联系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苏联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中间阶层的社会情绪和心态，才能对其阶级性格和政治态度作出综合判断。

苏联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苏联的集权体制和党国体制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在社会主义执政理念指导下，为苏联经济带来了长达近 70 年的长足发展和进步。苏联极高的就业率和教育水平，不仅提高了其劳动生产率，而且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就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规模转移。1928—1975 年，苏联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 4.5%，美国同期为 3.1%。1950—1975 年，苏联人均消费年增长为 3.8%，增长了 2.5 倍，同期美国人均消费年增长为 2.0%，增长了 1.6 倍。^④ 80 年代，苏联拥有医生数为每千人 42 名，床位 130 个。美国每千人拥有医生 23.3 名，床位 56.5 个，日本则分别为 18.6 名和 118 个。^⑤ 社会福利和补贴 1985 年比 1960 年增加了 3 倍多，比 1970 年增加 1 倍多，均高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社会消费基金由 1965 年的 419 卢布增长到 1985 年的 1470 卢布，同一时期消费品价格增长了 7.8%，而居民工资收入增长了 1 倍，远高于物价的增长幅度。^⑥ 苏联社会包括中间阶层在内的各阶层消费增长快于其收入增长。80 年代文化事业的各项发展也位居世界前列，1987 年，苏联人均拥有的影剧院座位数和前往剧院的次数都名列世界第一。^⑦ 在匈牙利，城市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1977 年与 1966 年相

①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75-77 页。

② 转引自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57 页。

③ 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

④ [美]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8—53 页。

⑤ 李炜：“1985 年以前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当代思潮》，1997 年第 6 期。

⑥ 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68 页。

⑦ 李炜：“1985 年以前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当代思潮》，1997 年第 6 期。

比，小汽车增长了 21.9 倍，电视机增长 23 倍，电冰箱增长 77.5 倍，被称之为消费者的天堂。^①由于农民也实行了有保障的日工资和年终奖金，并享受免费医疗和退休福利，工资比工人还高，使得消费比工人增加得还快。保加利亚 1985 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为，电视机 93 台，电冰箱 94 台，洗衣机 89 台，小汽车 37 辆，电话 42 座。^②到 1989 年，苏联人均 GNP 已达 5058 美元。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这些东欧国家在 1987 年人均国民收入就已达到 5000 美元，而波兰、罗马尼亚仅稍低于他们，这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转型的经济基础。苏东城市中间阶层优良的教育和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对消费质量和档次的需求，对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的苏联，全国有各行各业的企业数万家，生产 2000 多万种产品，企业间复杂的供应关系数以 10 亿计，高度工业化生产的经济形式与早期以农民为主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经济形式不可相提并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社会流动速度加快，新的利益阶层和社会组织生长起来了。城市市民社会天生的独立性的一面开始显露，自由结社、言论自由、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平等思想、竞争观念、以人为本等现代观念和价值体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意识、公民意识和公德意识的城市年轻群体，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广泛分布于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机构中。在老一套僵化体制的阻碍下，他们几乎是本能地出现了“反体制”的冲动。公民社会天然地与市场经济相联系，有着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苏共二十七次提出“民主化”、“公开性”之后，各种主张、派别和利益团体、非正式组织纷纷亮相，竞选人民代表，竞争政治资源。短时期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几年时间里，这类组织发展到十万多个，政治多元化已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

苏联社会城市化转型和民主化转轨的独特路径，与移民第二代有着纠缠不休的关系。亨廷顿曾对二代移民的政治态度作过论述。他指出，第一代的移民将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这些传统的农村观念带入城市居住区，他们的孩子却是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和企望。如果这种机会不能很快到来的话，第二代的激进主义将显著地增强。美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在适应当地环境中产生的紧张和不满最为明显……第二代人是不稳定的因素，随着他们越

① 甘棠寿主编：《苏联南斯拉夫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81 页。

② 甘棠寿主编：《苏联南斯拉夫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70 页。

来越人多势众，他们就到处捣乱子，这正是因为他们社会上缺乏固定的地位。^①苏联社会学家戈罗东和科马罗夫斯基曾专门对代际职业结构与现代经济制度之间的适应关系进行过实证研究。他们计算出，每一代人当中社会职业的向上流动约为25%，当代际之间的向上流动比率超过一定水平，在世代之间造成紧张关系时，年轻人常发展出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并常常排斥父辈的方法和教诲。若无视经济机制与代际冲突之间的适应，将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动乱。如果不改革传统社会经济制度以适应现代社会专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将会造成广泛的社会危机。^②苏联70年的工业化历史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祖孙三代人代际历程的生命史。第一代人打下了江山，开启了工业化；第二代人从农村移居到城市，成为大规模工业化的熟练劳动力；第三代人，也就是移民第二代，出生于战后的50年代，伴随着60年代工业技术革命的浪潮，在七、八十年代纷纷进入到服务、技术、信息、管理等职业岗位，成为苏联社会的中间阶层。这个经历，虽然简单，也是顺理成章，但却有别于任何国家的中间阶层。他们面临的历史环境、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这个阶层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其祖、父辈，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中间阶层，与欧美的入境移民，与东亚、拉美的农村移民，都不一样。找到移民二代的成长经历和政治倾向、政治态度的成长线索，可以说，就找到了苏联社会转型的独特路径的一把钥匙。苏联移民二代的特点主要有：

人数多，社会适应和融入等指数非常高。苏联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基础有了根本的转变。往日的农村很快变成了城市，农民的孩子可以首选非农业的工作，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工人农民的子女受到良好教育并迅速成长为城市新一代中间阶层。与拉美国家的移民二代相比，他们不用住贫民窟；与欧美大多数来自境外的移民二代相比，他们不用去艰难地适应当地社区文化，能很快融入主流社会；与东南亚的移民二代相比，他们拥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他们甚至也没有“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的隐忧。在60年代全球农民向城市迁移的大潮中，苏联东欧的移民二代大概是“幸福指数”、“居住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等最高的一个人群。

其勃兴而起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收入水平在七、八十年代却濒临下降。在整个六、七十年代，苏联工人和农民涨工资，而知识分子却不涨。更主要的是他们不具备相应的政治地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处于受压抑状态。苏联历史上第一

①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57-258页。

②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43-45.

个反对现有体制的社会集团就是苏联的中间阶层中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际遇对其政治立场有明显的影响，其政治态度也以政治冷漠和支持“持不同政见者”两种极端方式表现出来，即所谓的“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和行为。^①俄罗斯历史学家A. C. 巴尔辛科夫断言，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知识分子做了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准备，这里，对社会地位的明显的降低和不满意，是其客观的基础”。^②在政治态度上，它反对苏联现行体制，要求开放上层空间。中间阶层与苏联的社会结构存在着“结构性紧张”。东欧剧变后，一种不能落后于东欧变革的社会情绪遂趋向于全面激进。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并没有为激进的社会变革做好应有的准备，破坏有余，乏于建设。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成为权贵阶层毁掉苏联的一个急先锋。

其政治观念与上一代差异很大，对祖、父辈奉行的传统价值观并不认同。人们在苏联垮台问题上，总是喜欢把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的个人操守，或者普京的个人能耐等给予过分注意，却忽略了一些细微的社会变动。1987年1月至秋天，在苏联的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出现了争论俱乐部、独立活动小组等非正式组织，主要活动其实就是批判、评论、抗议，或印刷自己的言论，成立“独立社会图书馆”等，这些人中就有后来成为俄罗斯总理、副总理的盖达尔、丘拜斯等知识青年。1989年5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完成后，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索洛维约夫按照习惯开始召集人民代表，向他们交待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案。代表们不客气地打断第一书记的话：“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案应该由我们这些人民代表来制定”。随后，代表们自行召开了会议。这些苏联社会深处的变化，其息细微，但声如闷雷，恰是苏联体制解体的先声。与其将其看作是什么“民主派”、“激进派”的政治派别之争，还不如将此看成是新一代青年在变化了的时代，对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作出的与其父辈相异的选择。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是一种城乡之间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倾向的差异呢？1990年的代表选举，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地域差别，在人们希望变化的城市里，代表城市利益的派别（权称之为“民主派”）获得了胜利，列宁格勒议会的400个席位，城市民主派获得了240个，莫斯科议会的500个席位，他们获得了280个，而在民众不愿意变化的农村，传统的共产党人（权称之为“主流派”）则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至于后来走向资本主义，却是另有隐衷。^③

最后，移民二代中成长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人，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圣徒精神和贵族气质，坚持思想独立性，对社会持激烈变革的观点。一百多年来，在

① 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② 黄立菲：《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48页。

③ 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曹荣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俄国大地上，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专制独裁和政治压迫，有一种吁求公正、改造社会、无怨无悔的宗教情结。另外，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里的矛盾性，使知识分子易走极端，推倒重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知识界带来了刺激，激发了苏联民众的变革热情。这是苏联后期变革走向激进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四、余 论

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在规模和深度上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社会转型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至于会以一种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进行，则仍然受制于转型前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制约。社会结构一直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力量，在制约和规定着社会制度变革的趋势和方向。苏东社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现了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一次是由于高度城市化而引起的城乡社会结构转型，一次是市场化转轨引起的结构化社会分层。很多人包括亨廷顿也把高度城市化导致的社会转型与民主化进程带来的制度转型混淆在了一起。他用民主化的回潮来解释这一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说在东亚、拉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没有看清楚这一点的话，那么苏东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不同。苏东由于实行了较之东亚、拉美权力结构更加集中的体制，整个社会处于高度统一状态，把这个变革过程压缩在了一起，拖延至高度城市化后期。当传统体制与高度工业化的城市社会之间产生高度紧张的时候，社会转型与体制变革几乎同时发生，看起来似乎是一次转型的样子。

苏联亡于移民二代。这是笔者从社会学的阶级阶层视野对苏联高度城市化转型后果进行研究的另一个结论。作为社会学的关注点，不能不注意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变革时期，社会急剧转型对几代人之间的代际更替造成的思想和观念、以及生活和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如能未雨绸缪，或许能减少人类社会动荡时期的苦痛，增添人类处理社会变革的技巧。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and process of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through an empirical study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from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e stratification. First,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aused by a high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which is an aspect of relevance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m and East Asia, Latin Ame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And the

complex flow system and structural stratification caused by migration flow into citie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ocial transi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The middle class, especially its values, social function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has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radic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this impac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Secondly,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ransi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can be clearly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first stage is deep-level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namely, the changes of class stratification from peasants to urban workers; second stage is the surface-level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namely, class stratification because of diverse intere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rketisation.

【Key Words】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Transi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Mobility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оци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оциальное насло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ая мобильность

(责任编辑 李敏焘)

俄白联盟：进程、问题与前景 ——白俄罗斯的视角

娜丝佳*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俄白联盟建设的动因与过程，介绍了西方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对俄白联盟及其前景的评估，重点分析了俄白联盟进程中的问题与难点。本文认为俄白联盟的建立首先是出于地缘战略利益的考量，两国一体化任重道远。但无论出现何种政治变化，俄白都将致力于推动两国合作。

【关键词】俄白联盟 精英 进程 问题

【中图分类号】D815.9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083-(8)

导 言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行为体日益倾向于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的密切合作，而且还希望形成形形色色的联盟、协会和组织等，以免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中被孤立。放眼世界，冷战期间组建的各类国际或区域组织，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不仅没有遭到削弱，反而重新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新的区域一体化安排在后冷战时期也不断涌现。欧洲国家走了长达50年的路，才形成了今日被普遍视为一体化典范的欧盟。

后苏联空间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即出现了多个一体化组织，彼此有不同成员组合，出现了不同速度的一体化现象，其中俄白联盟尤为引人关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建立联盟国家的计划由来已久。笔者认为，几种复杂、混合的因素共同作用于

* 娜丝佳(Bayok Anastasiya)，白俄罗斯公派留学生，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联盟建设进程，使其几番沉寂，几番兴起。

本文拟利用俄白两国及西方学术界、决策界的公开成果，分析建立俄白联盟的过程，其中的问题及两国领导人的解决途径。

—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一体化进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1996年4月2日，两国正式签署了《成立主权国家共同体条约》，成立俄白共同体。条约规定它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的联合，同时俄白均是主权国家，将保留各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1997年4月2日，在俄白共同体成立一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兄弟情谊、友好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关系，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决定将俄白共同体升格为联盟。1998年12月25日，叶利钦总统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又签署了关于建立联盟国家的宣言，加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密切合作。两国总统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一宣言是“两个兄弟国家在统一道路上迈出的历史性一步”。1999年12月8日起，双方又签署了关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建立联盟国家的条约和实施该条约的行动纲领。条约规定，联盟国家将保留两国的国家主权，成立由两国总统轮流担任主席的、超国家的最高委员会，以及执行委员会和联盟议会等机构；在联盟国家建立过程中，俄白两国将在金融货币、经济贸易、海关税收、安全与防务等领域逐步实现一体化。

但自1996年至今，国际社会和俄白两国国内对俄白一体化尤其是俄白联盟的评价一直不高，对联盟前景的预测并不乐观。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媒体上，联盟国家建设进程屡遇不顺甚至停滞或倒退的消息不绝于耳。

例如，《纽约时报》在1999年就质疑过即将建立的俄白联盟及其发展前景。时任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副主任的俄罗斯学者特列宁（Dmitri Trenin）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有联盟条约，可以有一个统一的部长理事会等。但这些仍只是礼节性机构，没有任何实际权力”^①。

签订联盟国家条约后，戈布尔（Paul Goble）在评论时指出，联盟协议本身首先有损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政治改革进程，“一个于12月8日新签署的联盟条约，威胁着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民主”。鉴于俄领导人对白俄罗斯政权的一贯支持与纵容，西方对白俄罗斯当局的不满绝非事出偶然；其次，新联盟条约的签署破坏了后苏联地区的稳定，有可能使整个地区局势更为紧张。第三，它也会使俄与西方的

^① Michael Wines, “Russia and Belarus Agree To Join in a Confede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1999.

关系进一步下降。“由于莫斯科在车臣的战争，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苏联解体之后达到了恶化的最高点”。戈布尔的结论是：“这一最新的卢卡申科—叶利钦协议，即使它永远不能完全执行，也会成为整个国际关系史的一个转折点。这可能是两个签署人的希望，但肯定是许多人，其中包括大量的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恐惧的一件事”。^①

研究表明，自联盟条约签署以来，各方对俄白联盟的消极评价几未变化。西方学者对俄白联盟的前景始终持悲观判断。2002年，由于俄白围绕货币联盟问题爆发争论，有关这一一体化组织将寿终正寝的传闻一时间不脛而走。2006年年底，俄白联盟的前景因天然气危机更不明朗。2007年1月初，俄白围绕天然气石油供应问题再度激烈冲突，一位研究人员断言，“联盟国家注定是一个神话”^②。甚至有西方专家指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建设联盟国家可能会导致俄罗斯自身的解体。^③

其实，西方专家学者，尤以欧洲专家，包括新加入欧盟的前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为甚，不仅不看好俄白联盟的情景，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更多是畏惧可能出现的联盟国家，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与欧盟的边界，主要是白俄罗斯和波兰边界的变动。因此，白俄罗斯的这些邻国公开表示了他们的担心，即如果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建立联盟的话，这会影响到前苏东地区的安全。但与此同时，一些独联体国家却表示了他们加入该联盟的渴望。^④

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是，从1999年两国领导人决定建立俄白联盟时起，这样的计划就被美国和西方视为一种试图抗衡西方和北约影响的结构性安排。

联盟建设伊始，俄罗斯正把谋求恢复“大国地位”作为本国外交的基本路线和总目标。普里马科夫明确表示，俄呼吁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反对建立在经济和军事上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当时，俄白两国领导人将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的愿望视为打压两国的“冷战思维”，坚信美国和北约对前苏联地区安全构成巨大威胁。^⑤

不过，与西方学术界和决策界不同，很多俄罗斯官员和专家否认对抗北约东扩是叶利钦同意建立俄白联盟的原因，强调即使外部因素根本不存在，俄白两国仍会走上建设联盟国家的道路，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国相互依存的经济利益诉求以及白俄

① *The Ukrainian Weekly*, December 19, 1999, No.51, Vol. LXVII.

② Peter Finn, “Russia Halts Oil Flow To Belarus in Dispute: Quarrel Reignites Worries in Europe Over Reliability of Key Energy Supplier”,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Tuesday*, January 9, 2007, p. A12.

③ Michael Wines, “Russia and Belarus Agree To Join in a Confede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1999.

④ Wikipedia.

⑤ Clelia Rontoyanni, “A Russo-Belarusian ‘Union state’: a defensive response to Western enlargement?” *One Europe or Several? Working Papers from One-Europe Programme*, No 10.

罗斯人的认同。

发人深省的是，1999年联盟条约签署后，卢卡申科和叶利钦宣布联盟建设的主要措施包括组建一个“从莫斯科到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和波兰边界”的联合军区。一贯以美国和北约坚定批评者身份出现的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高调宣布，新军区的目标将是抵御来自西方的入侵。他甚至建议俄罗斯未来在白俄罗斯境内重新部署核武器。但叶利钦表示，“这一联合将保持两个民族的独立，也并不针对任何人（甚至克林顿）”^①。尽管如此，外交辞令难以掩盖如下事实，即俄罗斯迄今在白俄罗斯的利益仍然以军事利益为一项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利益。

部分俄罗斯专家与西方同行观点相近，认为俄很担心北约东扩，这意味着俄的安全将直面北约的威胁，所以俄希望跟白俄罗斯建立联盟。^②在他们看来，从1996年开始，推动俄白两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白俄罗斯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两国传统上密切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合作，还有所谓的斯拉夫团结和兄弟般的感情等。而更主要的是，尚未彻底走出“休克疗法”阴影的俄罗斯当时空有庞大的帝国躯干，但实力孱弱，正千方百计地谋求东山再起。根深蒂固的大国追求推动俄罗斯彻底放弃了全面融入西方的浪漫主义幻想，致力于跟白俄罗斯组建联盟国家，以增强自身实力，加大与西方打交道的资本与手段。

一些专家，尤其是西方学者因此把该联盟视为“俄罗斯帝国的复活”，尤其是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这种感觉日益强烈。斯特林（Lord Stirling）认为：“普京寻求在国际上恢复俄罗斯合适的地位。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让前俄罗斯帝国和前苏联的国家同意完全回归俄罗斯的帐篷”^③。

就普通民众而言，无论俄罗斯人，还是白俄罗斯人，都很希望两国保持密切关系，他们觉得联盟国家建设进展太慢，以致于经常怀疑俄白联盟建成的可能。普京建议按照欧盟模式建设俄白联盟，卢卡申科则明确表示，联邦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主权。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他特别强调说，白俄罗斯“绝不会成为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愿意同所有国家合作”^④。白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独立学院（NISEPI）2005年9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调查结果显示，50.6%的白俄罗斯人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应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之间有密切政治和经济关联的联

① Michael Wines, “Russia and Belarus Agree To Join in a Confede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1999.

② Marianna Gurtovnik, “A Russia-Belarus Union on the Horizon?” *World Politics Review Exclusive*, 19 Dec 2007.

③ Lord Stirling, “Union of Russia and Belarus Soon”, <http://europebusiness.blogspot.com/14.12.2007>.

④ www.president.gov.by/en/press13376.print.html.

盟。^①根据全俄舆情中心提供的资料，2007年与2005年相比，俄罗斯人对该联盟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有更多的俄罗斯人希望这两个国家只保持密切关系而非建立联盟。2005年认为应建立联盟的受访者占39%，2007年则降至25%；主张两国应保持平等地位的比例没有改变，仍为29%；认为应把白俄罗斯并入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比例明显下降，从39%降至23%。^②另外，也有一些俄罗斯政治家一直以来不支持该联盟，如倾向市场自由改革者阿纳托利·丘拜斯和鲍利斯·涅姆佐夫。同时，俄国家杜马（议院下院）的右翼自由派政党亚博卢集团全部反对该条约，认为它只会损伤俄罗斯正在进行的改革。^③但这个联盟也有自己的支持者，比如俄罗斯共产党就把它的建立视为局部复活苏联的过程。部分俄罗斯经济学家和很多企业家反对该联盟的建立，其根据是白俄罗斯经济远远落后于俄罗斯经济，且白俄罗斯政府未进行市场经济改革。

二

目前，俄白两国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合作进展颇顺利，但经济一体化饱受挫折。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经济和苏联时期一样高度依赖重工业和出口，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因此，俄白一体化“带来了经济救济（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有利于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可让卢卡申科无痛苦地开展不受欢迎的经济改革并维护自己的威信，“但它同时带来俄罗斯增加控制白俄罗斯的危险”。因此，卢卡申科的选择是“保留俄罗斯的支持，同时限制其影响力”^④。对俄而言，加快俄白联盟建设，除了战略利益外也不无经济利益的考量。白俄罗斯是俄罗斯向西欧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中转国。俄向欧盟国家（主要是波兰、德国和立陶宛）出口天然气，大约有20%要过境白俄罗斯。此外，俄企业界还期待参与白俄罗斯经济的私有化并从中谋取红利。

其实，目前俄白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到处可见两国关系不稳定的迹象，但另一方面，发生的某些冲突或者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不说明俄白关系正在恶化。比如，有时俄罗斯媒体会尖锐批评白俄罗斯，但不久俄罗斯领导人会说出一个

① “How is our integration going?”, <http://www.iiseeps.org/press6.html>.

② <http://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3970.html>.

③ Ariel Cohen & Yevgeny Volk, “Russia’s Union With Belarus: Expensive and Troubling”, *Executive Memorandum*, No.476.

④ David Marples, “Russia-Belaru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II”,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ume: 2 Issue: 138. July 18, 2005.

与之截然相反的看法。另一个例子是，一次在论及俄白关系时，普京称“必须辨别肉丸和苍蝇”，这让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十分生气。但随后普京向白俄罗斯提供了贷款，“似乎把这种贷款作为一种对白俄罗斯表示抱歉的方式”。^①种种迹象表明，俄可能从白俄罗斯现有体制中获益良多，俄白联盟的建立最初更有利于白俄罗斯，而现在则更有利于俄罗斯，这也是俄在多方面迁就白俄罗斯的原因所在。

当然，俄白联盟建设进程，正如国际学术界所指出的，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问题层出不穷，如宪法制定、联盟模式、权力分配、总统职位、货币联盟等。但不可否认，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俄白联盟的建设进程却在一路蹒跚中艰难前进。下文笔者将具体分析联盟国家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第一，宪法制订。2001年俄白两国即着手制订联盟宪法，并于2003年和2005年相继推出可供选择的草案，但没有被正式通过。俄白联盟秘书长博罗金（Pavel Borodin）2007年底宣布，2008年3月份将进行俄白联盟宪法的全民公决^②，但迄未进行。白俄罗斯政治家斯米尔斯基（Valentin Simirskii）最近指出：“俄罗斯新总统的选举应会给俄白联盟建设带来许多好处。很多人希望俄罗斯新任总统推动这一进程”。^③

关于联盟宪法，俄白两国政治家至今仍在争执不休的最重要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联盟的模式，即联邦、邦联或欧盟模式的联盟。上文笔者已提到支持和反对不同模式的代表及其原因。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最难解决，因为在直接关系到各自核心利益，双方观点相左且彼此都不愿让步，也很难做出让步。

二是总统职位。很多政治家和学者提到过并讨论过普京和卢卡申科可能的联盟总统职位，但后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俄方希望设立联盟总统职位，但白俄罗斯反对，因而在目前版本的宪法草案中没有规定总统职位。这跟俄白两国领导人的作用与影响力有关。叶利钦时期俄白同为难兄难弟，卢卡申科可能还对出任俄白联盟总统抱有幻想，但是强势的普京在两国的影响力全然不是卢卡申科所能比拟的，在此情况下白俄罗斯反对设立联盟总统职位也就合情合理了。梅德韦杰夫就职后，联盟的建设是否会快一点，现在还不得而知。而总统职位没有设立，也使得“联盟国家”的含义和此前使用的“共同体”和“联盟”的区别显得含糊不清。

三是联盟的建立是否会快一点。宪法草案尚未解决联盟政府机关和国家政府机

① Robert Cottrell, “Alexander the great embarrassment”, *The Financial Times* (UK), 20 June 2002.

② Союз. Беларусь-Росси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36 от 22 ноября 2007 г.

③ <http://www.soyuz.by/ru/?guid=36961>.

构权力分配的问题。这仍需要多方协商。

第二，货币联盟问题。目前最主要的障碍是白俄罗斯不愿采用俄罗斯卢布作为货币单位。卢卡申科甚至不太愿意提到跟货币联盟有关的事情。他认为采用俄罗斯卢布即意味着白俄罗斯成了俄罗斯的一部分，白俄罗斯人民不会接受。因此，卢卡申科坚决捍卫白俄罗斯央行独立发行货币的权利，并将之视为国家主权不可让渡的一部分。

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是：成立两国货币联盟理论上利弊兼具。一方面，两国经济结构迥异，国际能源价格的骤然波动对双方的影响非常不同。汇率挂钩显然可能给白俄罗斯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合理，会给白俄罗斯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许多利益。为了让货币联盟成功，白俄罗斯将不得不进行一套非常有力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强调，加入货币联盟并不意味着白俄罗斯和国际货币基金关系的结束，而是有着明显的潜在优势：首先，这意味着白有机会“引进”俄的宏观经济政策。其次，只要投资者不怀疑有公信力的货币联盟，白俄罗斯就有可能享有现在适用于俄罗斯的大项目。此外，通货膨胀率有望下降到大约现在一半的水平。^①

第三，天然气和石油问题。白俄罗斯高度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享受低于国际水平的优惠价格。但两国经常会围绕这一问题发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不仅波及两国而且会影响到第三国。比如，2007年1月发生的天然气危机影响到欧盟。为降低对俄的能源依赖，白俄罗斯一度尝试与拉丁美洲建立经济关系，争取在那些国家开采石油，这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心。为避免白俄罗斯关闭过境管道给俄油气出口带来干扰，俄正在修建的油气管道将绕开白俄罗斯。

笔者认为，目前俄白联盟还只是一个条约，而非现实。这是一个试图互相影响对方并达到自己愿望的、有利于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游戏。在对彼此有利时，联盟将表现为正在建设的过程中，反之则停滞不前。对两国领导人来说，可能建立联盟的过程比联盟本身更为重要。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说过，实施俄白联盟国家条约，可以解决两国在统一法律、货币、海关政策、能源和交通体系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他同时指出，实现俄白两国联盟不会一帆风顺，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结 论

^① John Odling-Smee, “Monetary Union Between Belarus and Russia: An IMF Perspective”, September 2, 2003.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03/090203.htm>.

基于上述，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一、俄白两国加快建立联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实力，遏制北约东扩的势头。经济利益考虑与地缘战略利益相比，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二、俄白联盟建设自始至终一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该联盟发起者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而是他们的领导人。双方均将此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一张王牌。

三、俄白联盟建设初期白有求于俄胜于俄有求于白，但目前俄白联盟建设的过程似乎越来越有利于俄。

四、俄白联盟要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行为体仍然任重道远，主要原因在于两国领导人对联盟模式、一体化程度及速度等方面立场不同。这会导致联盟建设速度放慢，也会引起广泛怀疑。

五、俄白联盟的实现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俄白关系、两国与西方的关系、欧亚大陆格局的国际环境等。当然，该联盟的未来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意愿。

六、如果建立联盟的计划最终实现，它对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会产生何种影响现在很难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俄白联盟最终不会实现，无论两个国家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变化，无论谁出任领导人，都会推动俄白合作。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tives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ssia-Belarus Union, introduces the assessments of the west, Russia and Belarus towards the Russia-Belarus Union and its prospects, with a focus on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ssia-Belarus Union company. The author thinks the Russia-Belarus Union is based on their geopolitical strategic interests.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ussia and Belarus. However, no matter what political changes occur, both Russia and Belarus will spare no efforts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se two nations.

【Key Words】 Russia-Belarus Union, Elites, Process, Problem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юз России и Белорусии, элиты, процесс, проблемы

（责任编辑 常喆）

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的 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研究*

王维然**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贸易引力模型对哈萨克斯坦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经济规模、距离、铁路运输是影响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目前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潜力已较小，需开发新的增长点来带动中哈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 贸易引力模型 潜力

【中图分类号】F13/17.36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091-(8)

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贸易模式和贸易量，但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都只分析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并未对国际贸易流量的问题进行研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迫切需要对不同国家双边贸易流量的大小、受影响的因素及决定流量的模式进行研究。贸易引力模型就是双边贸易量研究的重要工具。

贸易引力模型的思路来源于英国物理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两个星体之间的引力受其距离和质量的影响，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贸易引力模型是指两个国家单项贸易流量与其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其距离成反比，引力模型由此得名。其基本模型为：

$$T_{ij}=AG_iG_j/D_{ij}$$

* 本文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新疆外贸竞争优势的构建》（项目批准号：07JYB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王维然，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T_{ij} 是 i 国（或地区，下同）与 j 国（或地区，下同）的贸易额， A 为常数， G_i 和 G_j 分别为 i 国和 j 国的国民收入，通常以 GDP 代替， D_{ij} 是 i 国和 j 国的空间距离。

一、贸易引力模型的应用

自 Tinbergen^① 和 Poyhonen^② 提出贸易引力模型以来，引力模型就成为国际贸易实证研究的重要工具。为了使模型更好地模拟实际情况，Linnemann^③ 将人口作为变量引入模型。Bergstrand^④ 则在模型中引入了人均收入和汇率及多个虚拟变量，使模型包含更多影响贸易量的因素。此后，贸易引力模型中一般都含有表示两国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是否使用共同语言或货币、是否同属一个贸易区等诸多虚拟变量。

国内学者也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刘青峰、姜书竹^⑤ 建立了 2000 年中国与前 30 位贸易伙伴的引力模型，证明 APEC 对促进双边贸易流量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盛斌^⑥ 研究了 40 个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转轨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引力模型，并从部门层次上进行了模拟。但以上研究都是对中国对外贸易流量的研究，鉴于哈萨克斯坦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对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性，本文则拟通过建立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流量的模型，模拟并分析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流量的特点及原因。

二、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和实证检验

（一）模型的建立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通过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得到扩展的引力模型方程为：

$$\ln T_{ij} = \beta_0 + \beta_1 \ln G_i G_j + \beta_2 \ln P_i P_j - \beta_3 \ln D_{ij} - \beta_4 A_{ij} + \beta_5 B_{ij} + \beta_6 C_{ij} + \mu_0$$

其中，因变量 T_{ij} 为 i 国对 j 国的贸易额（百万美元），关于解释变量的含义、因变量的理论预测影响（预期符号）及说明参见表 1。

① J. Tinbergen,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

② P.A. Poyhonen, "Tentative Model of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63/90.

③ Hans Linnemann, "An Econometr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Amsterdam North -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vol.75, 1966.

④ Bergstrand H. Jeffrey, "The Generalized Gravity Equation,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the Factor-Proportion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9/71, 1: 143-53.

⑤ 刘青峰、姜书竹：“从贸易引力模型看中国的双边贸易安排”，《浙江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

⑥ 盛斌、廖明中：“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引力模型的研究”，《世界经济》，2004 年第 2 期。

表 1

解释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理论说明
$G_i G_j$	出口国 i 和进口国 j 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百万美元)	+	反映了两国或地区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 经济规模总量越大, 潜在的出口能力和进口能力越大, 进而双边的贸易流量也越大
$P_i P_j$	出口国 i 和进口国 j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	代表了出口国和进口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也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出口和进口能力, 故与双边贸易流量呈正向关系
D_{ij}	两国之间的绝对距离 (公里)	-	通常代表运输成本的高低, 从而成为阻碍贸易的重要因素
A_{ij}	虚拟变量, 表示是否为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取 1, 发展中国家取 0	-	当贸易伙伴为发达国家时, 由于需求偏好不符, 双边贸易流量因而会减少
B_{ij}	虚拟变量, 表示两国是否可开展铁路运输, 是取 1, 否取 0, 铁路相同, 但轨距不同取 0.5	+	通常代表运输成本的高低, 由于哈萨克斯坦是内陆国家, 铁路运输成为其最主要的对外运输方式。但由于哈萨克斯坦为宽轨铁路, 因此与标轨铁路国家的运输成本上升, 阻碍贸易。
C_{ij}	虚拟变量, 表示伙伴国是否是独联体国家, 是取 1, 否取 0	+	鉴于历史的原因, 独联体国家间经济往来、分工、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强于非独联体国家, 因此其贸易流量也大于与其他国家贸易流量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与 31 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这些国家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占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额的 95.07%, 具备了较为充分的说服力。哈萨克斯坦与各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数据来自哈萨克斯坦国家海关 2006 年的进出口统计数据, 2006 年各样本国家的 GDP 和人均 GDP 均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的《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8》; 距离数据来自网站 www.geobytes.com 的 City Distance Tool。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基于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鉴于所使用的样本为单一时点的截面数据, 模型应当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 而通过对数变换也基本上克服了引力方程的异方差问题。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变量的内生性如贸易量与收入、多重共线性以及忽略出口国和进口国特定效应所带来的设定误差, 这些可能会导致模型回归结果出现某些偏差。利用收集的数据, 本文采用 Eviews 6.0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的相关数据及检验值见表 2。

表 2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常数项	-7.954246 (-1.590832)	-7.754705 (-1.575537)	-4.252801 (-1.111461)	-4.406928 (-1.165329)
LnG _i G _j	0.675227 (4.378479)	0.653664 (4.425209)	0.699606 (4.904673)	0.707696 (5.028558)
LnP _i P _j	0.276515 (1.084085)	0.309307 (1.260072)	0.125483 (0.682754)	
LnD _i j	-1.134441 (-1.667230)	-1.152650 (-1.718644)	-1.359598 (-2.097938)	-1.091118 (-2.139407)
A _i j	-0.454222 (-0.629218)	-0.677538 (-1.122660)		
B _i j	1.420528 (1.958485)	1.618567 (2.560352)	1.500202 (2.394863)	1.504204 (2.425455)
C _i j	0.421632 (0.582450)			
R ²	0.531660	0.525040	0.501095	0.492150
调整后的 R ²	0.414575	0.430047	0.424340	0.435722
F	4.540798	5.527192	6.528521	8.721758
DW	1.057374	1.041724	0.976147	0.980903

(三) 实证检验

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方程 1，各项变量都通过了经济理论检验，拟合优度检验和 F 检验显著，但 t 检验不显著。其中 C_ij 的 t 检验最不显著，这个结果出乎一般预料。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独联体国家间经济往来密切，而从这一结果看，哈萨克斯坦目前与独联体国家贸易往来已大为减少，表明是否为独联体国家对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无线性关系。故剔除最不显著的变量 C_ij。

再次进行回归，得方程 2。方程 2 的经济理论检验、拟合优度检验及 F 检验都通过，但 A_ij 的 t 检验最不显著。说明是否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往来亦无线性关系，这应该与哈萨克斯坦目前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能源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不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需求都是一致的，尽管其需求量有所不同。

剔除最不显著的变量 A_ij 后再次回归得方程 3，其经济理论检验、拟合优度检验及 F 检验都通过，但 LnP_iP_j 的 t 检验不具有显著性。将此项变量删去。再次回归后得方程 4：

$$\text{LnT}_{ij} = -4.406928 + 0.707696\text{LnG}_i\text{G}_j - 1.091118\text{LnD}_{ij} + 1.504204\text{B}_{ij}$$

由方程 4 可知，在哈萨克斯坦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流量影响因素中，起到促进作用的影响因素依次为两国铁路运输状况和两国 GDP 的水平。如果哈萨克斯坦与其贸易伙伴能够直接开展宽轨铁路运输，则两国间贸易流量的促进系数为 1.5%，

如果两国间能开展铁路铁路运输但需换装,则对贸易流量的促进系数为0.75%。这主要是因为哈萨克斯坦属于内陆国家,其开展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运输方式是铁路,因此铁路对其贸易流量的影响最大。而两国GDP的贡献度则为0.7%,即GDP每上升1%,则两国贸易流量增加0.7%。而是否为发达国家或独联体国家成员则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流量影响不显著。对哈萨克斯坦贸易流量起阻碍作用的主要是距离,两国间距离每缩小一个百分点,则两国间贸易流量可增加1.09%。

(四) 贸易潜力测算

贸易引力模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利用其估算贸易伙伴间双边贸易流量的潜力,即用实际贸易流量与根据贸易引力模型测算的理论的贸易流量作比较,以估算贸易伙伴间双边贸易流量发展的潜力。

根据刘青峰、姜书竹^①对贸易潜力的分类标准,笔者将哈萨克斯坦与贸易伙伴的关系分为三类,即潜力再造型、潜力开拓型和潜力巨大型。

一是潜力再造型。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按模型分析已经用完,实际双边贸易额与预测双边贸易额的比值大于或等于1.20。与这种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有俄罗斯、意大利、瑞士、法国、中国、伊朗、荷兰、乌克兰、以色列和吉尔吉斯斯坦共计10个国家。其中与瑞士的贸易超过潜力最大,达到了10.13。

二是潜力开拓型。哈萨克斯坦与这些贸易伙伴发展双边贸易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扩大双边贸易的空间,实际双边贸易额与预测双边贸易额的比值在1.20到0.80之间。与这种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借鉴处理与第一类贸易伙伴关系的做法,同时注意开拓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美国、西班牙、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韩国、加拿大、白俄罗斯、葡萄牙等9个国家。

三是潜力巨大型。按模型分析,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非常大,实际双边贸易额与预测双边贸易额的比值小于或等于0.8,这类贸易伙伴有德国、英国、日本、瑞典、芬兰、波兰、希腊、阿塞拜疆、印度、比利时、保加利亚和奥地利等12个国家。哈萨克斯坦与这类贸易伙伴之间一般存在较严重的贸易壁垒,与之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在于尽快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

^①刘青峰、姜书竹：“从贸易引力模型看中国的双边贸易安排”，《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表 3

国家	比值	国家	比值	国家	比值
俄罗斯	2.14	日本	0.78	加拿大	1.17
意大利	3.98	西班牙	0.87	吉尔吉斯斯坦	1.65
瑞士	10.13	土耳其	0.90	希腊	0.58
中国	1.61	罗马尼亚	0.95	白俄罗斯	0.80
法国	1.68	乌兹别克斯坦	1.00	葡萄牙	1.04
德国	0.70	以色列	3.50	阿塞拜疆	0.70
伊朗	2.08	韩国	1.00	印度	0.19
荷兰	1.83	瑞典	0.56	比利时	0.30
英国	0.70	芬兰	0.74	保加利亚	0.63
乌克兰	1.65	波兰	0.28	奥地利	0.27
美国	0.90				

三、结 论

(一) 模型分析结论

距离是制约各国贸易流量的负面因素，而贸易引力模型的设计也是基于这一思路的，但从哈萨克斯坦的数据所得出的结果来看，实际运输能力的高低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哈萨克斯坦邻国中只有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与其充分发挥了贸易潜力，而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和以色列等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距离比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潜力开拓性和潜力巨大型国家更远。在哈萨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中，只有美国、英国、以色列、加拿大、日本和印度无法与其进行铁路运输，在可与哈萨克斯坦直接开展铁路运输的国家中，有 9 个国家是可进行宽轨运输的。以上分析表明，距离对哈萨克斯坦外贸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于实际的运输能力。影响哈萨克斯坦贸易流量最大的因素是哈萨克斯坦是否与贸易伙伴开展便利的铁路运输。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超过了两国经济规模的影响程度，说明对于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内陆国家，交通运输的便利是制约其对外经济贸易往来的最大瓶颈。

经济规模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流量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依照传统认识，由于历史上同为前苏联的组成部分，除了地理距离很近之外，哈萨克斯坦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在经济分工、文化背景、语言与民族的相同等方面有着远远超过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密切联系，而这些条件都是促进其开展贸易的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哈萨克斯坦也只与俄罗斯、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规模超过了模型预测规模，这说明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与独联体国家间原有的经济分工和贸易联系已基本被打破。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普遍偏重工业，而且其制

造业技术水平低于西方国家，在轻工业方面低于中国、韩国等国，因此哈萨克斯坦已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则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来确定自己的分工。

哈萨克斯坦与其贸易潜力再造型国家的贸易额就占了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总额的 74.7%，因此对哈萨克斯坦来说，要促进外贸的进一步增长，只有更多地依靠开拓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之外的市场。

（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前景分析

中国作为哈萨克斯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其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现状已超过了贸易潜力，因此，如何进一步开发与哈方贸易的新的增长点已成为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目前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机电产品和汽车增长较快，但主要商品仍为服装、纺织品、鞋类、家具以及塑料制品等轻工产品。从哈方进口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和废钢等能源和资源类商品，这也在哈萨克斯坦内部引起了一定的民族情绪，认为中国从中获取了更大的收益。但鉴于哈萨克斯坦目前能源产业和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拥有发达的轻工业的中国能够与之开展的产业内贸易类型并不多，笔者认为要解决此问题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大力发展石油开采和石化产业的技术和服务贸易

目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已取得很多成就，但这还主要局限于单纯的石油开采，这也引发了哈方内部的不满，认为中国只是利用其能源。由于对石油开采的依赖性过强，哈萨克斯坦也开始发展本国的石化工业，希望能从石油深加工中获取更大的收益。但哈方目前的石油开采和石化工业的装备水平都多年未得到更新和改造，中国目前拥有的技术水平和设备制造能力虽然较西方国家落后，但其良好的性价比对哈方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新疆是中国能源的战略接替区，石油开采与石化工业技术水平具有一定的优势，又与哈萨克斯坦相邻，具有地缘优势。因此，中国应以新疆为跳板，大力开展石油开采和石化工业的合作，以技术合作来带动产品出口和劳务人员输出。这样，既能够开发中哈贸易新的增长点，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哈贸易结构由产业间转化为产业内贸易，缩小中国对哈的贸易顺差，化解哈方内部对中国的疑虑情绪。

2. 大力发展对哈的直接投资

哈萨克斯坦近年来外贸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哈国内也产生了能源被外国人拿走，本国获利不多的不满。目前哈国内的产业结构并不完整，即使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石油和农业的技术和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中国可在具有优势的产业方面对哈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带动设备的出口，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在当地的投资来促进当地就业上升和税收增加，缓解其国内不满情绪，为双方进行长远的战略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3. 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水平

贸易引力模型已揭示了距离对各国贸易流量的影响程度。对于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个内陆国家来说，距离是制约其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以上分析可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善，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距离遥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哈萨克斯坦第 4 大贸易伙伴，除了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和两国相邻因素之外，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双方能够开展铁路运输。尽管还存在轨距不同的制约，但双方通过阿拉山口过货量的急剧上升，无疑是对双边贸易的一个极大促进。中国目前已在修建的精霍铁路将于 2009 年完工，一旦哈方部分的铁路建设完成，霍尔果斯将成为双方又一个铁路通道，这对促进中哈贸易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ilateral trade flow between Kazakhstan and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based on trade gravity model. Studies show that economies of scale, distance and railway transportat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Kazakhstan's foreign trade. China's trade potential towards Kazakhstan has already been rather small,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points in order to promote further trade between Kazakhstan and China is needed.

【Key Words】 Kazakhstan, Trade Gravity Model, Potential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азахстан, гравитационная модель торговли, потенциал

(责任编辑 姜睿)

历史·文化

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 ——对布哈林几个经济理论问题的再认识

向祖文*

【内容提要】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继续坚持和捍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结合俄国的实际，针对当时苏俄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总结过去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观点可以简单概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因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民族类型”；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消除二元经济之间的差距；要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保持综合平衡。

【关键词】布哈林 经济理论 过渡时期

【中图分类号】F09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099-(17)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是从研究经济学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的。列宁曾称赞他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和“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在担任俄共（布）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及《真理报》主编期间，撰写了大量文章和理论著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发表了一些独立的见解，捍卫并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宝库。

* 向祖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审。

一、“民族类型”论——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理论前提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时，主要是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质的规定进行分析和探索的，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这种经济制度将采取何种形式和类型则没有涉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可能性的设想比较单一；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形式问题还未成为现实。列宁根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从理论上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而且是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并在实践上成功地证实了这一理论。在这种新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以怎样的经济运行类型实现经济建设目标。列宁在 1918 年至 1924 年这短短的几年中不断探索，先后在实践中实行了两种“经济类型”，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指导下的“类型”和新经济政策指导下的“类型”。从 1921 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由于符合俄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列宁当时的身体状况和繁重的国务活动的限制，不能有更多的精力从理论上将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这个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被布哈林的理论研究所弥补。

1922 年 11 月 18 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作为生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类型’的问题”^①。布哈林认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将是以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另一种形式中的继续；这就是说，各个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在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中表现出来。”^②据布哈林的分析，“美国的资本主义具有突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与本国的强大组织（托拉斯）结合在一起的银行在其中占统治地位。法国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国内工业不甚发达的、高利贷类型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把钱借给其他国家，剥削那些国家，这种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国内的生产活动非常之少，在它的怀抱中小农经济还有栖身之所，可是，例如在英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种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把自由农民的经济吞噬了，已经把世界掠夺的特点同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的活动结合起来了”。

“可怕的、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经济落后，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的这种结合，就构成俄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的特点，构成它的所谓‘民族面貌’”^③。如果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资本主义具有各自的特点，那么显而易见，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63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64 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74-475 页。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也必将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以前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产生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最初历史阶段的落后特点并非苏联特有的发展规律，而是与苏联国情相类似的所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都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因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民族类型”和“民族特点”。这种“民族类型”的差别就在于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物质技术基础不同，而这种差别只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才能消灭。

1924年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各种类型的问题”。他认为，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工业，这些工业在国有化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工业，构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经济命脉，因此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物质保证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俄国的经济技术极端落后，所以俄国要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或叫作“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讲，这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不存在阶级的未来社会第一阶段（通常称之为社会主义），而是处于仍然存在阶级区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布哈林深刻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也是生产上的指挥者。社会主义的这个初级阶段的特点是阶级的等级制依然存在，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具有通常的性质：居于上层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在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①布哈林的“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可以说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这套理论，是布哈林为了回击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联共（布）党内列宁主义的反对派否定俄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悲观论调，在苏联从1921年转向新经济政策到20年代中期，通过对过去的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实践的深入研究而逐步形成的。这套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为苏联社会主义作了定位，又以“落后的社会主义”和“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为苏联社会主义作了定位，形成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科学回答，这个回答是从俄国国情出发，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产物。那么，当时俄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落后型的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布哈林作了如下归纳：

1、从生产力水平上看，落后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就是欧洲较为落后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从总体上看其生产力十分落后，突出表现为：（1）农业经济的比重大，存在大量小生产者和农业私有经济成分；（2）工业虽较农业发达，但比例失衡，整体落后，尚存在资本主义的私有成

^①《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3页。

分；（3）地区发展不平衡。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是苏俄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

2、从生产关系上看，苏俄的经济成分是混合型的，既有公有经济，又有私有经济，这与俄国的生产力是相适应的。同时，混合经济成分要求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关系，所以，市场关系的存在是落后型社会主义的突出特征。市场关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由于生产力落后，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所以苏联存在市场关系是客观的，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3、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布哈林认为，由于存在小商人和小业主，所以，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仍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存在着在俄国具有极其巨大的经济意义的非常广大的农民阶层，所以，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相当长的。他充满信心地说：“在经济和技术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这条道路是非常漫长的。尽管如此，这却是一条可靠的道路。只要我们对农民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一定能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①

4、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在布哈林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如果“从高等代数的观点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增长和集中的基础上。而在俄国“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必须高度重视市场关系，货币、交易所和银行等发挥着巨大作用，不能立即实行计划经济。由此，他提出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②。

5、坚持对外开放，吸取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因为“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它必须学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的肯定成果，因为世界经济正在逐步走向一体化，“一方面，我们对世界经济有越来越大的依赖性，而另一方面，——尽管听起来很离奇，——我们越来越独立，通过我们同资本主义的国外联系，我们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巩固。这里是辩证的矛盾。不能只看到过程的这一半，而完全忘掉了另一半”^③。

布哈林还预见到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将存在于人类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意识到这种类型差别将具有一定的宏观性。他引资本主义为例，认为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发展直至晚期以后，仍然保留着多种不同的民族类型（形式、面貌和特点），社会主义的不同民族类型并存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它将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直到转变为包罗万象的世界共产主义制度为止”，直到“无产阶级世界统治”、“社会主义世界产生”发展起来为止。一句话，它是在共产主义使“世界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20 页。

② 李冠乾：《苏联史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15-116 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177 页。

各国融合为一个整体以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普遍现象。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具体的经济类型或生产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之下是不同的，建立在不同的起点和不同的基础上的经济类型或生产形式，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要既善于识别和看出共同性，也善于识别和看出特殊性，后者在沿着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事业中，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

布哈林上述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反对左倾思想和冒进的做法。这是一个重要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各国在发展阶段问题上，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超越阶段的冒进现象，而目前一些国家又都在重新认识和探讨这一问题，纠正过过去的冒进做法，重新确定目前所处的阶段，这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布哈林上述思想的正确性。

二、“二元结构”论——工农业均衡增长的逻辑出发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此后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并首创了经济发展研究的二元结构分析方法^②。然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就已经以苏联经济为对象，分析了经济落后国家的二元结构现象，并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结构理论。

1、二元经济结构的内涵。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当代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二元结构，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两大部门，即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在传统部门中，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及零散的商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是零或负数，这一部门集中在农村，并吸纳了社会的大多数劳动力；在现代部门中，主要是采用先进技术的工业、建筑业和现代化的商业与服务以及运用现代技术与生产经营方式的大规模农业，这一部门一般集中在城市或与城市联系紧密的地区，并且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比传统部门高得多。布哈林认为，苏联“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农民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活干，但必须吃饭；在手工业者中间同样有人口过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197页。

② 万晓光：《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60、75-77页。

剩，这种过剩的（隐蔽的和公开的）人口是城市的一种可怕的压力，加剧了失业现象，因此，显然失业问题的重心与其说是在城市，不如说是在于农业的过剩人口。”^①另一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下两部门的经济增长还会出现反差，即农民的小经济远远落后于拥有种种完善技术的现代工厂。结果是，两部门之间的差距在二元结构下越拉越大，最终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布哈林的“二元经济结构”分析是以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这一经济落后国家为对象的，分析的出发点是这个国家的城乡关系类型。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城乡关系的不同类型是区分整个历史时代的标志”^②。他在 1928 年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把资本主义城乡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这里，农民一贫如洗，国内市场容量极小；第二类，农奴制的残余很少，农奴主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资本家，农民比较富裕，农民市场的容量较大；第三类，美国类型，几乎完全没有封建关系，土地买卖“自由”，存在着富裕的农场主，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在布哈林看来，革命前的俄国城乡关系就属于第一种类型。正因为如此，过渡时期的苏联经济呈现如下结构特征：“可怕的、半农奴制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伍，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结合起来，即“农民的小经济远远落后于拥有种种完善技术的现代工厂”^③。

2、二元经济结构转轨模式设计。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和农村具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机制，在双方交往关系处于相互隔绝或半隔绝状态时，由于双方的增长速度呈现剪刀型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部门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一元经济结构是全面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各产业部门（包括农业）都普遍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两个产业部门都实现了协调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联系普遍化等等。如何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轨，即消除两部门之间的差距，使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发展，即转向高层次的一元经济结构，就成为发展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命题。

刘易斯所设计的解决这一命题的理论模式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实现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当现代部门的扩张将整个经济内的过剩劳动力吸纳干净时，收益递增就会取代收益递减而成为整个经济的一般趋势，使整个经济摆脱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并由此转变为一个稳定增长的经济。刘易斯的这种理论模式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要素（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而没有研

①《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67 页。

②《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78 页。

③《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56 页。

究其他要素（如资金、技术）的转移或流向以及由此引起的国民经济结构全面转换的问题上。因此，他的分析只能解决工业化问题的某个方面，而不能涵盖工业化的整个内容。

布哈林对二元经济结构转轨模式的设计则是按照与刘易斯不同的思路进行的。在他看来，消除二元结构，国家工业化无疑是法律^①。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差距。但是，实现工业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布哈林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与农业的结合问题。社会主义要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而不是放弃不管，要使农业获得巨大增长。因此，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是一个为消灭城乡对立作准备的过程^②。显然，布哈林向人们表述了工业化的宗旨不仅仅是工业现代化，而且要对农业也实行工业化，不仅仅要发展工业，而且也要发展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即工业带动农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农业促进工业发展的过程。这里他向人们提供的落后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模式，是工农业均衡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途径，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共同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因为，这不仅“填平以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深渊”，而且，“城市的技术援助，特别是农民经济的电气化以及与此同时的合作化……是使农村繁荣昌盛的强有力的杠杆，城市和农村的物质条件将逐渐趋于平衡”^③。

但是，布哈林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工业化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一模式在实际操作方面遇到了两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是当时苏联工业发展相对迟滞。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工业设备更新不足，出现了工业商品荒，要解决工业设备更新问题就需要大量资金，布哈林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资金短缺约束着农村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也需要追加投资，但这部分资金从哪里来，布哈林也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如何解决布哈林当时遇到的难题，使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具有现实可行性而不仅仅是理论可行性，应该是当今发展经济学家们面临的共同课题。

三、“综合平衡”论——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布哈林特别注意到了产生的一些新矛盾：工业化由于缺乏资金而发展缓慢，工业内部比例

①《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90-291页。

②《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91页。

③《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56-457页。

不协调，出现了商品荒；由于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不愿意把它们卖给国家，而宁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一些干部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出售谷物，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这些矛盾，布哈林认真分析了当时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探讨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这是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失衡的表现。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在宏观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起来，平衡发展，这就是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利地（尽可能没有危机地）进行，从而达到对无产阶级尽可能有利的国内阶级的力量对比，必然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进程）”^①。

布哈林关于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理论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他指出，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不是僵死的平衡，而是不断运动着的平衡。达到这种平衡的途径主要是尊重价值规律，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调整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协调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关系：

1、协调好工农业生产平衡发展的关系。工业与农业必须协调发展，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来自农业，在抽象的理论探讨中似乎没有什么分歧，但把理论具体运用于实践，看法就不同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就如何实现工业化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最主要的观点是主张要最大限度地吧资金从农业抽到工业；另一种是要“维护”农民利益，减免农业税赋。布哈林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因为其中任何一种观点都将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他指出，工业与农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互相支援，平衡地发展。首先，工业的发展要依赖于农业的发展。这种依赖不仅在于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和劳动力，而且在一个被封锁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农民是工业的最重要的市场。布哈林指出，我们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民市场而生产的，工业产品的消费者首先是我们的农民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工业是由农民需求的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来决定的。农民市场的容量是决定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就是说，农民经济愈快摆脱贫困，它愈富裕，它购买的农具和机器愈多，它改造自己的技术愈快，采用新的耕作形式愈快，因而能够向城市工业购买的东西愈多，——则我们的工业中的积累就进行得愈快。”^②由此可见，工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77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22 页。

业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并且在和农业最佳结合的情况下，才能长期保持发展的势头，从而持续走向高涨。

在强调农业对工业发展的基础作用时，布哈林并没有忽视工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促进和领导作用。“没有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设想的”^①。农业要发展，提高生产力，就必须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如农具、化肥），而这些都要由工业来提供。所以，布哈林说：“大工业是全部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工业是迅速改造农业的杠杆”^②，“如果没有拖拉机，没有化学肥料，没有电气化，农业就注定要陷于停滞状态”^③。“没有工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农村的落后、野蛮和贫困”^④。

通过分析，布哈林得出结论：“工业要得到发展，需要农业取得成就；反之，农业要取得成就，也需要工业得到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东西，它本身应当决定领导党的正确政策。”^⑤

2、必须保持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平衡。布哈林认为，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将重心放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是正确的，因为不论轻工业也好，农业也好，都需要重工业提供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追加生产资料。但是，不能以此片面强调高速发展重工业而置轻工业的发展于不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必须使两种工业的发展达到最佳结合。这是因为：第一，重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把过多的资金投向重工业建设，会造成资金积压，信贷短缺，后备不足等不良后果，从而影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第二，轻工业的建设周期短，资金周转较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收回投资并能赢利，这就可以利用轻工业的利润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第三，就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来讲，也不能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布哈林写道：“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消费者不是为经济而存在的。这一点永远不该忘记。‘新经济’同旧经济的区别就在于把群众的需要当作它的标准”^⑥。而要繁荣市场，满足群众的需要，就必须重视轻工业的发展，加强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3、保持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合理比例。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上，布哈林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地追求积累，也要反对片面地追求消费。但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倾向还是片面地追求积累，过于偏重发展重工业。他认为20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速度，完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22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80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79-280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80页。

⑤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423页。

⑥ 转引自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2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全是以预算的极度紧张、后备严重短缺、削减消费部分作为代价的。由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供应经常中断，广大群众的排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布哈林认为，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独特的经济危机。他进一步阐述道，过渡时期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积累和需求比例失调，所不同的是这种失调的反映是“颠倒的”，那里是生产过剩，这里是商品荒，那里是供过于求，这里是求过于供，那里是积累过多，这里是资本短缺。

有鉴于此，布哈林根据平衡论的思想，强调保持一定的积累投资于基本建设，这是生产持续增长的保证，是第一位的，但又不能没有限度地投资，必须要有一个界限。关于投资的界限问题，布哈林认为最重要的界限有两个：（1）必须留有后备，使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均有保证，不留后备，弦绷得太紧，会使商品荒更加严重；（2）基本建设物质因素必须有保证，不仅保证对建筑材料等需求的相应货币，而且应当保证建筑材料的相应供给，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

4、保持农业内部的平衡发展。布哈林认为，在农业内部也要保持平衡，恰当安排劳动比例，以便使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生产协调发展。1928年初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粮食的收购量大大低于往年。这场危机造成城市居民、工人和士兵粮食供应紧张，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联共（布）党内有不同解释。斯大林认为，之所以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因为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富农对粮食价格的操纵，是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而布哈林对这场危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工业品荒的情况下，危机并不是粮食过剩的表现，而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谷物业的萎缩造成的。而造成谷物业萎缩的直接原因是国家错误的价格和税收政策所导致的经济比例失调。首先，谷物价格与经济作物价格的比例日益失调。1924年至1928年的短短4年间，谷物价格指数由129降至109，而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价格指数却由135升至151，由此可见，谷物同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比价日益拉开，农业内部的剪刀差呈扩大趋势，粮食成为无利可图的产品，这就使得农民不愿直接出售粮食，而宁愿用粮食饲养牲畜，然后出卖畜产品，或不种谷物而改种经济作物。其次，税收政策也不利于谷物业。大田作物占农民纯收入的39.5%，但占税赋额的66.59%，非农业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27.8%，但仅占税赋额的5.2%，悬殊太大。再次，货币不够稳固，农民只把货币当作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而没有把它作为积累手段。因此，农民即便手头有粮食，也不会出售来换取货币。布哈林认为，要解决危机就必须调整现行政策，在价格和税收等方面刺激谷物业的生产，从而使谷物、技术作物和畜产品在生产 and 市场上保持比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使三者得到协调发展。

5、经济平衡是政治平衡的基础。布哈林认为，过渡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成分是国

营经济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合作社经济，最重要的经济组织是国家性的组织。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单纯政治权力专政，还应该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有机结合。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在苏维埃俄国，国家性的经济组织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通过国家预算对国家的全部工业、铁路和矿山的开发与利用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到了苏联时期，这种集中管理形式就更明显了。布哈林认为，这种管理与领导一定要减少行政干预和强制，改用经济的方法是比较恰当的。他说，“经济领导如果犯了破坏国家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组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①。也就是说，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要掌握好“度”，如果国家的计划和管理工作失误，就会出现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造成商品短缺和粮食供应危机，阶级敌人就会乘机活动，以至打破国内的政治平衡。所以，布哈林特别强调经济平衡是政治平衡的基础，党和政府必须全面规划，尽力安排好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实现经济平衡，从而保证国家的政治平衡和稳定。同时他还指出，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果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会严重影响和挫伤地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从而破坏国家的集中领导体制，使得整个领导体制变得僵化而失去活力。此前，列宁也强调在巩固国家计划领导的同时，必须给地方苏维埃和经济机构广泛的权力，更好地发挥地方经济建设的主动性^②。合理规划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对国民经济发展是相当有利的，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举措。布哈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从本性上是一个从平衡走向不平衡，又在更高水平上向平衡复归的辩证发展过程，平衡的原则是经济建设少走弯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思想是布哈林对苏维埃政权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结，也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俄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创新。虽然这一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但他的理论探索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高度。在布哈林的“动态经济平衡”模式中，他不否认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也不否认工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计划和市场之间、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他反对用单纯的阶级斗争和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他主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力求保持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平衡，既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又注意把它们引上社会主义的轨道。可以说，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建设模式，是一种比较渐进、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77 页。

② 徐秉让：《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53 页。

比较灵活、较多地考虑到落后国家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

四、“市场关系”论——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战略导向

布哈林的市场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由否定和排斥到肯定和利用两个阶段。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哈林认为商品和价值等经济范畴不适用于过渡时期。他在所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断言：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消失了。“货币不再是普遍的等价物，而成为产品流动的约定的——并且是极不完善的——符号”，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因此，在这里能有的，一方面是某种叙述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规范的体系。但是这里不会有研究“市场盲目规律”的科学地位，因为市场本身不存在了^①。

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在当时的俄国实行直接产品交换是行不通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对他的战时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布哈林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特点与其说是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力，不如说是消费现有的储备。当需要恢复经济的时候，它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因为它是“堵塞的”周转制度，“堵死了私人的个人主义刺激因素，甚至堵死了在工人阶级中也有的这种刺激因素”^②。要想恢复和发展生产，有赖于放开商品流转，除掉束缚生产发展的羁绊。在实践的推动下，布哈林开始重新审视市场问题，并逐渐由持否定态度，转为持肯定态度。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他从理论上反复探讨了这一问题，形成了“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

布哈林市场理论的变化，首先得益于列宁的批评教育和耐心帮助，其次是战时共产主义实践的警示，最后，曾经犯过的“左派幼稚病”及其深刻教训，也促使他毅然转到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布哈林思想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关系理论是其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市场关系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是联结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纽带。布哈林经济纲领的基础，就是认为工业的发展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坚持生产的“链条”必须总是“以生产……进入个人消费过程的消费资料为终结……”，“在我国，农业是全部经济的基础。我

^① [苏]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郑异凡、余大章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1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7页。

们的工业发展得比较差一些，它的发展也取决于农业的增长”，“不要脱离庄稼汉的基地，逐步发展工业。要记住，农民经济积累的每一个戈比的钱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积累的每一个卢布的基础。在自己的全部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中都要紧紧地抓住庄稼汉。”^①。布哈林认为，工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的发展，他非常辩证地阐述了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工业发展的最快速度绝不能靠最大限度地从农业那里取得资金的办法加以保证。事情决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拿得少些，我们就可使农业有更多的积累，这样明天我们就可保证使自己得到对我们工业产品的更大的需求。使农业取得更大的收入，我们下一年将可以从这笔更大的收入中比去年拿到更多的东西，可保证使我们的国营工业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更大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如果我们在头一年……用不那么快的速度前进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以后将会提高得更快。”^②同时，布哈林也十分强调工业是农业发展的强有力支柱，没有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工业向农业提供电力及大型农业机械，农业的发展也无从谈起。农业的旧耕作方式至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小农经济将永远是小农经济，将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布哈林认为，市场关系是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是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之间联系的纽带。他强调，工农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提供市场，因而相互促进。二者之间的市场关系“意味着我们使得城市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农村的繁荣，同时使得农村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城市的繁荣”^③。这样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2、市场是开展竞争的重要手段。布哈林反对左派用强制手段和不等价交换来取得发展工业所需的粮食和原料等。他强调，竞争是实现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他认为，竞争有两个作用：（1）通过竞争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他说：对“私人资本不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也不能用革命的宝剑机械地一挥来砍倒”^④，国家应该用竞争，用经济斗争来反对农村私商及富农，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信贷机构——信用社以反对农村高利贷者，在国家的援助下，以自己物美价廉的商品及低息贷款同私商、富农和高利贷者开展竞争，并逐渐挤跨农村资产阶级。可见，布哈林是反对用行政命令乃至暴力手段来排挤和消灭私人资本的。这种主张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可以限制私人资本谋取暴利，推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改善经营管理，以便逐步排挤和消灭私人资本；二是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消灭私人资本，给国民经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289 页。

② 转引自[美]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徐葵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年，第 297 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57 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296 页。

经济发展带来损失。无疑，布哈林的这种主张是切实可行的。(2) 竞争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布哈林指出，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垄断利润。但是这只会滋长企业经理们的自满情绪，产生不求上进的思想。而竞争可以打破他们安于现状的心理，促使技术改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降低产品价格。这样在保证生产力按社会主义方向增长的同时，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竞争能力的条件，以便在展开经济斗争而不是实行压制的过程中战胜自己的竞争者。

3、市场是计划调节的辅助手段。布哈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占主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这一理想目标，是不能动摇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然而，这种计划必须符合实际，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并在经济运行中不断地加以调整、补充和完善。由于还存在众多的小农，还有不少租赁企业，大量的自然经济，就使得苏维埃国家必须重视和利用市场机制。这些大量的无政府状态的经济活动无法进行计划，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进行计划。因此，必须利用市场调节作为计划调节的辅助手段，来处理私人资本同农民经济之间、私人资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农民经济同国营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得以联系。布哈林还特别肯定了贸易和市场的积极作用。他指出，通过市场可以加快物资周转和资金周转的速度，从而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最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有利于解决商品荒的问题；通过市场可以调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通过市场可以促使国家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市场还可以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发展商品生产。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指导下，能够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使市场调节的优点和计划经济的优点相结合，把各种经济成分都调动起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4、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不只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引导小生产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限制和排斥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布哈林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而是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能保证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①。“我们需要我国的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和这样的经济高涨，即与此同时要发展社会主义形式，要不断排挤和削弱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需要取得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而不是把我们引导到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63 页。

完全复兴的所谓‘健全’的资本主义。”^①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意义。

首先，布哈林多次强调，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尤其是大工业，确保其优势地位，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布哈林在1921年所写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一文中，在讲到新方针的基本任务时说，“按照发展生产力的路线而制订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加强大工业”^②。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如何来振兴、发展大工业？振兴、发展大工业，首先是要有大工业得以开工的原料、材料、燃料以及补充的设备等等。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布哈林完全赞同列宁提出过的农民经济、小工业、租赁制、租让制和对外贸易。发展市场关系的目的是为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经济形式中取得补充产品，把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壮大其经济力量，然后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手段，使之为恢复和发展大工业服务。

其次，布哈林坚持和发展列宁晚年关于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影响下，通过合作社计划，利用市场关系，使农业、手工业、小商业等私人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布哈林的合作社计划的中心是在流通领域。布哈林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就说过，对农民来说，“要使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得通过流通领域来进行，也就是说通过农民的合作社，而不是通过集体农庄形式的直接生产联系”^③。在布哈林关于从流通领域开始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新经济政策下，合作社经过市场把越来越广泛的农民经济阶层吸引到社会化的体系中来，从而也就保证了它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无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第二，关于发展合作制的战略规划，布哈林指出，要尊重市场化、社会化发展规律，应当先从流通领域开始，逐步发展到生产领域。

再次，布哈林论证了市场关系存在的长期性，它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许多许多年”。他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时期地是经济联系的决定的形式，决定的！……由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经过市场联系，经过城乡之间的市场商品流通，那么……我们的主要经济作用应当经过市场关系，也就是说，经过商品流通的发展来发挥。”^④

但是，布哈林对市场存在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的理论观点是：市场之所以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1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9页。

③ [苏]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余大章、郑异凡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④ 转引自[苏]B. B. 茹拉甫列夫主编：《布哈林——人、政治家、学者》，宋洪训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存在，是因为俄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市场是各种经济形式之间的桥梁，首先是联系工农业经济的手段；当非社会主义经济被完全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后，市场将随之消灭，而消灭市场的正是市场本身。布哈林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点。他始终坚持“我们必须达到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①。按照布哈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谓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实质上是通过市场关系走向计划经济。“随着各种私人企业主及其私人经济的被排挤，随着国家—合作社经济的组织性和完整性的提高，我们将逐步地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即接近计划经济”^②。这种关于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使得布哈林本身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出多远，因此，很难把布哈林看作“市场社会主义”的先驱。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则是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密切联系着的。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在布哈林的经济思想中既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东西，也有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它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从布哈林的经济思想的演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与时俱进的品格，他能随着实践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地补充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他曾经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直接过渡”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在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前，也是他同列宁一样敏锐地觉察到必须立即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否则就会导致工农联盟的完全破裂和苏俄经济的全面崩溃。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在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布哈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历史性的理论反思。

我们肯定布哈林经济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不意味着当代的社会主义改革要用他的观点来概括和说明。当前我们进行的改革，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处在过渡时期的布哈林的认识。尽管如此，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仍然可以从布哈林丰富的思想中获取理论力量和经验启示。

【Abstract】 After the death of Lenin, Bukharin stuck to uphold and defend Lenin's new economic policy thinking and also formed an economy theory regarding transition period by combining with Russia's reality, aiming at a series of issues occurred in Russia's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2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36页。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oviet Union period, drawing lessons from p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ystematically explaining his views. These theoretical points of view can be simp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have different “ethnic types” due to differ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nly the realiz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can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the dual economy; to susta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role of market regulation, so that the overall balance among each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can be maintained.

【Key Words】 Bukharin, “Ethnic Type” Theory, “Dual Structure” Theory, “Comprehensive Balance” Theory, “Market Relations” Theory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ухарин, теория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типа», теория «двой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теория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баланса», теория «рыно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责任编辑 郭金月）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结构及其流变*

郭小丽 孙静萱**

【内容提要】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主旋律之一，它具有深厚的宗教基础、充分的哲学阐释、极至的文学体现、有效的经济保证和强大的政治依托。在宗教层面，俄罗斯曾自诩是正宗基督教的继承人和拯救者；在精神层面，俄罗斯相信其民族的文化思想是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在政治层面，俄罗斯曾试图解放全人类；基辅罗斯、鞑靼罗斯、莫斯科罗斯、彼得堡俄罗斯、苏联以及后苏联时期分别彰显出不同的层面和特点。

【关键词】俄罗斯 弥赛亚意识 结构 流变

【中图分类号】C955.5/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116-(11)

导 言

20-21世纪之交，在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大变革语境中，俄罗斯民族思想的研究进入了勃发期。这个问题引起了俄罗斯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各领域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俄罗斯思想界对本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表达方式主要是对俄罗斯民族在世界上所居地位的思考，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定位。而在世界大背景下，这些探索总离不开弥赛亚意识，因为这是俄罗斯极为重要的民族思想，也是贯穿其整个历史的重要文化基因。正如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郭小丽，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后，河北师范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孙静萱，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在其各种著述中反复提到的,像犹太民族一样,弥赛亚意识也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俄罗斯当代一些学者也不否认这一点。古罗斯文化研究者扎比亚科(А. Забияк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人精神气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特征”。^①俄罗斯著名文学家和文化学家孔达科夫(И. Кондаков)认为,俄罗斯“处在‘结构平衡’期的时候,它在主观上就会认为自己普济主义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毫不谦逊地评价自己的潜势,这是一种民族-历史、宗教或者文化-政治的弥赛亚意识。”^②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者М.季莫菲耶夫(М. Тимофеев)在分析俄罗斯灵魂时指出,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民族重要的种族特征之一,也是俄罗斯人共有的民族特性。^③

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具有一种立体的、三维的结构模式,由三个层面组成:在宗教层面,俄罗斯自诩为东正教的继承人和拯救者(религиозный мессианизм);在精神层面,认为本民族思想是拯救世界的最佳武器(духовный мессианизм);在政治层面(世俗)层面,俄罗斯试图解放全人类(светский мессианизм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мессианизм)。第一个层面(宗教)主要通过宗教理念和哲学思想体现出来,属于抽象的“概念”范畴;第二个层面(精神)主要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体现出来,属于具体的“形象”范畴;第三个层面(政治)主要落实在社会实践方式中,属于经验的“行动”范畴。“概念”“形象”和“行动”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一体又各有不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轮流居主导地位。但无论哪一方面占上风,思想和行动的弥赛亚意识始终处于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中,这种互动贯穿在整个俄罗斯社会发展之中,并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这使得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具有深厚的宗教基础、充分的哲学阐释、极至的文学体现、有效的经济保证和强大的政治依托。

如果在历史时态视域中观察就能发现,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世人展示着不同的侧面。就俄罗斯整个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当社会发生巨大变故时,文化含义建构的体系性和传承性就会遭到破坏,整个文化史的流程中就出现了不同阶段,构成一个“文化范式”体系(парадигматика культуры)。^④根据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发展特点,别尔嘉耶夫将俄国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五个不同的俄罗斯:基辅罗斯、鞑靼罗斯、莫斯科罗斯、彼得时期的俄罗斯帝国以及苏维埃俄罗斯。”^⑤这位思想家在《俄罗斯命运》中预言说,苏联之后还

① А.П.Зябияко. Начал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2002,С.261

② И.Кондаков.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99. С.30

③ М.Тимофеев. Незавершенный проект. Москва., 2000. С.7

④ И.Кондаков.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99. С.13

⑤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1997. С.246

会出现一个全新的俄罗斯。那么，加上现阶段的“新俄罗斯”，俄罗斯的文化范式体系由六个阶段构成。^①在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弥赛亚意识的宗教和政治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弥赛亚意识在其社会意义上是流动的、短暂的、阶段性的。

一、宗教的弥赛亚意识居主导地位的阶段（基辅罗斯与鞑靼罗斯时期）

基辅罗斯和鞑靼罗斯时期，成为上帝选民的意识虽还处于朦胧阶段，但亦有体现。它在最早的典籍《法与神赐说》（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和《往年纪事》（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中模模糊糊地显现出来。在《法与神赐说》中，神选意识已初具形态。^②其作者——罗斯第一任都主教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认为，第一个接近上帝的是犹太人，而最后一个受上帝青睐的是罗斯人。罗斯民族不是普通的民族，而是一个新的、神选的民族。“人类的上帝光顾了我们的土地”。^③居住在这片大地上的民族最终会向世界道出自己的“言说”。伊拉里昂非常大胆地提出了罗斯人民的使命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问题。《往年纪事》的作者涅斯托尔（Нестор）附和了伊拉里昂的思想。一方面，作者记载了古罗斯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传达了一种理念：罗斯的历史是《圣经》故事的再现。罗斯是神圣的国家，罗斯人民是上帝的选民，罗斯的历史是“神选民族的历史”。^④许多民间传说也充分显示出神选理念，如妇孺皆知的圣徒安德烈的故事等。

到了13世纪，蒙古鞑靼人开始入侵。当时的罗斯以及欧洲都认为，启示录的预言即将实现，整个世界的末日到来了。研究者发现，此时在罗斯和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世界末日来临的作品，且这种末日思想与拯救理念密切相关。俄罗斯人始终认为，末日到来之际，罗斯饱受鞑靼的摧残和践踏，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鞑靼人的铁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拯救了整个欧洲。^⑤鞑靼罗斯时期，出现了一系列至今仍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如《关于俄罗斯大地覆灭的言说》（Слово о гибели

① 俄罗斯社会文化的阶段划分有多种，如孔达科夫在1997年著的《俄罗斯文化导论》中将俄罗斯文化划分为八个阶段，而到了1999年，作者在《俄罗斯文化》一书中又划分出十个阶段。

② 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в переводе А.Белицкой, <http://www.vehi.net/oldrussian/slovo.html>

③ 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в переводе А.Белицкой, <http://www.vehi.net/oldrussian/slovo.html>

④ Б.А. Успенский. Борис и Глеб: Восприятие истории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2000 С 40, 48

⑤ А.Ю.Карпов. Об 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жиданиях в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2002 №2. С. 3

русской земли)、《基杰日城的传说》(Легенда о Китеж-граде)等。^①它们都在一种宗教氛围中强调罗斯的神圣和神选理念。而库里科沃战役和“冰湖之战”的胜利使得罗斯人对“圣罗斯”、“神选民族”的理念深信不移,政治上的成功为上帝神选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政教合一的弥赛亚意识(莫斯科罗斯时期)

鞑靼人二百年的统治,使得基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北方的莫斯科公国却开始发展起来,俄罗斯历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莫斯科罗斯时期。莫斯科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各个公国,使它们紧密团结在莫斯科周围,形成一股合力。15世纪鞑靼的统治逐渐衰落,1453年拜占庭灭亡,而此时的莫斯科公国正如日中天。莫斯科人放眼四周,看到的是东方“野蛮的穆斯林”和西方“天主教邪教”。只有俄罗斯还保护着上帝正宗的宗教—东正教。根据基督教的理念,永恒的王国曾经与罗马帝国相连。因为它曾经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拜占庭从罗马帝国分离出来,被视为第二个罗马,它所信奉的东正教被相对于西方的东方视为正宗的基督教。拜占庭灭亡后,莫斯科罗斯当仁不让地接过它的衣钵,成为世界上唯一正宗宗教的载体,宣称自己是第三个罗马,也是最后一个罗马,莫斯科应该担负起拯救全世界的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②“第三罗马”说是俄罗斯弥赛亚意识产生的符号。但提出这个学说的菲洛费伊及其同时代人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文本符号,是“弥赛亚意识”的载体。直到19世纪,思想界才开始使用这一语汇。这个学说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是因为它表达了俄罗斯人两个最大的愿望:成为上帝的选民和永恒的强大帝国。这个学说提高了莫斯科乃至全罗斯的世界地位,不但满足了当时的社会期待,也展示了国家未来美好的发展前景。以这个学说为背景,在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演绎出很多传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费洛菲伊的学说是一个转折点:俄罗斯思想从“神圣

^① 传说在金帐汗国统治的时候,罗斯有一个恶人看不见的城市,它按照上帝的旨意隐藏起来,沉到光亚尔湖的湖底。当鞑靼汗企图杀死城中男人、掠夺城中的女子时,上帝把基杰日城保护起来,鞑靼汗找了十天十夜,最后竟至双目失明,但始终没有找到它。每到夏日寂静的傍晚,人们就能影影绰绰地看到水中的城墙、教堂、修道院和人们的庄园,隐隐约约听到城市教堂的钟声。上帝的城市隐藏在湖底,只有善良的人才能看到,这便是闻名遐迩的“基杰日城”。别尔嘉耶夫曾反复论述基杰日城在俄罗斯民族理念中的重要性,因为它表达了俄罗斯人关于“人间天堂”的理想,浸淫着某种乌托邦精神。有了这种向往,人们才不断地寻找、追求并付诸行动,希望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建立全人类的天国。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曾为这个理想王国血脉贲张。一百年后苏联解体,人们再次寻找通向基杰日城的阳光大道(参见 М.Н.Громов, Н.С.Козлов.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мысль 10-17 веков. М., 1990. С.95-97)。

^② 详见拙著《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第三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罗斯”转变为“拯救世界的罗斯”。这种思想完成了螺旋式上升的第一个周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基里洛夫(И.Кириллов)这样评价费洛菲伊：“有一些历史人物，祖辈的夙愿注入到他们身上，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他们的创造天分喷涌而出，闪烁出耀眼的光辉，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时代或者某些流派会与这些人物的名字相连；在俄罗斯人民神选思想的发展史上，费洛菲伊就是这样的人物。”^①尽管人们对这一学说持不同的态度，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俄罗斯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之一。

“第三罗马说”有着深刻的宗教涵义，同时也有鲜明的政治动机。俄罗斯宗教意识的特点在于笃信真理的宗教。俄罗斯人曾经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君士坦丁堡身上，它的陷落对俄罗斯人是很大的精神打击，因此他们一定要寻找一个真理信仰的继承者。就当时的政治条件来看，莫斯科就完全可以胜任。于是，俄罗斯的君主们很快在费洛菲伊的思想中读出了更多的内容。因为莫斯科的宗教地位确立了俄罗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地位。可以说，第三罗马说是“神权政治”的表达方式。难怪别尔嘉耶夫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俄罗斯的宗教使命是特殊使命，它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强大密切相关，与俄罗斯沙皇的特殊地位相关。于是，俄罗斯帝国的诱惑便进入到弥赛亚意识中。”^②这样，莫斯科的宗教和政治使命合二为一。

三、政治的弥赛亚意识占主导地位（彼得堡俄罗斯前期）

随着俄罗斯版图的不断扩大，政治的弥赛亚意识也日益凸显。莫斯科是世界帝国的思想在各种文本中不断被强化。《弗拉基米尔大公轶事》(Сказание о князях Владимирских)论证说：追根溯源，留里克王朝的祖先是罗马帝王奥古斯都，而沙皇的称呼源于“凯撒大帝”。著名的《白色僧帽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белом клобуке)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罗马帝国的康斯坦丁大帝有一顶白色帽子，后赠送给治愈了他致命疾病的罗马教皇，最后罗马教皇按照上帝的旨意传给了罗斯。从此，俄罗斯教会的大牧首开始戴这种帽子。国家的历史文献也传达着同样的思想。伊凡雷帝下令编写的《编年文献汇编》(Лицевой летописный свод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带有世界历史天命论的思想，它把罗斯看成世界历史伟大君主的传承地和东正教的载体，强调莫斯科就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历史与罗斯历史联系在一起，民族的历史使命在世界范围内凸显出来。作为上帝的选民，罗斯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人类的天国，带领人民与世界上所有的邪教和野蛮作斗争。

^① Кириллов И. Третий Рим. Москва., 1914. С. 137

^② Бердяев Н. А. О России 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М., 1990, С. 49—50.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罗马”说的思想逐渐转变为一种比较保守的势力，甚至成为 17 世纪后半期社会分裂的深层原因。当时，国家和官方教会一心期望俄罗斯加入世界宗教和政治进程，计划实行宗教改革。可俄罗斯人民仍以正宗宗教捍卫者的身份自居，他们认为，既然是正宗的宗教，当然不需要变革，可官方教会却主张变革代表真理的宗教。于是人们对“第三罗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王国”产生了疑义。旧礼仪派（又称旧教派或分裂派）感觉到教会和国家的变化，他们不能容忍上帝的宗教“邪教化”和“世俗化”，这是 17 世纪教会分裂的根本原因。在旧礼仪派看来，莫斯科王国非但没有实现真正东正教的弥赛亚使命，反而让敌基督统治了世界，于是真正的弥赛亚王国——天国便走入了水下的“基杰日”城。而莫斯科王国和官方教会在经历了一场权力之争后，自然走向了又一条改革之路——这便是彼得大帝的改革，于是发生了继 17 世纪教会分裂之后的第二次分裂：一个是以圣彼得堡为首都的新的俄罗斯帝国——第四罗马，另一个是以旧都莫斯科为代表的旧的第三罗马，政教合一的弥赛亚意识似乎随着旧都莫斯科一起滞结了。出现了面向欧洲、面向全世界的帝国思想，彼得大帝就是这种思想的奠基人。弥赛亚意识开始转型。

18 世纪，彼得大帝重建首都，选址和建筑风格都仿照古罗马的风范，俨然建起了一个新的罗马帝国，人称“第四罗马”。此时，宗教外衣被弃置一边，赤裸裸的帝国思想展现无遗，政治的（或世俗的）弥赛亚意识向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而宗教的弥赛亚意识依然珍存在广大俄罗斯民众的心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地作用于民族心灵的深处。到了 19 世纪，随着思想的启蒙和帝国的壮大，植根于民众的知识分子把宗教的弥赛亚意识用或明确或形象或内隐的语言表达出来。

四、精神的弥赛亚意识占主导地位（彼得堡俄罗斯的后期）

1812 年的卫国战争使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再次高涨。战胜了拿破仑的俄罗斯真的走上了世界大舞台。拯救了整个欧洲的俄罗斯，似乎“走进了欧洲民族的大家庭”，思想家们开始思考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关心东方与西方的议题。这种思考最终引起一场大讨论，讨论俄罗斯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以及它的发展道路问题。俄罗斯思想的大树出现了两个分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按照西欧的模式发展，西方文明才是俄罗斯文化、经济和世界观的最佳坐标。斯拉夫派则反驳说，俄罗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只有按照自己古老而又传统的模式发展，俄罗斯才能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①尽管斯拉夫派崇尚本民族的传统，但西方的文化思

^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斯拉夫派的主张与泛斯拉夫主义、排外主义、以及对西方世界的敌视情绪

想仍然渗透到俄罗斯文化内部，连亚历山大一世都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这是后来发生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深层原因之一。此后上台的尼古拉一世坚决采取了保守主义立场，反对西方思想对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他的保守，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俄罗斯的哲学以及“俄罗斯性”后来才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19 世纪，俄罗斯思想进入勃发期，第三罗马说以更雄辩的宗教哲学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当代俄罗斯文化学家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院士说道：“‘第三罗马说’被 19 世纪的人物确定下来：他们是果戈理（Н.Гоголь）、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К.Леонтьев）、达尼列夫斯基（Я.Данилевский）、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 Соловьёв）、尤里·萨马林（Ю. Самарин）、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В. Иванов）、别尔嘉耶夫（Н.Бердяев）、卡尔塔舍夫（Карташев）、布尔加科夫（С.Булгаков）、尼古拉·费奥多罗夫（Н. Федоров）、弗洛连斯基（П.Флоровский）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而始作俑者费洛菲伊修士本人也许根本不会想到，他的几句话不但流芳百世，而且会因被奉为经典而大放异彩，成为世代人们或骄傲、或自豪、或尴尬、或痛心的源泉。^①利哈乔夫院士的话不无道理，弥赛亚意识被上述思想家挖掘出来，并被奉为民族最为珍贵的遗产之一。也正因为此，“19-20 世纪之交，弥赛亚意识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这个阶段的弥赛亚意识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纯哲学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阐释，如舍斯托夫等人的论著，一种是生动形象的文学描述，如勃洛克等人的诗歌。当然，更有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师能够把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笔下，弥赛亚意识的“概念”层和“形象”层合而为一。

五、政治的弥赛亚意识再次居主导地位（苏联时期）

20 世纪初，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倾覆和全新国家的建立，俄罗斯进入了第五个历史阶段——苏维埃俄罗斯时期。1922 年，苏维埃联盟正式成立。前期苏维埃政权明确反对宗教，开展了反宗教运动。在声势浩大的无神论思想的压力下，宗教的弥赛亚意识似乎随着东正教的衰败再次销声匿迹。但实际上，拯救世界的理念经过千年的洗礼和磨合，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民族的血脉之中，它已无需以任何宗教为借口或外衣，直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自己的功能。^③别尔嘉耶夫在“第三罗马说”中找到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渊源：“俄罗斯人民没能实现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理念。17 世纪的

有某些共同点，但与此三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① Д.С.Лихачев.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2000. С.24

② М.Т.Иванов. Россия-Незавершенный проект. Москва., 2000. С.7

③ 详见拙著《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第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宗教分裂表明，莫斯科王国并不是第三罗马。当然，彼得的帝国更没有实现第三罗马……”然而，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人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俄罗斯，取代第三罗马的是第三国际的实现。而且，第三罗马的诸多特点转移到了第三国际身上。第三国际也是神圣的王国，同样建立在一个正宗的信仰基础之上。西方人不懂，第三国际其实并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俄罗斯的民族思想。”^①别尔嘉耶夫继而明确指出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内涵和起源：“俄罗斯共产主义比大家习惯上所想的更具传统性，是古老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转化和变形。”^②当然，就《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渊源及其内涵》的内容来看，别尔嘉耶夫对“共产主义”概念的理解还有待商榷，但是，作者的基本思路是清楚的。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确实带有弥赛亚意识的痕迹。汤因比曾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渊源”。^③尽管苏联时期反对宗教，但其文化遗产仍浸淫着某种宗教成分，彻底摆脱民族思想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民族思想只能转型。此时，弥赛亚意识已经变成一种集体潜意识，在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时，这种潜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于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具有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苏联时期，发生了弥赛亚意识在其三个方面^④的具体落实和实践。而苏联时期的主导性思想就是要把俄国革命像种子一样传遍欧洲和整个世界，“苏维埃是世界的灯塔”、“苏联是全人类的解放者”等一系列口号就是苏联时期弥赛亚意识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此时世俗的或政治的弥赛亚意识（светский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мессианизм）又开始一统天下了。

六、精神与政治的弥赛亚意识交替主导（后苏联时期）

苏联解体后，新的俄罗斯诞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东正教，教会人士取得了在大众传媒中的发言权。相应地，新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老教堂也翻修得面目一新，最引人瞩目的是政府翻修的救世主大教堂。尽管教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随着经济的滑坡，人们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俄罗斯也失去了往昔的强盛和辉煌。思想者们开始寻找可以拯救整个民族的思想体系。在这样一个“大断层”的语境中，人们的世界观变得十分混乱，这种局面对民族的教育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道德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的

①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1997. С. 371

②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1997. С.411

③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36页。

④ 指第一位性、牺牲精神和全人类性。详见拙著《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第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俄罗斯潜伏着精神和信仰的危机，究其原因，不外乎强烈的政治震撼、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风靡世界的全球化干扰。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俄罗斯出现了文化传统重振和重组的趋势，因为人们明白，任何武力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强制都是无效的。所谓重振和重组，不应该无视社会和文化的新局面而全面复旧；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斥一切外来的文化。在这个时刻，需要冷静地分析，寻找一种思想和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填充物，来确立民族的文化历史意义和价值道德观念，解释过去历史发展的过程，反思现实社会的精神面貌，这要求新的思想应具备宽泛的文化视野和带有潜质的精神内涵，以便帮助人们重组世界观。虽然国家和地方对文化财政预算大幅度削减，但在俄罗斯大地上出现了超过 1 万家的私人出版社，出版了难以计数的国内外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之作，其中，关于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书籍和文章如汗牛充栋。^①

俄罗斯再次出现上帝神选的思想，又有了西方是“敌人”的理论。还有人倡议限制某些民族的权力，扩大俄罗斯民族的权力，出现了俄罗斯是超级民族的思想，有些甚至带有法西斯的印记。^②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前途未卜的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东正教神学家米哈伊尔·纳扎罗夫（Михаил Назаров）明确提出俄罗斯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他在第四次俄罗斯东正教青年境外会议上作了题为《俄罗斯思想和现代性》（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的报告，明确提出了俄罗斯弥赛亚使命：“俄罗斯思想—是上帝关于俄罗斯的理念，是俄罗斯对于世界的使命……在当今世界罪恶滋生的环境下，我们讲的不是俄罗斯的特殊性，而是拯救世界的唯一的途径……我认为，俄罗斯应该担负起这个使命……”此报告被境内外多种刊物全文登载并引起轰动效应。

九十年代中后期，拯救世界的思想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欧亚派学者巴纳林把整个人类视为“两极结构”，他认为，“东方”与“西方”的分野有如人脑的两半球。“从遥远的古代起就形成了独特的劳动分工，西方表现为新技术的发明者，而东方则表现为精神创新的倡导者。所有伟大的宗教并不诞生在西方而是诞生在东方，这一事实绝不是偶然的。西方与东方的区别，就好像人类大脑的左半球与右半球的区别一样，对人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历史中有东方-西方这一大周期在起作用。”俄罗斯的特点是，对于东方来说它是西方的“全权代表”，而西方则把它视为东方的“本原体现者”。因此俄罗斯不仅是东西方在空间意义上的连接点，而且是

① А.Кравченко.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2001. С. 188-489

② 即便到了今天，这种极端思想依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日里诺夫斯基现象就很说明问题。这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一直活跃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且在 2008 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 10% 之多的选票，说明极端民族主义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

其在形态时间意义上的连接点。于是，当今的俄罗斯再次回到俄罗斯是东西方桥梁因而产生世界使命的命题上。^①之所以在危难时刻提出俄罗斯救世使命问题，是因为在此时，信仰的力量高于一切。政治家瓦列里·索洛维认为，近 15 年来国家的悲剧在于“俄罗斯人丧失了与之相伴几个世纪的伟大使命感。这本是赋予俄罗斯人民的特殊使命，它号召俄罗斯人在生活中体现终极真理和最高正义。”^②因此巴纳林会说：“大的帝国，我敢说，需要大的救世主义（即弥赛亚意识）。”^③

回首苏联解体后的 18 年，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主要有两种表现。第一，国家衰弱时表现为全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是民族的凝聚力，此时，弥赛亚意识具备了道德的和英雄主义的特性，这无疑值得称颂。第二，日益复兴的俄罗斯国家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对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上，更表现在民族情绪的普遍宣泄中，2007 年热销的尤里耶夫的《第三帝国》（Третья империя）便是证明。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部渗透着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作品，竟然得到学界著名学者的称赞，并声称愿为这样的俄罗斯去献身和杀戮。在这种情况下，弥赛亚意识就退化为排他性的、毫无思想性的民族主义。

结 语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不同，但总体来看，弥赛亚意识经历了两个凸显期：莫斯科公国时期和 19 世纪的宗教哲学时期。而且每一次思想彰显之后，社会实践行动就会随之而来。在一次次思想彰显和社会实践的循环过程中，弥赛亚意识的内涵丰满起来，其整体发展态势呈现出螺旋上升趋势。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弥赛亚意识初步成熟。随之而来的是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实践活动，从“第三罗马说”提出到彼得大帝建立帝国，弥赛亚意识完成了第一个显性发展阶段。

第二个显性发展阶段始于 19 世纪。这种思想在 20 世纪苏联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出来，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暂时沉寂。美国历史学家柯恩（A. Cohen）认为，历史可能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作为事件，一是作为神话，一是作为经验。他说，过去的事件仍然可以被当作“记忆”翻拣出来借尸还魂，成为当下仍然发生意义的历史。^④19 世纪弥赛亚意识的勃兴就是把民族“记忆”翻拣出来，并发展成为民族的主导思想之

① А. Панарин. Восток-Запад// Новая Россия. 1998. №1 С. 65-72

② В. Соловей. 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 <http://www.apocalypse.orthodoxy.ru/review/>

③ 转引自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96 页。

④ Paul A. Cohen :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柯恩：《历史三调：义和团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导论部分，第 88 页。

一。当历史发展到最辉煌的时期——苏联时期，拯救世界的梦想几乎实现，苏维埃联邦向世界道出了“自己的言说”。然而表面上，弥赛亚意识处于沉寂状态，因为传统已无须追问。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遭遇到巨大的文化震撼，人们开始重新发掘资源，追溯本原，以回眸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之中，找到自己曾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俄罗斯近年来举办的一次次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就是为了凸显甚至夸张文化传统与民族历史。这样，弥赛亚意识出现了历史上第三个彰显期。

【Abstract】 Messianism is one of the main themes of Russian national thoughts, which has a deep religious basis, full philosophy interpretation, extreme literature manifestation, effective economic guarantees and strong political foundation. At the religion level, Russia used to pride itself as successor and saver of authentic Christianity; at the spiritual level, Russia is convinced its nation's culture and thoughts are the spiritual weapons for saving the world; at the political level, Russia attempted to liberate all mankind; different aspects and characteristics has respectively been highlighted through periods including Kiev Rus, Tatar Rus, Moscow Rus, St. Petersburg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ost-Soviet period.

【Key Words】 Russia, Messianism, Structure, Evolution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мессианизм, структура, эволюци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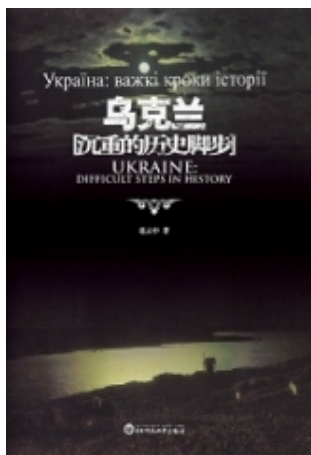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常喆）

学术生活

【编者按】2008年1月17日，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发布第33号总统令，向当今世界传播乌克兰历史与现代成就、塑造乌克兰正面国际形象方面作出重大个人贡献的外国公民颁发乌克兰国家勋章。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赵云中教授因耗费十年心血撰写了我国首部乌克兰史——《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①而获此殊荣。2008年10月18日，乌克兰副总理伊万·瓦休尼克、乌克兰驻华大使谢尔盖·卡梅舍夫、乌克兰驻上海总领事安娜·卡尔玛多诺娃专程来华师大向赵云中教授颁发了“乌克兰三级功勋勋章”。本刊特邀赵云中教授全文翻译乌克兰学者就其专著所撰写的书评，以飨读者。

中国学者视域下的乌克兰史*

Р. Я. 皮里格**



《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 赵云中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一版。

当代世界对乌克兰的了解日益增加，在后苏联的空间中将其认同为一个独立国家。很自然，以欧洲为体现的西方对乌克兰的了解最为及时，然而有关乌克兰的知识向东方的传播向量却是相当弱勢的。

正因为如此，一位中国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教授赵云中新著《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的问世，不仅仅是历史编撰学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是乌克兰与中国的文化交往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此人是中国一位著名的俄

① 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本篇书评原载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乌克兰语学术双月刊《乌克兰历史杂志》2005年第5期，第211—212页。标题为编者所加。

** Р. Я. 皮里格，历史学博士，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历史问题研究所乌克兰革命史（1917-1921年）研究室主任。

语学学者，曾长期担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的一项领导职务。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史进入了他的学术视野。他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乌克兰学研究中心访学^①，1993—1994年曾在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乌克兰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现今在中国，人们对乌克兰、对其人民的历史、文化与传统的了解极其有限。甚至于具有这些方面知识的人力资源——即那些半个世纪前曾在乌克兰学习过的中国学者们，也已经不复存在。据赵云中教授说，在此之前在中国连一本翻译成中文或者由中国作者撰写的乌克兰史都不曾有过。

赵云中教授的著作是在中国撰写与出版的第一本乌克兰史。作者的任务在于做一个概述，向中国读者介绍乌克兰人民的历史，讲述乌克兰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现象、事实和人物。

对该书内容所作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该书作者全面成功地完成了预设的任务。首先，该书以科学和系统的方法来阐述长达千余年的乌克兰历史进程。其次，该书立足于乌克兰历史进程的当代语境。再次，该书作者在其选题范围内以广博而多样的历史著述为支撑。

全书由7章组成，在回溯式的宏观层面上充分地涵盖了乌克兰史既定分期的各个阶段。每一章又分为若干节，其标题准确地体现着叙述的内容。

该书的序言就像是解读作者意图的一把钥匙：向中国读者介绍乌克兰人民的历史奇观，以及其争取国家独立的艰苦历程。

作者向中国读者介绍当代乌克兰的辽阔土地上的原初住民。对东斯拉夫人的历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虽然本书的特色是系统的历史编年方法，但是作者有意识地对乌克兰建国的复杂问题加以特别的关注。有专设的章节来叙述诸如基辅罗斯、加利奇亚—沃伦、哥萨克—盖特曼等国家的诞生、兴盛与衰亡，以及1917—1921年乌克兰革命时期的种种国家建构。

在叙述乌克兰人处于俄罗斯帝国版图内的境遇时，这位历史学家揭示了沙皇专制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强调了乌克兰民族运动产生、各种政党的组建和乌克兰民族形成的必然性。他也没有忽略处于奥地利帝国版图内的西乌克兰民众的命运。

对史实材料的叙述用杰出历史人物的肖像或画像巧妙地加以人格化。附录中列出的基辅大公、加利奇亚和沃伦、立陶宛大公国的大公以及乌克兰所有盖特曼的名表也都服务于上述相同的目的。

虽然该书的书名带有一定的政论风格，史料的叙述也带有普及化的格调，但是该书对乌克兰历史事件的分析 and 解读却是以科学的有凭有据的品质而见长。参考文

① 此处的说法不准确——译者注。

献的清单表明，该书作者不仅对乌克兰的史学和政治学思想经典名家的著作（诸如 M.格鲁舍夫斯基、M.德拉戈马诺夫、M.科斯托马罗夫等），而且对诸如 O.阿帕诺维奇、M.布赖切夫斯基、B.韦尔斯丘克、M.科特利亚尔、П.托洛奇科、B.斯莫利依以及其他多位当代乌克兰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有相当的认知。

该书反映出诸如 T.贡恰克、I.纳加耶夫斯基、O.普里察克、O.苏布捷里尼、P.施波尔柳克等乌克兰境外史学家的著作对本书作者的立场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

大概以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书中没有把沙皇专制制度对乌克兰的政策看作一种殖民主义政策，或者为什么把乌克兰革命算在 1914 年^①。同时应该指出，这个版本的乌克兰“包装”是由 П.波季契尼教授操作的^②，该书的序言和目录的乌克兰译文也是由他完成的。序言和目录也配有英译文，这很重要。

诸如乌克兰重大历史事件年表、人名与地名对照表、详尽的文献索引等这些因素也都增加了该著作的学术品质。

在肯定赵云中教授作为中国的乌克兰历史研究领域创始人之一的著作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价值与提供知识价值的同时，也应该指出，本书的主要不足在于对乌克兰历史事件的叙述止笔于 1920 年。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苏联时期，尤其重要的是乌克兰获得国家独立时期的诸多事件他们都无法了解到了。作者把这种“历史切割”用共产主义史学的歪曲和西方文献的倾向性偏颇来解释，在我们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特别令人遗憾的是该书中缺少有关当代乌克兰国家的一章。最后我们想指出，西乌克兰地方的历史进程应该得到更详细些的阐述。

尽管如此，我们有一切理由对于赵云中教授的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该书在传播关于乌克兰、其复杂的历史命运、其争取独立建国的艰难历程等知识方面做出了贡献。我们期望作者顺利地继续其乌克兰问题研究，让中国公众获得对乌克兰历史的完整叙述。

（赵云中 译）

（责任编辑 常 喆）

① 原文如此：1914 年。疑为 1917 年之误印——译者注。

② 这是书评作者的猜测而已——译者注。

“双头鹰”将飞向何方？

——《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介评

赵臻*



最近，一部反映俄罗斯转型时代外交的新著《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①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目前国内研究俄美关系和阐述俄罗斯外交的著作很多，但是从总体上对俄罗斯与整个西方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转型时代俄罗斯外交和国际关系做系统分析的研究却略显不足，对俄罗斯外交区域特色的深入研究则更少。美国和欧洲是在俄罗斯外交中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两个方向，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俄与美欧的关系。研究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无疑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一书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李兴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0月第1版

该书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李兴教授。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大国关系特别是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他在国内外许多重要期刊杂志上发

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和主要参加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近10项，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该书便是其最新力作，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基于俄美关系研究）等诸多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或最终结项成果。

全书共33万字，除序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该书站在全球政治与世纪之交的高度，对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国、欧盟和东欧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专题式的深入研究，分析和预测了俄美、俄欧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以及俄美欧三角关系的演

* 赵臻，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

化，论述了苏联外交理论实践的成败得失与其解体的直接关系，剖析了俄罗斯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变化及其趋势。

序言部分着重阐述了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首先明确了民族主义概念，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不应总是将民族主义与消极、反面相联系，其性质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作者指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追求俄罗斯军事大国、强国地位，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维护俄罗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表现为不同的内容。但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及大国传统始终贯穿于俄罗斯对外政策之中。至于本书标题中界定时间的词组“转型时代”，作者认为俄罗斯从 20 世纪下半期到 21 世纪上半期，从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为另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称之为“转型”较为中性，概括力更强，比“改革”、“变革”、“转变”、“过渡”、“转折”或“革命”更为合适。另外，从时间上讲，俄罗斯的转型不是一个短促的事件，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至今尚未结束。所以，“时代”比“时期”更为贴切。转型时代在俄罗斯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个时期，俄罗斯想向西方靠拢，但又不能完全融入西方；西方想使俄罗斯进入国际社会，但又不能完全接纳俄罗斯，形成一对矛盾。不同的政治文化，文化民族主义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第一部分：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是俄最大的交往对象，也是俄最大的竞争对手。美苏都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崛起的世界巨人，苏美关系是当前俄美关系的基础。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对美政策与美国的对俄政策都有一个逐渐调整和演变的过程，具有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特点。但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欧亚大陆始终是全球政治的重心。只不过冷战时期俄美争夺的焦点一般在欧亚大陆的周边地带，而冷战后博弈的重点则转移到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作为地跨欧亚的大国，俄罗斯实行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外交”；而作为一个非地缘意义上的欧亚大陆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遍及欧亚，势必要与俄争夺欧亚大陆的主导权。美俄关系起起落落，矛盾丛生。美国来势凶猛，咄咄逼人，极力在独联体内部推动“颜色革命”，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与俄争夺中亚、高加索地区。而俄罗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常有出人意料之举，不甘平庸的俄罗斯始终是制衡美国单极独霸的一支重要的多边主义力量。作者认为，独立后的俄罗斯虽然大大削弱，但仍然是世界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之一，只不过美国在中心，俄罗斯在边缘。“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不是两个新旧霸主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更新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既是竞争对手，也是战略伙伴，既扑朔迷离又有游戏规则，既相互需要又敌友难辨。”总的态势是美强俄弱，美攻俄守。在中亚，俄赶不走美，美取代不了俄，双方只有竞争共处。

第二部分：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俄罗斯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始终是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面临的困局。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其欧洲部分，传统上是一个欧洲国家。无论从地理、还是从文化、宗教来看，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都是“剪不断”、“理还乱”，而美国的文化之根也在欧洲。所以，这里作者选取了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独特视角切入，认为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两次文化潮流——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皆源于西方。但是俄罗斯永远也不会变成西方，西方也不会完全接纳俄罗斯。这是由文化民族主义决定的，是由斯拉夫民族优越论与盎格鲁—萨克森民族优越论的矛盾与冲突决定的，也是由俄罗斯民族“历史使命论”与作为欧洲文化的继承者的美利坚民族“天定命运论”的“不兼容”决定的。外交上，俄历来以欧洲、特别是西欧为重心。但欧洲与俄罗斯互不信任，它们谁也不甘心失去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谁也不希望让后起的美国独霸世界，尽管在文化和民族渊源上美国是以西欧为母体的。俄欧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妥协的关系。俄罗斯对于北约欧盟双东扩所持的不同态度充分说明了俄罗斯亲欧防美，分化欧美的外交战略和策略考量，说明了俄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灵活务实、区别对待的对外政策。

第三部分：俄罗斯与东欧的关系。欧洲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分为西欧和东欧两个单元。其中东欧是俄罗斯的近邻，是俄罗斯通往西欧—大西洋的过渡地带。对于东欧和东南欧，俄罗斯从不忘记，从不忽视进行争夺和控制。冷战时期，苏东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所以，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要放在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的大背景下去理解。东欧西行，入约加盟，俄罗斯只是承认现实，但俄罗斯并没有放弃东欧。

第四部分：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总论。作者在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作出了展望，认为：无论是俄罗斯东西方并重的欧亚大战略，军事外交上的特立独行，及其独特的民族性格都容易与西方发生矛盾，但是在经济上双方又有一些互补因素。“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不是西方，俄罗斯也不太可能变成西方。追求与西方的平等地位，学习西方，赶超西方而又不服气于西方，甚至傲视西方，不与西方为然。所以，合作与竞争共存，妥协与矛盾同在，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另一方面，作者还对独立以来俄罗斯外交主流思潮的演变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剖析，这些思潮包括：大西洋-欧洲主义，新斯拉夫主义，“近邻—远邦”流派，新欧亚主义，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稳定的弧形”战略，能源外交，“主权民主论”，等等。这几大流派之间的斗争、交锋、妥协和折衷也从总体上反映了俄与西方关系的调整 and 变化。俄罗斯有自己的理想主义，历史上济世主义和国际主义就是其突出表现。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现实主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

利己主义就是其两个不同侧面的表现。俄罗斯强大的时候往往单边主义，衰弱的时候往往多边主义，强大的时候主张国际主义和欧亚主义，衰弱的时候主张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俄罗斯有自己特殊的道路和远大的志向，俄罗斯是一个不肯轻易服输的民族和国家。

本书的四个部分相互呼应，自成体系，具有内在逻辑。时间为经（有历史、有现实）、空间为纬（有美国、欧盟、东欧），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有专题论述，有全面展开，点面结合，分合得当，错落有致。

作为一部客观全面的论述转型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著作，该书的特色也是十分鲜明的：

一、内容丰富，材料详尽。作者把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把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与其具体的区域政策结合起来，把俄罗斯的外交实践和有本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本书的内容涵盖了俄罗斯与美国、欧洲之间的互动关系、俄美欧三角关系的演化、俄美欧三方的战略指向及相互政策，俄罗斯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成败得失以及贯穿其中的、对俄罗斯对外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大国传统，具体内容也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时间跨度较长，信息量大，内容丰富详尽。为此，作者搜集了大量的中、俄、英文文献，包括俄罗斯联邦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借鉴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另外，作者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着重于综合研究，将问题的研究奠定在对坚实可信材料的深度分析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状相结合，从而使本书更显内容厚重，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二、方法创新，综合运用。作者综合运用了历史的、比较的、文化学、国际政治学等多种方法来对俄与美欧关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分析。在运用国际政治学的方法时，又分别从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等角度来进行分析。在每一部分，作者都力图找到最适合的视角切入，从而勾勒出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全貌。

三、体例新颖，匠心独运。本书的体系宏大，书中的四个部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呼应，具有内在逻辑。而在每一部分里，作者都紧紧围绕主题，在全面展开的同时，又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做了深入的专题式研究，例如：在全面论述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时，着重选取了近年来俄美争夺比较激烈的中亚地区作为一个重点分析对象；在论述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时，着重选取了生存在俄罗斯和欧盟夹缝中的乌克兰来做个案分析；而在论述俄罗斯与东欧关系的时候，着重选取了“南北战争”中的南斯拉夫联盟来做深度探究。以小见大，深入浅出，真正做到了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使得著作丰满且更具说服力。

四、观点创新，不囿旧说。除了上文提到的观点之外，本书还有许多精辟的见

解。例如作者通过分析在结语是得出“俄罗斯就是俄罗斯，除了俄罗斯自己，谁也救不了俄罗斯”，“俄罗斯毕竟是俄罗斯，俄罗斯还是俄罗斯”，等等。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介绍。

总之，《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是一部博综深究、脉络清晰、新意颇多的学术著作。开卷有益，值得读者阅读。

(责任编辑 李敏焘)

(上接封3)

- 俄联邦航天局(Roskosmos)证实，俄美卫星在西伯利亚相撞，但未对国际空间站造成影响。
- 13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土耳其总统居尔(Abdullah Gul)，强调俄土能源合作的重要性，并指出两国应共同保卫高加索地区安全。
- 16日 中国向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和俄石油运输公司(Transneft)提供250亿美元借款，以此换取来自东西伯利亚油田20年期总量达1500万吨的石油。
- 18日 麻生太郎作为二战后首次踏上曾被日本统治的萨哈林岛的日本首相，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商讨两国双边事务，并出席俄罗斯首座液化天然气厂投产仪式。
- 19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结束对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访问，他表示巴林有意与俄天然气企业加强合作。
- 21日 俄国防部数据显示，64名俄国军人在2008年格鲁吉亚冲突中丧生，283人受伤或失踪。
- 26日 约旦与俄罗斯协议开展核合作。
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要求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重审1月19日签署的乌俄天然气合同的某些条款。
- 27日 俄总理普京表示，经济危机不会给俄罗斯带来致命打击。
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就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举行电话会谈。

(于璐辑)

- 俄乌能源公司表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仍拖欠 6.5 亿美元欠款。
- 23 日 亚美尼亚请求俄罗斯提供稳定贷款。
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多项协议，其中一项涉及施行供气市场价格。
俄罗斯与古巴签署一系列能源合作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敦促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支持乌俄签署的天然气协议。
- 26 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通电话时达成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共识。
俄反潜军舰前往索马里保护商船运输。
俄总参谋部宣布，俄罗斯计划在阿布哈兹港口部署海军基地。
乌克兰外交部长弗拉基米尔·奥格雷兹科（Volodymyr Ohryzko）表示，乌俄交往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
- 27 日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向欧盟承诺，全力支持与俄罗斯签署的天然气协议。
基里尔（Kirill）主教当选莫斯科和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
- 28 日 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副总裁亚·梅德韦杰夫称，公司计划提高南溪天然气管道运输能力至 160 亿立方米/年。
尤先科总统助理表示，乌克兰在法理上有理由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签署的天然气传输协议。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抵达莫斯科，开始其 24 年来对俄罗斯的首次正式访问。
- 29 日 《乌克兰真理报》网站全文刊登乌俄于 1 月 19 日在莫斯科签署的 10 年天然气购销合同。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Taro Aso）和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将于 2 月中旬在萨哈林岛会面。
俄罗斯将向古巴提供贷款，并与其发展贸易。

2 月

- 1 日 莫斯科市颁布新的外来移民工登记规定。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称，俄罗斯不会强迫他国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
俄乌能源公司起诉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窃取”其天然气，用来补充乌克兰天然气储备。
- 2 日 白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公司（Beltransgaz）与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天然气价格协议，规定 2009 年天然气价格为 148 美元/千方。
- 3 日 俄罗斯与白俄签署防空合作协议。
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协议解决债务问题，并向吉提供 20 亿美元国家贷款。
国际法院就罗马尼亚、乌克兰黑海划界作出判决，争议区域约有 80% 归罗马尼亚所有。
- 4 日 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表示，只有在俄从南奥塞梯撤军前提下，两国才可能展开对话。
俄国防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与中方签署出售百余架台歼击机引擎的合同。
- 5 日 俄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表示，欧洲能源宪章必须修改，否则俄不会批准。
俄常驻欧安组织代表阿济莫夫（Anvar Azimov）对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边境部署军队和警察表示关注。
- 6 日 伊朗建议俄伊共建中亚输电网。
- 7 日 俄驻英国大使费多托夫（Yuri Fedotov）表示，希望英方允许在俄罗斯法庭举行“利特维年柯案”听证会，并在听证会上提交英方有关证据。
- 9 日 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尔廷诺夫（Sergei Martynov）否认白俄计划将法定货币变为俄罗斯卢布；他同时表示，相关讨论仅限于“使用俄罗斯卢布作为区域性支付货币”。
- 10 日 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南奥塞梯签署关于重修其天然气供应基础设施的协议。
- 11 日 俄统计数据显示，俄人口数下降 330 万，至 1.419 亿。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博尔久扎（Nikolai Bordiuzha）表示，俄将积极协调成员国共同解决北约过境向阿富汗运输货物问题。
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表示，希望欧盟专家对与俄罗斯达成的天然气合同进行研究分析。
- 12 日 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向白俄政府支付第三批共 6.25 亿美元款项，从而掌握白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公司 37.5% 股权。

（下转 134 页）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2 期

(总第 156 期)

《俄罗斯研究》刊期变更启事

经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沪新出报[2007]33号),从2007年起,《俄罗斯研究》的刊期由此前的季刊变更为双月刊,逢双月23日出刊,其他项目保持不变。

改为双月刊以后,《俄罗斯研究》杂志社将进一步注重刊物的刊发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以期为关心国际关系及俄罗斯问题的各界人士提供更切实有效的服务。

《俄罗斯研究》以研究和介绍俄罗斯现状问题与信息为重点,反映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兼及历史、文化等领域和相关的东欧中亚研究,目前设有“专论”、“政治·社会”、“经济”、“国际关系”、“斯拉夫欧亚”、“苏联时期·苏共”、“历史·文化”、“书评”和“学术动态”等栏目。

本刊热忱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广大作者、读者和专家的帮助与支持。同时,提请各位投稿者关注本刊的有关规范,可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

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

ISSN 1009-721X

CN31-1843/D

定价: 8.00 元